



HONGSE YINJI

# 红色印记

—— 武汉市江汉区革命遗址遗迹

中共武汉市江汉区委党史办公室  
武汉市江汉区地方志办公室  
武汉市江汉区档案局

# 红色印记

## 编审委员会

BIANSHEN WEIYUANHUI

主任：李 强 张俊勇

副主任：严国运 陈红山 张 劲 熊 焰 周 岚

委员：胡赶美 谢定彪 叶劲松 张黎明 张隽波

李宝红 何 庆 张建军 周健韬 王 瑞

余晓翔 杨向农 朱传学 李 兵

主 编：陈红山 张 劲

副主编：周健韬 李 兵 向建华 黄利群

编 辑：向其芳 苏崇恩 杨德孝 潘奠元 杨必高

朱 亮 邢 娜



展开江汉区行政区划地图，映入眼帘的区域形似高高擎起的火炬，火炬焰火飘燃，指引江汉儿女永远向前。

长江、汉江在这里交汇，大江大河的灵气充盈大地；汉口源点从这里辐射，汉镇之城在这里崛起；缘水而兴，得中独厚，九省通衢的中国历史名镇从这里走向世界；改革开放的春风，拂去了古老商镇的旧容，现代服务业中心如旭日东升正在这里升腾。这里是上天、入地的立体江汉；这里是转移、转型的金色江汉；这里是绿化、文化的美丽江汉；这里是宜居、宜业的幸福江汉。

幸福，来之不易。既有一代又一代的江汉儿女为之拼搏奋斗，更有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先辈流血牺牲，在这里留下了光辉足迹。今天，奉献给大家的这本《红色印记——武汉市江汉区革命遗址遗迹》，它以党的历史分期为时序，以每处革命遗址遗迹为线索，以发生在这些遗址遗迹上的革命斗争为史实，力求用简洁的文字、珍贵的图片，记述发生在江汉热土上革命先驱的英雄事迹。真实再现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忘我的革命精神，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在江汉区境内的革命斗争历史。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 1921 年，中共创建之初的董必武、陈

潭秋在这里创办革命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发动和指导的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

大革命时期，这里被称为“红色的汉口”。1926年3月至9月，董必武遵照党的决定，在这里策应北伐军会师武汉。1927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登记处入驻贯中里办公。1926年4月至1927年7月，联保里成为工人运动指挥中心，被称作“革命里”。1926年11月，中共最早的出版发行机关——汉口长江书店（今六渡桥初开堂药店）对外开业，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1927年3月，毛泽东、董必武等六位共产党人在南洋大楼出席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公开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开幕式在武昌第一小学举行后，正式会议转到境内的汉口黄陂会馆（今市七十五中学）召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在中共五大进入中央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处于低潮。1927年—1931年，驻小董家巷8号的中共秘密机关及秘密联络处，遭国民党新军阀破坏，50多位共产党人先后被捕，多处中共地下机关被破坏。吴良华、邓雅声、唐鉴等一批共产党人在济生善堂场坪（今前进二路口）被杀害，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江汉。

抗日战争初期，武汉成为全国战时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董必武选址安仁里2号，筹办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第一张报纸《新华日报》，在大陆里编辑、印刷、出版发行。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今

武汉市总商会)成立。全国抗敌文艺协会等众多文艺团体的机关驻地均设境域，推动着全国抗日救国宣传活动蓬勃发展。1945年9月，设在中山公园的“受降堂”，是侵华日军投降、中华民族抗战全面胜利的历史见证。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织在这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以经商为掩护，秘密建立地下交通站，向大别山送军需物资，掩护接转突围大别山的干部。经过长期工作，成功策反汉口机场部分国民党空军人员起义。1949年5月16日黎明，由中共党员连夜绣制的党旗，第一次在江汉关钟楼高高飘扬。新生的江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

历史是过去的今天，今天是未来的历史。中共江汉区委、江汉区人民政府历来都十分重视革命遗址遗迹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江汉境域珍贵的红色资源，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受到的屈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抗争，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江汉这块热土，它是一块宝地、福地，更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

今天，我们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人间正道是沧桑”。明天，民族复兴梦想，犹如地平线上跳动的朝阳，喷薄而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铭记历史，警示未来，更加奋发有为地为建设武汉现代服务业中心区而不懈努力！更加奋发有为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 武汉市江汉区革命遗址遗迹

第一编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1919年5月—1923年6月）/ 003  
施洋烈士故居遗迹 / 005

第二编 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1927年7月）/ 015

“革命里”旧址 / 017

长江书店旧址 / 026

武汉国民政府旧址 / 032

“一·三”惨案遗址 / 042

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旧址 / 057

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登记处旧址 / 066

血花世界旧址 / 073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遗迹 / 084

第三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7月—1937年7月）/ 097

中共中央机关暂留武汉交通处遗迹 / 099

第四编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 105

董必武故居及早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 / 107

孩子剧团遗址 / 117

《新华日报》社旧址 / 125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会场旧址 / 134

第五编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5月）/ 143

江汉关大楼 / 145

附录 武汉市江汉区其它遗址遗迹

汉口孙中山先生纪念铜像 / 157

汉口机场遗迹 / 165

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受降堂旧址 / 178

# 江汉区革命遗址遗迹分布图



武汉市江汉区革命遗址遗迹一览表

名称	主要事件发生时间地点	备注
施洋烈士故居遗迹	1923年2月 花楼街皮业巷9号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故居已拆除
“革命里”旧址	1926年9月 联保里	保存完好
长江书店旧址	1926年11月 中山大道371号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武汉国民政府旧址	1927年1月1日 中山大道708号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三”惨案遗址	1927年1月3日 江汉关大楼前苗家码头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旧址	1927年1月21日 前进五路111号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
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登记处旧址	1927年初 贯中里	保存完好
血花世界旧址	1927年 新民众乐园	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遗迹	1927年4月29日—5月9日 今武汉市第75中学	会馆原址损毁
中共中央机关暂留武汉交通处遗迹	1927年9月 永安里12号	原址拆除重新建设已非原貌
董必武故居及早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	1937年9月 安仁里1、2号	原址仍在，保存较好
孩子剧团遗址	1937年12月 花楼街182号	原址今为武汉市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校
《新华日报》社旧址	1938年1月 大陆里4-9号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会场旧址	1938年3月27日 中山大道489号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
江汉关大楼	1949年5月16日 江汉路1号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附录：武汉市江汉区其它遗址遗迹

名称	主要事件发生时间地点	备注
汉口孙中山先生纪念铜像	1933年4月 铜人像广场	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汉口机场遗迹	1938年 王家墩机场	改建成武汉中央商务区
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受降堂旧址	1949年9月18日 中山公园西侧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第一编

# 红色印记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

1919.5—1923.6  
Zhongguo Gongchandang  
Chuangli Shiqi

第一编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

# 红色印记

1919.5—1923.6

Zhongguo Gongchandang  
Chuangli Shiqi

# 施洋烈士故居遗迹

施洋烈士故居遗迹位于武汉市江汉区花楼街皮业巷9号。

施洋，原名吉趋，号万里，字伯高，生于1889年6月13日，牺牲于1923年2月15日。湖北竹山人，京汉铁路大罢工领导人员之一，武汉著名劳工律师、共产党员。1917年，施洋毕业于湖北政法专门学校。1918年获律师证书，在武昌开律师事务所，因精通法律，雄辩过人，被武昌律师公会推选为副会长。

▶ 施洋烈士故居花楼街皮业巷9号



二七工仇血史留吳蕭貽  
臭萬千秋律師為仗人間  
義身殉名存烈士儔

施洋烈士同卷之墓

董必武敬題  
一九五七年五月

董必武親筆題詞的施洋烈士雕像，  
矗立在武昌洪山公園施洋墓前

## ● 援救学生 呐喊救国

1919年，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5月7日，武汉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爱国号召，印发传单，呐喊救国的声音传遍三镇。施洋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主持召开律师公会会议，慷慨激昂地指出，“一个中国人，要有一颗灼热的爱国心”。号召律师界同仁坚决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随即积极投身于爱国反帝运动，发通电，写宣言。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6月1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指挥军队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武昌“六一”惨案。当天施洋在武昌律师公会紧急会议上，以副会长的名义提出援救学生案，呈请法庭提起公诉，要求惩办凶手，抚恤学生，恢复学生自由。接着，他积极

参与筹备发起万人大会，追悼5名死难学生，声讨王占元暴行。

为了支援学生的爱国运动，施洋主张联合工商界，采取一致行动。为此，他不避艰辛，四处奔走，联络武汉各界人士，鼓动罢市。在恽代英及施洋等的积极努力下，6月10日，汉口数十家商店率先罢市，至12日，武昌、汉阳罢市。工厂工人也开始罢工，支援、参与爱国运动。施洋又以赴京请愿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领武汉地区各界代表，驱车北上，向北洋政府请愿，反对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允许民众言论集会等自由。6月28日，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中国代表态度坚决，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至此，五四运动取得伟大胜利。



「六一」惨案后，武汉各界人士走上街头示威

## ● 劳工律师 匡扶正义

施洋在武汉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时，他的活动由上层社会转向下层社会，从事劳工运动，不计报酬维护劳工利益。有一次，施洋为一名被恶霸打死的人力车工人申了冤，工人们给他送了一块书有“劳工律师”四个大字匾，从此人称施洋为劳工律师。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施洋参加了武汉分部的工作。同年，汉口租界人力车老板宣告加租，由每日800文提高到1000文，使身受巡捕、车行主、包工头层层盘剥的人力车工人更没法活下去，因而遭到工人们的强烈反对，自发地掀起罢工怒潮。党组织立即派包惠僧、施洋、林育南、郑凯卿到工人中直接领导罢工斗争。施洋为人力车工人起草了《罢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书》，揭露车行老板压迫工人行为，要求取消加租，原租金减为600文。施洋组织召开人力车工人代表会，决定成立“汉口人力车夫同业公会”，具体领导反租斗争。租界当局看到工人们一致决心，认为只要解决好领头的施洋，就会万事大吉，于是派人与施洋商谈想收买贿赂施洋。他们对施洋说：“像你这样有身份地位的律师，何必要参与人力车夫的行列，如果你需要钱或社会影响，

我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施洋痛斥道，“你们这些走狗，只知道自己的欲望，不知道车夫工人的苦楚”，我们甘愿参与人力车工人的斗争，“一切为了工人利益，我们自己无所他求。”经过斗争，租界当局和车行老板被迫答应工人们的要求，还取得组织工会的权利。人力车工会成立后，聘请施洋为法律顾问，后来成立的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人俱乐部、汉冶萍总工会及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都聘他为法律顾问。

1922年5月1日，武汉各界工人劳动节游艺大会，施洋激情演讲说：“五一是一是工人血泪换来的胜利，不牺牲不奋斗是得不到胜利的。”之后林育南、项英、许白昊相约来到皮业巷施洋家中，与施洋进行了长谈，坚定了施洋的信念，施洋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同年6月18日，项英、许白昊介绍施洋加入中国共产党。施洋入党后，更加坚定地战斗在反帝反军阀、匡扶正义、捍卫工人利益的最前沿。

## ● 英名永垂 忠诚励人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施洋积极参与，发表演说，募捐。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震惊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他们联合起来，镇压工人大罢工。2月5日吴佩孚急电湖北督军



萧耀南，令其对工人，“如不服劝阻，立即武力镇压”。7日晚，萧耀南下令非法逮捕施洋。施洋在皮业巷家中被捕。在狱中施洋坚持斗争，不屈不挠，每天写日记，详细记录被捕的经过、审判的情形和监狱制度的黑暗。与此同时，坚持宣传革命道理，为狱中难友草拟禀状，书写请假释诉状等，与工人共同战斗。吴佩孚恨恨地说，“不杀施洋，工潮不能平静。”萧耀南更是狂叫，“不杀施洋，京汉铁路不能通车”。15日在洪山脚下刑场上，面对枪口，施洋

无所畏惧，慷慨陈词：“我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个施洋！”连中三弹，身挺如故，高呼：“劳工万岁！”其情其景，悲壮惨烈，惊天动地，巍巍洪山见证了这悲壮的场面，印证了一个共产党员为劳苦大众视死如归、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对共产主义矢志追求，坚定不移的崇高信念。党的好儿子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党的宗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儿女们用鲜血昭示后人。其时，年仅34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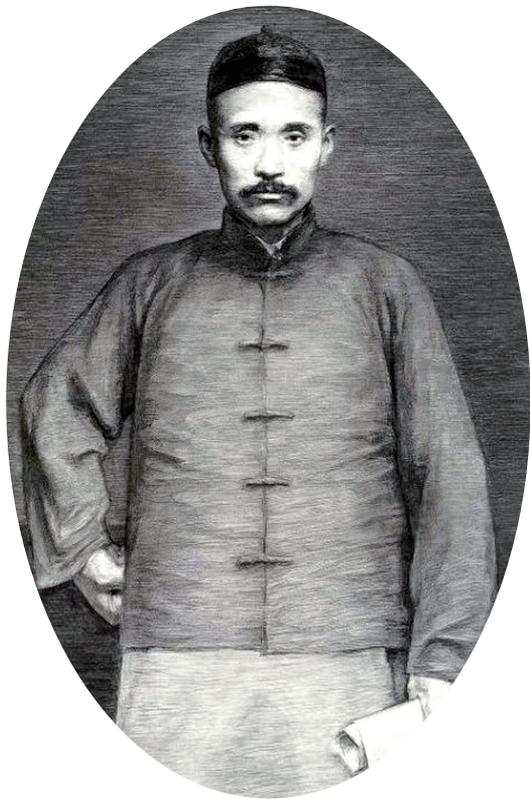
施洋烈士纪念碑

施洋烈士遇难的这天正是农历除夕，中国人阖家团聚的日子。施洋就在这一天永别了他的妻子、女儿及胞弟，也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劳苦大众，为追求人类最伟大的事业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据史载，施洋灵柩停灵武昌江神庙时，过往哀悼者颇不乏人。7月施洋灵柩迁葬洪山时，各界人士致祭于江神庙者来往不绝。葬时，全体呼号痛哭。汉口车夫及武

汉工人于农历七月十五在各码头设祭，数千车夫跪地痛哭，并扶先生灵位游行街市，景象十分悲壮。恽代英写有《纪念施伯高兄》一文，表达对施洋烈士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施洋入选“为新中国成立而做出突出贡献的100名英雄模范人物”，是后人永远敬仰和学习的榜样。



施洋烈士像

### ● 再忆故居 精神永存

施洋烈士故居是一栋砖木结构，黑灰布瓦的双开间二层楼房，坐东朝西。青麻石砌的石库门，门框上装有里外两层门，外层为两扇木栅门，上面4块透明的玻璃镶在雕花的木框内，下面是雕着一朵大花的木板。里层两扇是五六厘米厚的黑漆木门，大门的两边，各有两扇窄长的玻璃窗，窗楞间装有手指粗的铁栏杆。进门是堂屋，水泥地面呈八边形和正方形图案，堂屋里陈设很简单，南北两边靠墙各摆一张多屉办公桌，桌前各有一把藤椅。旁边为一

排书柜，还有一张条桌，一张圆桌和4个圆凳。堂屋是施洋接待打一般官司的地方。

堂屋左边有两个房间，前房14平方米，西窗下摆着一把方背的雙人長藤椅，北窗下擺放一張寫字台，兩邊各放有一個書櫃，一把單人藤椅和幾張原木凳，南邊也有一個書櫃，前房是施洋接待打重要官司的地方。後房20平方米，東北角靠牆放著一張雕花木制棕床，床架為弧形，雕刻有精緻的花鳥圖案，中間鑲有圓形鏡面一塊，古色古香，床旁邊放有一個木制圓

柱形衣架，北窗下放有一張寫字台，兩邊各有一張單人圓背藤椅，西北角放著一高一低兩個大衣櫃，這是施洋胞弟施季高的臥室。

堂屋的後面為通向二樓的木制樓梯，23級台階寬72厘米，扶手為圓柱形木欄杆。樓梯下段正對大門。樓梯後面有兩間小房，左間是川籍保姆的臥室，右間是廚房。

二樓的布局同一樓一樣，一個堂屋，兩間住房，木質地板。上樓的第一間是施洋與其夫人郭秀蘭、女兒施鳳英的臥室。



▲ 施洋烈士用过的藤椅

▶ 江汉区组织青少年参观施洋烈士故居





施洋烈士故居原址修建的大楼

室内摆放着大小两张雕花木床及大衣柜、红木桌、五斗柜和皮箱等物，施洋起草的许多秘密文件就收藏在皮箱和梳妆盒内。第二间是秘密会客室，这里是施洋秘密开展党务活动的地方。卧室和会客室都安有门铃。一般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凡是组织上来人，都由施洋和夫人亲自去开门。紧靠楼梯口还有一架狭窄的木楼梯，直通房顶的一间木板晒台。

1959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将皮业巷9号施洋烈士故居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江汉区委、区政府将故居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94年，施洋烈士故居随同花楼街一期旧城改造一道拆除，实在可惜。不过欣闻在花楼街的重建中，施洋烈士故居重建工作也在规划中。

第二编

# 红色印迹

大革命时期

---

1923.6—1927.7  
Dageming Shiqi

大革命时期

第二编

# 红色印记

Dageming Shiqi

1923.6—1927.7

“革命里”旧址，即今联保里。位于武汉市江汉区中山大道北侧，前进五路东侧，与江汉一路平行，占地 1.1 万平方米，门牌 1—42 号，是融合西方建筑风格的里巷。

### ● 建立秘密工会 组织工运斗争

武汉工人阶级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工会是团结工人争取自由的组织。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级工会团结、组织工人和劳苦大众开展革命斗争。1923 年“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不得不转入地下，党组织积极设法在工人中活动。中共武汉区委增设

▶ 前进五路上的联保里大门



劳动委员会，加紧恢复、整顿秘密工会。李书渠、项英、许白昊分别负责粤汉、京汉铁路及人力车夫的工作。武汉区委负责人包惠僧也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人运动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逐渐在铁路工人、钢铁工人、轮驳工人、染织工人、人力车夫中恢复了秘密工会组织。并组织工人举行罢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生活状况，增强工人团结奋斗精神。

1925年2月17日，汉口人力车夫徐典拉车经过英租界鄱阳街，因避让汽车误撞巡捕，被巡捕殴打致死。人力车夫工会向官厅提出5个条件：惩办凶手、抚恤死

者家属、不许巡捕殴打车夫、巡捕房对车夫不得任意处罚、开除虐打车夫的巡捕。官厅对此置之不理。英巡捕房变本加厉将请愿代表捕去6人。武汉党组织通过工会发动全市人力车工人举行罢工。并组织发动其他工会和学联等声援车夫斗争，各团体还先后发表反帝宣言，要求收回英租界。英领事署被迫接受缉凶、恤死、取缔巡捕毒打车夫等部分条件，罢工取得胜利。

这是“二七”惨案后武汉工人取得的第一个影响较大的胜利。各工会也组织一些为工友争取权利的斗争。5月30日，当上万名上海学生和工人在南京路举行援助



▲ 1925 的人力车夫

纱厂工人的反帝宣传和游行示威时，遭英国巡捕开枪镇压，当场打死10余人。引爆中国人民心中郁积很久的革命风暴。“五卅”运动在短短几天内，就从上海席卷全国。武汉工人阶级在沪案发生后也积极行动起来，6月3日汉口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首先举行罢工；各工会印发传单开展宣传，号召团结起来，集体行动。6月10日下午4时许，英国太古公司武昌轮抵汉后卸货时，该公司一职员重殴码头工人余金山，并打伤2名工人。次日，数个码头工人率先举行罢工。下午汉口人力车工人和棉花工人团结在一码头一带游行示威，强烈抗议英帝国主义分子殴打工人的暴行，坚决要求惩办肇事者。这时一艘英国军舰公然越界停泊在江汉关上侧苗家码头，向武汉人民示威，武汉民众愈加激愤，在河街及江汉关前愈集愈众。英国巡捕前来驱逐，群众更加不服。英国驻汉总领事悍然命令海军陆战队全副武装登岸，用长枪刺刀驱逐人群，首先挑伤太古公司打包工人刘国厚，英巡捕用水龙头冲射人群。萧耀南为虎作伥，派出大批军队阻拦退散的人群。此时英兵突然用机枪向人群扫射，“一时弹如雨下，血肉横飞”，当场杀害十余人，伤数十人。英兵将被害者尸体沉入江底。这是英帝国主义制造的汉口“六一一”惨案。汉口惨案发生后，全市震动，12日

汉口租界华商全体罢市，学生、工人上街举行示威。14日，汉口英、日经营的报纸、商店、工厂和洋行的中国职工一律罢工，武汉工商学界群众15万人上街游行，高呼“打倒英强盗”的口号。16日，武昌商界一致行动，不卖英、日货。不用英、日钱币。20日，武汉各法团外交会商议决定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7月11日，汉口各界人士也在汉口总商会举行追悼大会。9月7日，30万人组织水陆大游行，举行反帝反军阀大示威。武汉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显示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年底，武汉工人重新团结起来，成立了武汉工人代表会。到1926年4月，武汉工人代表会所属工会小组发展到40个、工厂委员会4个、工会4个，能直接领导的工人约4万余人。

### ● 行业工会云集 斗争风起云涌

1926年，联保里成为领导武汉革命斗争的一个中心驻点。已转入地下工作的董必武居住联保里4号二楼，他遵照党的决定，以国民党中央驻鄂代表的身份指导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组织领导武汉各界支援、配合北伐军挺进湖北。

9月6日晚北伐军攻入汉口市区，7日上午，北伐军占领租界区以外的整个汉

1926年，武汉市民组成的支援北伐军的工农运输队



口，工会组织纷纷建立。联保里的房屋分别为码头工会、店员工会、人力车夫工会等十几个行业工会的办公室。10月10日，湖北省总工会在汉口宁波会馆举行成立大会。武汉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工会组织工人迅速投入改善生活待遇和争取政治权利的伟大斗争。据当年的《中外经济图刊》统计的1926年10—12月武汉行业和工厂的罢工有36次，一些问题得到暂时的解决。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制造了“一·三”惨案，用刺刀枪托打伤30余人，受伤者多为海员工会、码头工会、

人力车夫工会会员。各行业工会的工人愤怒声讨英帝国主义，在收回汉口英租界斗争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各行业工会还参与组织了“二七”纪念活动，声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集会，抗议帝国主义的罢工活动，参加人数量最少有32万人。此后，武汉工人阶级在反蒋、反帝、挽救革命危机的一系列斗争中都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在联保里办公的工会组织纷纷发表反蒋通电。当时这里是武汉工人运动行业工会的

► 1927年1月5日武汉民众捣毁英租界



► 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指挥机关，被工农大众誉为“革命里”。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原来生气勃勃的工会组织有的被改组，有的被解散或被查禁，在联保里办公的行业工会等革命团体遭到了严重摧残，工人运动也转入低潮。

1938年4月中旬，中共汉口区委员会重新建立，直属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领导，区委机关设在汉口联保里，下辖海员支部、电台支部、生活书店支部、烟厂支部、女校支部、武汉小学教师支部、新知书店支部、车夫支部、江岸铁路支部、码头支部及汽车特别小组、妇女特别小组等。8月，日军逼近武汉，大批党员干部奉命撤离。9月汉口区委党员干部或赴延安、或分派湖北各县、或输送外省、新四军部队，省委撤销了汉口区委。

联保里建于1918年前后，由上海联保保险公司出资修建。为里弄式民居，皆为二层砖木楼房，结构较好。早年住户多为绅商达贵。解放后为普通民宅，保存完好。



联保里巷内

▶ 联保里的红顶房子是现如今汉口市中心罕见的一景



迈进联保里门栋内，却又看到联保里素石朝天的一面。里弄内，一栋栋欧式联排石库门小楼，形成一个个“凹”字左右相连，排列在巷道两侧，延绵至巷尾。

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水磨外墙已显暗黑，但观之细节，依旧漂亮：两条横平竖直的门柱和外挑的门檐，加上磨得发亮的条石门栏，让人感受到宅子历史的厚重。两扇约高两米、宽半米的斑驳黑漆木门，有的依旧留有门环，进进出出的居民开启木门，不时发出清脆的撞击声，里弄风情就在这“咣当”声中悠悠散发出来。

不大的天井两侧，各是两间厢房。红瓦的坡形屋顶，装饰的烟囱耸立，加上2

楼精致的出挑小阳台，给人感觉欧式风情浓郁。

联保里既是优秀的历史建筑，又是红色传统的革命里弄旧址。这里的居民既保持着闹市中的一份宁静，又保存着一份邻里亲情。不论春夏秋冬，邻里间的相处颇有“关上大门是小家，敞开大门是大家庭”的感觉。享受邻里间的亲情让久居高楼大厦的市民相当羡慕。

2003年1月政府按联保里历史原貌修复，它是目前武汉市最漂亮最迷人的里份之一，尤其是从高空俯瞰，呈几何状的红色传统尖屋顶及井然有序的布局，让人感叹联保里建筑的魅力。

江汉一路上的联保里侧门



ANG<sup>2</sup>  
ang square 男装折扣店

明春  
工作鞋

罗蒂爸爸  
PapaRoti  
面包烘焙专家

PapaRoti 罗蒂爸爸

罗蒂爸爸  
PapaRoti  
面包烘焙专家

里保联

丁丁房产



珍珍烟

纹身

房屋租售 贷款抵押 租金面议 电话: 139956681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手机充值

长江书店旧址位于武汉市江汉区中山大道六渡桥，现门牌中山大道 371 号。

### ● 中共在汉最早的出版发行机构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理论和思想，党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书店。直系军阀孙传芳侵占上海后，视革命，以“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的罪名，强行将其封闭。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在当时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武汉筹建长江书店，继续出版和发行革命刊物。由在上海负责党中央出版发行的毛泽民创办长江书店，具体事宜由苏新甫落实并任经理。与此同时，党中央又把在上海创办的文明印务局的机器全部运到汉口，在福生里（今前进一路前进二里）办起了长江印刷所，负责人为倪忧天印刷长江书店的出版物。1926 年 11 月，汉口长江书店正式对外开张营业，这是

▶ 长江书店（今初开堂）旧址外貌





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地区最早设立的出版发行机构。向导社、新青年社、中国青年社的许多进步书刊，在武汉都交由长江书店出版、发行、销售。长江书店开业前后，曾在董必武任经理的《汉口民国日报》上登载书目广告及启示，略谓“书店经销向导社、新青年社、中国青年社并一切关于革命的书报，‘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能有革命的行动’，本店愿意于这个高潮中，供给革命民众以研究高深革命理论的材料。”其经售的有《中山演讲集》、《社会进化论》、《海丰农民运动》、《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学说》等多种书籍。1927年2月，长江书店首次出版了瞿秋白翻译的斯大林著作《列宁主义概论》。4月，汉口长江书店出版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瞿秋白在序言中热情洋溢的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他还给毛泽东一个雅称——“农民运动的王”。

### ● 首发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

长江书店出版发行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颇有一段故事。1927年2月毛泽东在武昌都府堤41号家中，一连几天，泼墨催澜，奋笔疾书，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在文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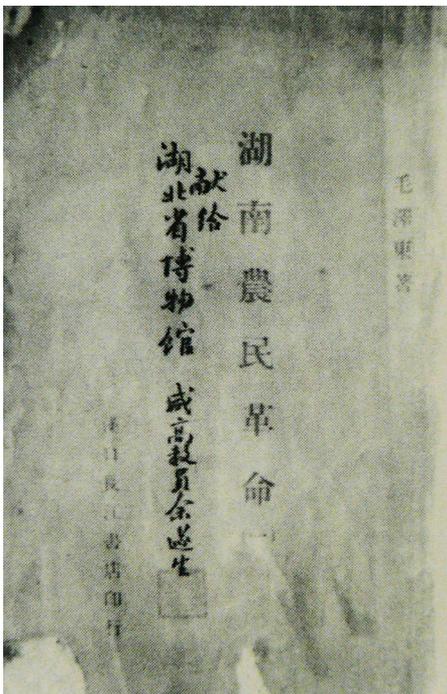
1927年的毛泽东



满腔热情地赞扬农民运动，痛斥了当时党内思想右倾者和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种种偏见、歪曲和污蔑，对那种“糟得很”的论调针锋相对，赞扬农民革命运动“好得很”。

3月，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可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刊载了这个报告的前几节后，突然停止转载了。瞿秋白对毛泽东、澎湃领导的湖南和广东的农民运动是热情支持的，他对农民运动极端重要性也是深知和关注的。1926年他在广州农讲所发表演讲，题目便是《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强调国民革命“必须要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民的一切痛苦，才能说国民革命成功”。瞿秋白看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欣喜异常，十分推崇。并对其妻杨之华说：人人都应当读几次，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必须读。《向导》停载后，瞿秋白十分不明白，非常愤慨，说：“这样的文章不敢登，还革什么命？”、“这样的材料

1927年4月，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名发行《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



▼ 1927年2月，毛泽东在武昌都府堤旧居写出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都不准宣传，真岂有此理！”遂决定将其单独印刷出版。瞿秋白将文章改名为《湖南农民革命》，交给党在武汉的出版机构——长江书店出版发行。4月11日深夜，瞿秋白抱病撰写了序文，大声疾呼：“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到战线去奋斗……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澎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昌农讲所养病，看到这本刚刚出版的还散发油墨香的《湖南农民革命》小册子，十分欣慰，病似乎也好起来了。

### ● 傲立斗争前列 传播革命真理

长江书店还出版过《革命日历》这一精致的宣传品，它能使人们在掀开日历新的一页的同时，获得一些革命的知识 and 道理。这种生动活泼，不拘一格的宣传方式，深得广大民众喜爱。此外长江书店还大量出版发行了其他书店的革命书刊，得到了人民大众的热烈欢迎和



反响。由于武汉人民群众对于长江书店发行的革命书刊求购殷切，开业之初，所有从上海、广州运来的进步书籍和革命刊物三天内即售罄。读者应接不暇，出版发行盛况空前，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长江书店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影响日益扩大，它在各地党组织支持下，在广州、成都、重庆、长沙、南昌、安庆、万县、九江都设有分店。在那风雷激荡的大革命时代，长江书店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在大革命时期的斗争中起着积极的宣传、激励战斗作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在上海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工人阶级和革命志士的鲜血染红了黄浦江。在这关键时刻，长江书店紧密配合当时的革命形势，在瞿秋

白的领导下，继续出版了大量的革命刊物，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对武汉当时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嘴脸，激励革命士气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宁汉合流，汪精卫反动集团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分共”行动，公开叛变革命，武汉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右派，新军阀一直对长江书店耿耿于怀，长江书店的出版发行受到极大的阻扰，于7月30日被武汉国民党当局搜查，印刷厂也遭到查抄，印刷机器，纸张被抢，厂长被抓。8月4日遭封闭。

### ● 长江书店历史贡献

长江书店的创办虽然只存在不到10个月，但在政治形势风云变幻的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在“四一二”、“七一五”蒋汪反革命政变的历史时刻，它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承受住严峻的考验。它出版了

► 2008年4月1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匾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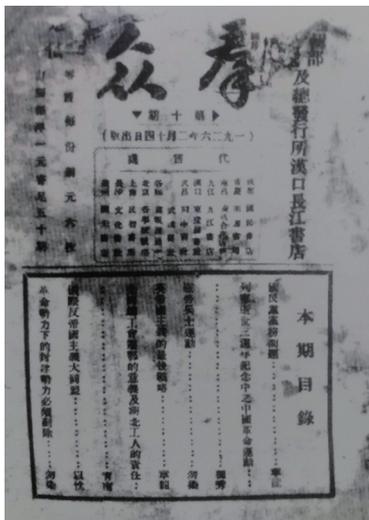


《马克思全书》、《列宁传》、《共产国际党纲草案》、《唯物史观浅释》、《新青年丛书》，以及陆定一译的《资本主义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蒋光赤的《哀中国》等进步革命书籍 50 余种，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和纲领，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这个小小的书店在大革命时期，引导了一代追求理想、奋发有为的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也为许多迷茫中的人们指引了前进的方向。

长江书店开始设在汉口交通路，后因营业额猛增，原有铺面狭小，不敷应用，遂迁至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和济生马路（今前进一路）交会处一栋三层的砖混结构楼房，坐西朝东，每层结构布局相同，均有一个宽敞通间，约 70 平方米。汉口长江书店对外是书店，对内还是党的联络站。共产党员宁崇溪 1927 年受湖北荆沙地方党组织派遣，到武汉参加工人运动讲习所学习。宁持组织介绍信到汉口长江书店，经长江书店介绍住黄陂会馆，参加工人运动讲习所第二期学习，与黄火青是同期学员。宁于 1930 年被叛徒出卖后牺牲。长江书店旧址现为初开堂中药店，房屋外观基本保持原貌，只是在三层上又加了一层，现为四层。

1983 年 4 月 7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 长江书店发行的中共湖北区委周刊《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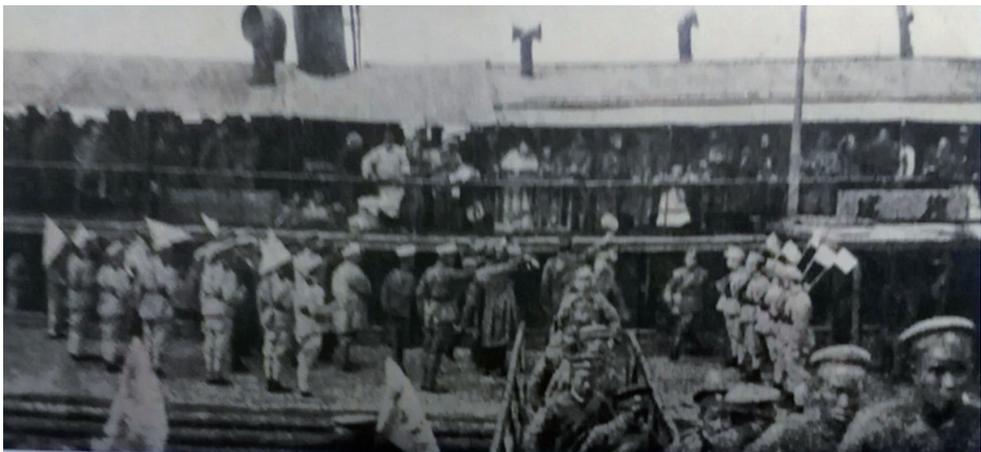
# 武汉国民政府旧址

武汉国民政府旧址位于武汉市江汉区中山大道708号南洋大楼。地处汉口商业繁华地段，北临中山大道中段，东邻民众乐园（汉口新市场），南为民居区，西隔文书巷与积庆里相望。

## ● 国民政府迁至革命中心武汉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革命中心转移至长江流域，国民党中央和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在广州停止办公，全部迁至武汉。12月10日，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人抵达武昌。12月13日已到武汉的党政要员举行谈话会，为不使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

▶ 1926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委员乘船到汉，受到热烈欢迎



国民政府旧址（南洋大楼）





权力中断，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行使中央国民政府最高职权。从此，南洋大楼作为国民政府首脑机关闻名于世。

“临时联席会议”于1927年1月1日宣布国民政府开始在汉口南洋大楼办公，并发布命令：“确定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虽然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将三镇称武汉，但从行政建制上，这是三镇第一次合为一市。

▲ 武汉各界庆祝北伐胜利暨国民政府迁鄂纪念大会

## ● 国共合作 再现辉煌

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对外行使的一项重大政府行为即是在外交上处理“一·三”惨案和收回英租界。1927年1月3日，为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在汉办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宣传队员在江汉关临江空地广场上演讲宣传，英国水兵用刺刀驱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发生流血惨案。正在南洋大楼开会的联席会议成员闻讯，立即派徐谦、蒋作宾代表国民政府处理此事。此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方代表阿马利经历一个多月的外交谈判，最终于2月19日、20日用法律的程序签定了《收

回汉口英租界协议》、《收回九江英租界协议》，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捍卫了国家主权。

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不久，蒋介石在南昌发出“改都南昌”的主张，暴露其军事独裁的本质。迁都武汉还是南昌，这决不是单纯的地域之争，其实质乃是民主与独裁之争，是关系时局发展的重大问题。1月6日，在汉的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致电南昌，针锋相对地明确表示“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照已定策略来鄂”。1月11日，以董必武、钱介磐等共产党员为中坚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国民党湖北

▶ 武汉国民政府旧址匾牌



全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发出通电，表示对国民政府暂住南昌“深滋疑虑”，要求蒋介石“根据前议，定鼎鄂渚”。与此同时，湖北省总工会、省农协、省学联、汉口商协、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武汉店员工会、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和第七军也纷纷致电要求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汉口民国日报》等报刊每天都以大量篇幅报道党、政、军、群各界要求定都武汉的呼声和消息。为了迫使蒋介石同意照原议迁鄂，武汉临时联席会议除动员群众的舆论外，还向南昌施加财政压力。蒋介石派人到武汉催领军费，武汉方称：“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

现政府在南昌，办事不动。”群众舆论蒋介石可以不理，但军费不能不要。2月8日，南昌国民中央政治会议第581次会议遂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汉。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于21日召开扩大会，决定自即日起结束联席会议，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汉正式办公。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三楼会议室举行。这是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一次充满革命热情和气氛的会议。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吴玉章等在这次会议中积极努力工作，充分体现

►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三楼召开。图为会场旧址



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共合作中的重要地位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会议的中心是解决“武力屈服于党，抑党屈服于武力之分歧”，目的在于提高党权，限制军事独裁。全会坚持国共合作的原则，通过了谴责蒋介石军事独裁，统一党的领导权，坚持联俄联共，加强国共合作，统一革命力量，坚持扶助农工政策，支持农工运动等一系列决议案。全会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不设立主席，而实行主席团制的集体领导。这一改变领导体制的办法，把蒋介石除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

务实际上撤销了。但是由于全会所推选他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委员，仍保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这就使他继续掌握着指挥各路军队的实权，从而给蒋介石留下叛变革命的资本。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讨论改选国民政府委员案，随后中央执委会选举了国民政府委员。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在武汉改组成立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有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的，以国民党左派为主，同共产党合作执行三大政策的革命政权。武汉国民政府从1926年12月中旬临时联席会议，到

▶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代表合影。一排左六为宋庆龄，二排左二为董必武，左八为毛泽东。



▲ 1927年的宋庆龄



1927年5月上旬这短短几个月中，实行扶助农工的政策，在政治上允许工农有一定的自由，在经济上给予工农运动一定的支持，在两湖地区普遍建立起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省、市、县党部，和人民群众一起果断地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对蒋介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但5月中旬开始，在国内外反动派的联合压力下，同时，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推行右倾错误，使得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一系列革命政策和措施没能认真执行。武汉国民政府日益右转，终于走向反动。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就，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

功绩，以及武汉国民政府的历史地位是有史为证的。二届三中全会也是国民党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功的革命盛会。

### ● 国共两党要人集聚南洋大楼

汉口南洋大楼在武汉国民政府期间，先后有30多位国共两党的著名人士在此聚集。宋庆龄、毛泽东、董必武、邓演达、吴玉章、恽代英、林伯渠、陈友仁、徐谦、谭平山、苏兆征、何香凝、孙科、詹大悲、刘骥、彭泽民、张国焘、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在南洋大楼共召开了27次会议，通过260多个决议案。其中蒋介

石参加了第十四次会议，与董必武等同席；毛泽东参加了扩大联席会议，与李宗仁同室。正是有了南洋大楼的“临时联席会议”。他们才有了一次难得的相聚。

宋庆龄在南洋大楼居住了两个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委员。会议期间，她反复阐释孙中山的遗志，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强调发扬民主提高党权，竭力遏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闻讯拍案而起，和许多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愤怒声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号召人们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对蒋介石反革命政变进行猛烈的口诛笔伐。汪精卫悍然决定分共时，宋庆龄当面痛斥汪精卫违背孙中山遗教的言行，发表了著名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宋庆龄的革命生涯在南洋大楼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毛泽东由此一直对宋庆龄保持着特殊的尊重。

毛泽东数次往返于南洋大楼，于1927年2月24日在南洋大楼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六次会议上，提出关于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具体计划。会议推举邓演达、毛泽东、陈

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毛泽东实际主持武昌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与邓演达、陈克文提交了《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和《对农民宣言》，推动了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成立。

蒋介石1927年1月12日至18日在武汉活动，在南洋大楼参加了第十四次联席会议。

## ● 南洋大楼爱国反帝之楼

南洋大楼由华侨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于1917年投资动工兴建，1921年落成，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武汉的办公大楼。提起建造大楼，还有一段有趣的传闻。1919年英美烟草在汉口烟草市场企图扼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用广告宣传打压南洋烟草公司卷烟，受到南洋烟草公司反击后，又想出其他手段遏制南洋烟草公司在汉发展。1920年英美烟草公司勾结有关部门，强行规定汉口新市场（即民众乐园）只许卖英美烟草公司的卷烟，不许卖国产卷烟。南洋烟草公司简氏兄弟不服气，决心正面回应，加快大楼建设，并将大楼向后城马路前延伸，将新市场正门出路堵死，大楼建成后，新市场与南洋大楼之间只留下贤乐巷这条窄巷子进出，有的人又把南洋大楼叫“拦阳大楼”。



南洋大楼分为前后两栋，前面一栋系主楼，五层，占地面积 88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747 平方米；后楼系附楼，占地面积 300 平方米，建筑面积近 2000 平方米，四层主、附楼每层有天桥相连，以便利往来。主楼是一栋富有特色的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西式楼房，楼顶辟有屋顶花园，顶端拥有圆柱尖顶，两侧各有一圆顶，那顶层中央的塔楼尖顶显得傲然不群。主楼临街一面的房檐高 22 米，加屋顶建筑物最高处则有 30 米，是当时汉口为数有限的几座高大建筑物之一。整个南洋大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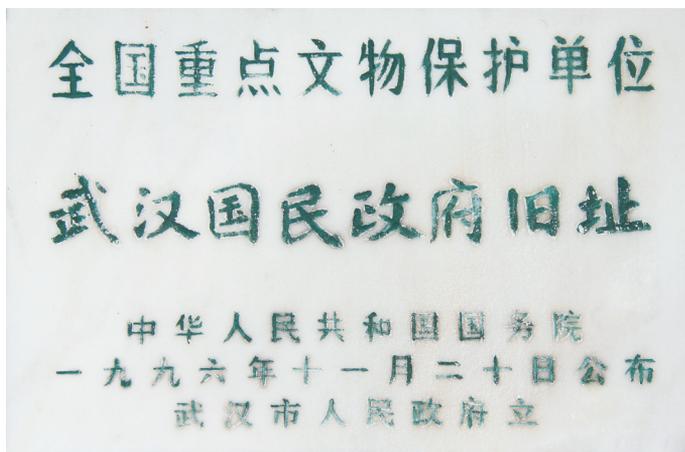
特别是主楼，结构坚实，造型美观，内部装修十分讲究，堪称当时第一流的豪华建筑。即便是现在中山大道六渡桥民众乐园闹市区，奔涌的繁盛与喧嚣，也丝毫阻挡不住南洋大楼古朴夺目的风华，富丽雄伟的气度。大楼建成后，主楼用于办公、营销（一、二层）和开办饭店（三、四、五层），附楼则系内部职工住宿和生活之用。而且该大楼正好矗立于新市场门前，挡住并压倒新市场，表现了民族企业凛然抗争的意志。南洋大楼不仅作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汉的办公用房，也是公司在汉销售烟草的存货基地和营销中心，与英美产品



对垒抗衡，成为民族资本对抗外国资本的生力军之一。国民政府从广州迁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主动让出南洋大楼作为武汉国民政府办公场所。

1959年，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公布南洋大楼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在三楼设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纪念馆，对外开放。1995年9月公布为武汉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6年11月20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武汉国民政府旧址处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纪念馆匾牌





“一·三”惨案遗址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沿江大道苗家码头一带。

### ● 英兵施暴 残杀我同胞

1927年元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正式在汉办公，武汉三镇人民群众为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连日举行集会、游行、演讲等各种庆祝活动。国民政府办公大楼（即南洋大楼）门前，江汉路至六渡桥一带，

到处挂灯结彩，灯火辉煌。元旦那天，武汉市民在庆祝大会之后举行水陆游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科组织已到校的部分学生，成立宣传队，于元月1日—3日在街头巷尾进行宣传活动。3日下午，宣传队员来到汉口一码头江汉关钟楼下的一片空地广场上演讲。面对英租界内的沙包电网和往来巡逻的军车，人民愤怒控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民众、干涉中国革命的罪行。这沙滩集会之地与英租界近

在咫尺。英租界的印度巡捕在中国也是威风惯了的，何曾见过中国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如此狂欢过。尽管演讲者与听众秩序井然，租界内的英帝国主义者如临大敌。英租界工部局请驻汉英海军长江分舰队司令卡梅伦调兵上岸支援。下午3时许，先是租界的印度巡捕跑来进行无理干涉，妄图用警棍驱散集会人群。紧接着驻扎在汇丰银行的几十名英兵冲出大楼，停靠在江边的英舰上一队武装水兵持枪登岸，越界对中国民众实行粗暴的威胁和驱逐，持枪冲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当场刺死中国海员一名。海员工人李大生的大肠被英水兵“随刀拖出，血流遍地，命在旦夕”；方汉生、明宿延惨遭毒打，腰部头部深受重伤；其余工人市民被英兵刺刀枪托刺中打伤手足及面部者有张义贵、祝香山、伍宜山、夏兴发、韩素生、萧中有、李海山、叶泽昆、许士希、朱太平等30余人，多为武汉人力车夫工会、码头工会会员。在迷蒙的阴霾下，江汉关钟楼又一次目睹了英帝国主义的暴行。





▲ 1927年1月，英军在租界边设置电网



汉口英租界是 1861 年 3 月，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与驻华公使馆参赞巴夏礼率舰队抵达汉口后，与清政府湖广当局签订《英国汉口租地原约》，划定了汉口英租界。中日甲午战争后，德、俄、法、日等列强竞相仿效，在汉口中山大道以南，长江沿线上起江汉关，下至黄浦路的大片区域，竖起了钢筋混凝土西式建筑。租界的围墙和铁栏，割裂着汉口城市和中国领土的主权。英国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权力最大猎获最丰”的西方列强，是把中国推向半殖民地苦难深渊的罪魁祸首。在汉口英租界，英国拥有司法权、军队通过权、征收赋税权等。其领事馆不仅自主综理其民政、交通、警事、税务、邮政，而且收集地方情报，干预武汉政事。这样，租界成为武汉的“特殊城堡”，外籍领事竟成为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的“太上皇”。其掠夺欺凌中国人民的旧恨新仇罄竹难书。

“一·三”惨案发生，广大民众怒不可遏，群起抗争，以石子、扁担等物还击英兵。英兵仓皇退却到租界防御工事后，举枪对准广场上的群众；日清洋行等高层建筑上，英兵架起10余挺机枪；停泊在江中的英舰向北岸移近。双方对峙，一触即发，形势万分紧急。此时，正在汉口南洋大楼开会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闻知此事，进行了紧急磋商。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应取比较强硬之态度办法”。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延当即提议：一、派代表至现场向群众宣示政府对此事的立场和办法。二、派警察隔断群众与英水兵以保护群众，总工会抽人协助；外交部与英租界当局严正交涉，令其从速撤退水兵。会议据此作出了相应的决议，遂急派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主席、司法部长徐谦、湖北省政务委员蒋作宾来到现场。李立三、刘少奇等人闻讯也从湖北省工人代表大会会场赶赴现场。

国民政府代表向英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英水兵放下武器，停止挑衅。徐谦背对英水兵的枪口，站在高处宣布：政府必当采取适当办法保护人民，防止此后再有此等事件发生，为人民报仇雪耻。在政府未决定办法前，望人民离开，以免危险。

当晚，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在外交部召见英国驻汉领事，提出口头抗

议。要求英方将水兵于24小时内撤回舰上，同时肇事军舰不得擅自离汉，否则在他处有危险，国民政府不负责任。

### ● 中共组织反英示威集会

英兵在汉口施暴的消息不胫而走。傍晚，愤怒的群众自发地从四面八方向租界附近集中，“打倒英帝国主义”“收回英租界”的怒吼如雷霆震响，激动万分的民众大有进攻租界灭此朝食之势。

这声势浩大，同仇敌忾的场面，令英帝国主义者不知所措。英国海军长江分舰队司令卡梅伦事后说，“这场骚乱的整个行动，给我们印象是这不是一场寻常的苦力骚乱”，如果诉诸武力将带来不可想象的后果。英汉口领事葛福与副领事胡阶森说，他们当时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尽可能争取足够的时间，使所有的英侨，特别是散居在租界外的英侨全部安全撤离。

葛福和卡梅伦之流深感他们已处在中国人民强大的革命风暴之中，遂于4日凌晨2时被迫将水兵和义勇队撤至江心军舰上，并请国民政府派军警进驻租界维持秩序。

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在惨案现场了解情况疏散群众后，连夜召开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负责人紧急联席会议，商量反英斗争决策。会议以湖北全省

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名义，通过了对英斗争的六项要求：一、请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二、要求英租界当局立即拆除电网、沙包等军事设施；三、要求立即撤退在华军舰，在租界内永远不得有武装军警驻扎；四、要求赔偿死伤损失；五、要求英政府向我政府道歉；六、要求将凶手移交我政府惩办。会议还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奋起，以最大的努力，扑灭此人类公敌世界恶魔之英帝国主义”。

1月4日上午11时，湖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200多个团体的代表在汉口总商会召开联席会。以省总工会的六项要求为基础，补充为八项对英办法，请政府据此向英领事交涉，限72小时内圆满答复。如英领事无圆满答复，则请政府封锁英界，收回英界，收回关税，通知英政府，不负在华英人治安责任。会议还推选代表到南洋大楼，请政府据此向英进行严正交涉。同时决定5日下





午举行反英示威运动大会，还成立以省总工会、汉口总商会等团体代表10人组成“武汉市民对英外交委员会”誓作政府后盾。晚7时，在汉口新市场大舞台，徐谦等向武汉各团体代表宣布，“此次对英交涉，政府与人民完全一致，当取强硬办法，以慰人民之愿”。武汉人民备受鼓舞，各业

工会纷纷组织自己的会员，高举火把涌入英租界，深夜十一二点开始散开。

1月5日下午2时，细雨濛濛，武汉30万市民在汉口济生三马路空坪（今前进二路一带）举行反英示威大会。

会后，这支庞大的反英示威游行队伍涌上中山马路（今中山大道），如一条长

◀ 当年《大刚报》的报道

龙行进在风雨中。尽管会议主持人李立三当时宣布不进租界，但是愤怒的群众完全不理，浩浩荡荡直接向英租界进发。码头工会委员长张继渠和海员工会负责人周何亮率领码头、海员工人走在最前列。队伍临近江汉路时，工人们呐喊着，像一群愤怒的雄狮，冲进英租界。

### ● 同仇敌忾 夺回租界扬国威

英工部局人员及巡捕皆弃职逃避。英国领事馆的米字旗被扯下来，取而代之的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旗帜。这是民族的胜利，是民众狂欢的节日，是大快人心、扬眉吐气的日子。

## 國內要聞

央水兵慘殺漢口同胞

激成武漢市民

三十萬人之反英示威大會

▲到四百餘團體代表通過重安議決案五項

◎一致擁護國民政府  
◎服從政府命令嚴守秩序  
◎誓為政府外交後援  
◎外交部將通告外僑  
◎租界由中國軍警管理  
◎治安決無問題  
◎儘可安心照常營業

▲昨日英租界之安靖情形：市民經過租界秩序井然，政府籌決組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

武汉国民政府随即由外交部、交通部、财政部各派一人，连同武汉卫戍司令部汉口办事处处长，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代表陈群等五人，组成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并正式照会英领事，接管租界，主持租界内一切治安、卫生、市政事宜。7日，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改由外交部、交通部、财政部三位部长组成。以外交部长为主席委员，下设警务处，秘书厅，分别在英租界巡捕房和工部局办公。

继汉口“一·三”惨案之后，英帝国主义又在九江制造了打死打伤中国工人的“一六”惨案。九江人民再壮国威，在北伐军的配合下，于1月10日接管英租界。

武汉、九江人民接管英租界壮举，迫使英帝国主义者坐到了谈判桌前。1月11日，英方代表，北京英使馆参赞阿马利乘军舰逆江而上，率舰艇6艘来汉，气势汹汹，停泊在英领事馆附近的租界五码头（今天津路口）江面，企图以炮舰政策，威胁中国人民。12日，中英两国外交官员第一次接触。1月15日，中英谈判正式开始。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武汉工人阶级及广大民众不仅提出政府采纳的对英交涉意见，而且以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持续高涨的反帝斗争声势，成为支持武汉政府外交谈判胜利的坚强后盾。

为了保证收回英租界谈判的顺利进

行，武汉国民政府及其外交部从1月5日起发布了一些布告和通电，要求民众“协助政府维持公共安宁秩序”，“避免一切危害外人生命财产之行动”。

领导民众运动的中国共产党也制定了正确的斗争策略，“使民众明了反对帝国主义是有计划的行动，须极力避免一切原始暴动的状况”。1月5日，刘少奇在接见湖北全省工人代表时，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应当恪守秩序，帮助政府维持英租界治安”。湖北全省总工会也发出通告，不要聚集英租界，发生纠纷，如英租界有巡捕上街，不得施以殴打，不得在租界上叫闹。

6日起，英租界内交通秩序恢复，邮局开始办公。7日，租界内秩序完全恢复正常。武汉工人纠察总队长朱菊和宣布省总工会的命令，带领300名纠察队员自动退出租界，将维持治安管理的任务移交给了中国军警。24日，汉口的英国商会在一度停业后宣布全部复业，英国记者兰姆逊亲自到汉口英租界实地考察后，发出了“汉口的租界秩序井然”的报道。

英帝国主义一方面谈判，一方面想通过武力干涉，保持在华势力和利益，他们以“护侨”为名，悍然从英国本土、印度与香港发兵三旅，派往上海，对中国人民进行武力高压，威胁恫吓。为配合军事行

file  
franchises  
Foreshore Rights

~~As of~~

## Agreement Relative To The British Concession At Hankow

The proper British authorities will summon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Ratepay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nd Regulations on March 15th. The British Municipality will thereupon be dissolved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ncession-area will be formally handed over to a new Chinese Municipality. Pending the handing over to the new Chinese Municipality on March 15, the policing of the Concession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public works and sanitation will be conduct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now in charge there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will upo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British Council forthwith set up a special Chinese Municipality, modelled on that of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ncession-area under Regulations which will be communicated to H.B.M. Minister by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hese Regulations will remain in force until such time as arrangements have been negotiated for the amalgamation of the five Hankow Concessions and former Concessions into one unified municipal district.

Dated this 19th day of February, 1927.

(Signed) CHEN YU-JEN,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Nationalist Government.

For H.B.M. Minister,  
(Signed) OWEN O'MALLEY.

动，又在汉口实行经济封锁政策：关闭汉口英烟厂，造成工人大量失业，引起社会不安；停止汇丰、麦加利两银行及各洋行的营业，把现金不断地私运出口；禁止与华商往来，使华商不能提款，不能交割货物。企图达到其罪恶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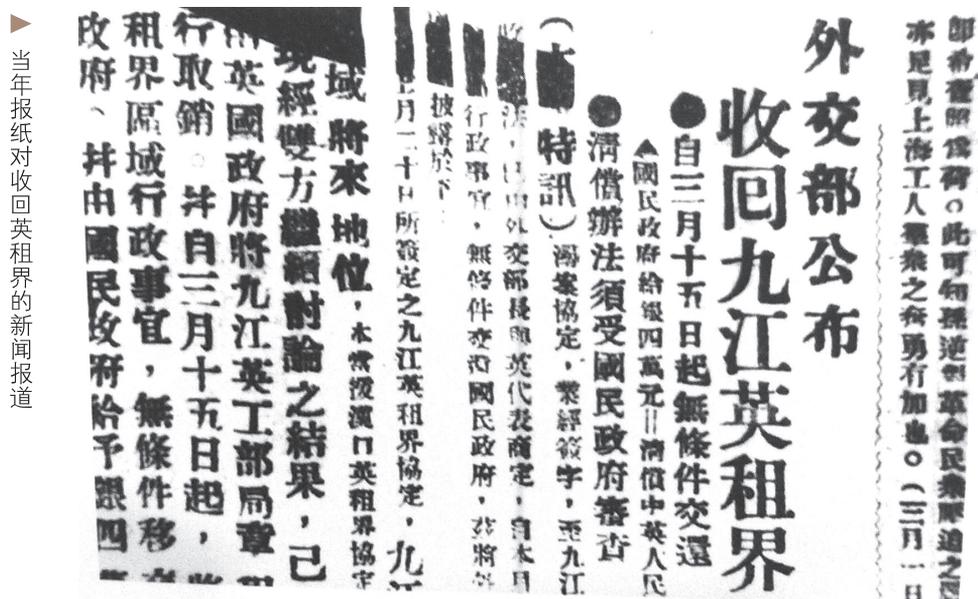
武汉国民政府顶住压力，一方面在外交谈判中据理力争，折冲樽俎，一方面依靠民众的力量战胜英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公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站立起来，拥护国民政府，公开表明对于国民政府的支持。

武汉工人阶级及广大民众积极抗争，各工会组织纷纷发表反英通电，开展各种

活动对英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下，整个江城始终充满浓烈的反英斗争氛围。

经过 16 次会谈和反复斗争，2 月 19 日下午 7 时，中英双方在汉口签订了《关于汉口英租界之协定》。次日，又签订了《关于九江英租界之协定》。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法律手续完成。1927 年 3 月 15 日，中英双方正式办理移交手续，从而结束了英国对汉口租界长达 66 年的殖民统治。

在这场维护民族主权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发挥了巨大作用，武汉国民政府顺应历史潮流，旗帜鲜明地坚持反帝立场，英国在当时所处的特定历



▶ 当年报纸对收回英租界的新闻报道

► 1959年6月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公布的  
『一·三』惨案遗址匾牌



史背景下不得不承认失败，中国人民取得了收回汉口英租界这一空前伟大的胜利。这在我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1959年6月，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一·三”惨案遗址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 ● 不可忘却的爱国人士陈友仁

收回汉口英租界的历史事件中，不得不说一下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陈原籍广东顺德，1878年生于南美洲的特立尼达南部圣费尔南多镇一个富裕华侨家庭。洗礼时取教名为尤金·伯纳德·阿陈。毕业于圣玛丽学院后执业律师。

► 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



愤怒的武汉民众围堵英租界，抗议英军暴行



成为特立尼达的第一名华人律师，时年21岁。

陈友仁于1912年回国。初在北京英文《京报》任总编辑，著文反对袁世凯。1916年反对段祺瑞与日本签订军事密约，被捕下狱。经郭泰祺介绍，认识孙中山和廖仲凯。1918年底随王正廷、郭泰祺参加巴黎凡尔赛和会。1920年，他变卖所有家产，资助孙中山革命。1926年在广州就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年底来汉。

### ● 维护尊严 不辱使命收回英租界

“一·三”惨案发生后，陈友仁肩负谈判的艰巨任务。他一方面听取汇报，一方面派儿子陈丕士到肇事地点了解情况，尽可能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他对当时汉口江面上停泊的53艘军舰，镇定自若。他认为，英国当局不得不考虑这样的事实，武汉国民政府不是义和团运动时的清政府。

▼ 江汉关侧前广场，英水兵就是从这里上岸的

当晚，陈友仁在外交部召见英国驻汉领事，提出口头抗议。要求英方将水兵于 24 小时内撤回舰上，并解除他们的武装。汉口民众、九江民众接管英租界后，陈友仁任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席委员。12 日中英外交官见面。面对老牌帝国主义的外交人员，陈友仁表现得不卑不亢，有理有利有节。他以严谨的逻辑思维，强烈的爱国精神和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英国人谈判。英方代表阿玛利提出，谈判要以“一·三”事件前的状态为基础，向英方退还汉口、九江英租界。陈友仁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当即严正表示，如此办法，必定引起较现在更险恶之局势。现双方交涉，且可依照现在之状态，即中国人民接管的基础为前提，不能以此前状况为依据。1 月 15 日谈判正式开始。第二次会谈时，英总领事对英国人的财产未受任何损失表示感谢。英方提出，让舰船上的英国侨民返回住宅，并由英国领事馆继续管辖租界的要求。陈友仁提醒他们说：恐怕我们要应付另一种局面了。英国人问：这是什么意思？陈友仁说：因为英国政府已经放弃了租界，所以租界的管辖权已经归



还中国了。英国人说：是以什么方式归还的？我们并没有放弃租界。陈友仁说：你们国家的人都从中国政府租借给你们的这一地区撤离了，在这块土地上，没有留下一点足以表明甚至是象征性的占有，因此，用你们自己的习惯法原则，这块地为中国人民所有，作为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中国政府，已恢复了这块领土上的主权。在谈判过程中，英帝国主义玩弄各种狡猾手段。一方面，对中方代表只承认为地方政府代表，不谈及“交换租界”等法律问题；另一方面从军事和经济上进行威胁。陈友仁在谈判中对英方代表进行有理有据地反驳。武汉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国际进行有力地斗争。英国政府被迫于2月3日向中国表示，对过去的不平等条约中的一些条款可以修改，在原来的基础上退了一步。于是陈友仁和阿马利在谈判停顿6天之后于2月7日继续进行。

此后，由于英兵到沪，陈友仁不怕威

胁利诱，维护国家尊严，谈判又复停顿，协定签字几经反复。在陈友仁坚持英国先从上海撤兵后，再在协议上签字。直到2月19日下午6时，阿马利拜访陈友仁承认上海英兵撤退，陈方表满意。这样经过陈友仁16次会谈和反复斗争，阿马利被迫签字。按照协定规定，中国政府从3月15日起正式收回英租界。汉口英租界地域按汉口市政管理章程，成立汉口第三特别区管理局。从此英租界改为汉口第三特别区。收回汉口英租界的工作是陈友仁外交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七一五”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陈友仁辞职赴苏联，1932年一度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力主抗战。后与蒋不合而去。嗣后，陈友仁闲居香港，日寇占领香港时将其逮捕，押送上海，1944年病逝。新中国建立后，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专为陈友仁立了一块纪念碑，以纪念他为中国人民作出的贡献。

# 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旧址

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旧址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前进五路 111 号，原为汉口宁波会馆。

## ● 武汉工运 威震全国

1926 年北伐战争胜利进军，武汉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北伐军占领汉口后，武汉工人代表会即在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设办事处公开办公，每日前来洽谈工会事务的代表络绎不绝。后因地点面积不大，始迁至友益街办公。许多新的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在此基础上，9 月 14 日，武汉工人代表大会在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

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旧址外景



► 1927年的刘少奇



宁波会馆召开了各工会代表恳亲会，100多个工会团体的4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惩办工贼”、“各停工工厂定期开工”等提案。决定改组武汉工人代表会为武汉总工会。9月17日，李立三奉中共中央之命，在汉口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口办事处，并任主任职务，负责指导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人运动。9月20日，全总汉口办事处召集武汉各工会代表会议，决定成立湖北全省总工会。同时，规定一种产业或职业只能成立一个工会。统一各工会章程

► 武汉工人纠察队员



及组织法，反对工会分帮分派。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昌这天，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大会在汉口宁波会馆隆重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各省工会和省农民协会的代表向大会致词祝贺。到会的代表及来宾5000余人，代表80多个工会组织和10万会员，盛况空前。大会发表的成立宣言指出成立总工会的意义及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历史使命。会议选举向忠发为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许世光为秘书长（不久由刘少奇兼），同时决定设立总工会武昌、汉阳、硚口三个办事处，以便更好地领导武汉的工人运动。省总工会成立后，湖北、武汉的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至年底，武汉工会组织就猛增到200个以上，有组织的工人达20万人。随着湖北省总工会的建立，各级工会组织成立了工人纠察队，武汉工人纠察队是省下属的一个总队。初期总队下设有两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设三个分队，分队下设若干支队，另有女工纠察队。总队最早的负责人是朱菊和。纠察队各级领导骨干来源于黄埔军校来汉的学员和工运积极分子。1926年11月，武汉工人纠察队员发展到2000余人。工会组织建设又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武汉工人运动声威震动全国。

▲ 1927年的李立三



### ● 工运问题 注重教育

北伐战争的胜利激起了武汉工人阶级极大的革命热情，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许多工会仅有形式和群众，各自为政，独立采取行动，缺乏自上而下的领导，各工会很少有很好的执行委员会和很好的代表会，缺乏健全的组织 and 充分的训练。总

工会的领导虽努力工作，但人力有限，各层次的工会干部人才太少，经验不足。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如过多的游行集会，用带有暴力倾向的斗争方式解决处理劳资纠纷，提出超越实际可能的经济要求等。看到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对武汉工运也直接作出了10条规定，其中一条规定总工会及国民党省党部均须即速开办一职工运动学校。中共中央对武汉工运的指示，是在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作出的。这次会议于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在汉口召开的。会议为工运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了解决巩固工会组织，增强工人阶级战斗力等问题，担任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秘书长兼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的刘少奇深入斗争第一线，调查研究，针对工人运动中和工会组织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于12月26日至28日撰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和《工会基本组织》三本小册子。为工运发展指明了方向，并直接指导了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7年1月1日召开的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月9日举行选举，代表们选举李立三、刘少奇、向忠发等35人为省总工会执行委员，并选出候补执行委员9人。向忠发任委员长，刘少奇任秘书长，李立三任外交主任，林育南任宣传主任，项英任组织主

任，朱菊和任纠察队长，许白昊任经济斗争委员会委员长，聘请刘伯垂为工会法律顾问。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把宣传教育推入一个新时期。大会专门通过了宣传及教育问题决议案，提出应使工会“真正成为教育工人的学校”，要运用一切机会做教育人的工作。据1927年5月统计，武汉有工人学校53所，学员7738名。

### ● 开办讲习所 培养工运骨干

湖北全省工人运动讲习所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为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造就“深明党义之工运实际人才”而在武昌、汉口两处开办的，由林育南兼所长，许之桢具体负责。工人运动讲习所从1926年10月至1927年7月招收了两期学员，加上一期速成班学员，共培训干部500人。1927年1月21日，湖北全省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在汉口宁波会馆开办，学员90余人。工运讲习所以研究中国和湖北的工人运动为中心，组织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工运常识、历史知识。授课教员多是共产党员和著名工运领袖，如李立三、刘少奇、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林育南、许白昊、张国焘等。李立三讲授《罢工战术》、《五卅运动》、《苏俄状况》、《国民革命与工人阶级》、《湖北职工运动的状况及其趋





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汉口宁波会馆旧址

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旧址  
(宁波会馆) 外貌





函请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拨枪350支、子弹2600排，以让学员进行军事操练和实弹射击，所以工人运动讲习所又被誉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军官学校”。学员毕业后，思想政治素质、组织领导能力、文化水平和军事技术方面都有较大提高。湖北省总工会将他们分配到武汉市及各县指导工运，成为为工人解放而奋斗的先锋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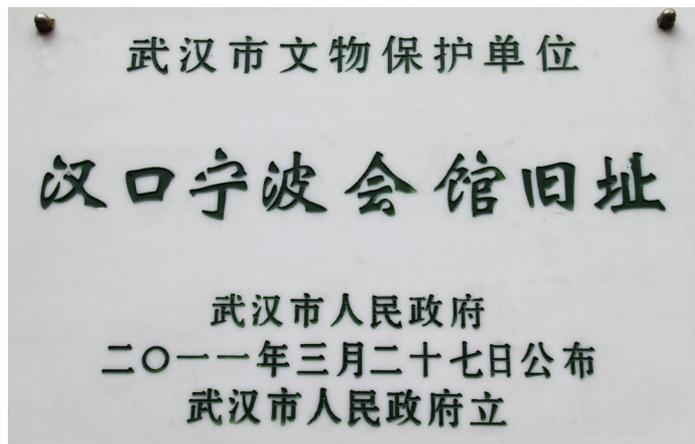
1927年1月12日，蒋介石由南昌到达武汉。在其留汉期间，蒋不接受国民政府的安排，下榻宁波会馆。期间蒋在宁波会馆与江浙地区在汉工商界重要人物会面，以同乡身份联络感情，试图制造影响。蒋在宁波同乡会恳亲大会上发表演讲，竭力劝说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浙江宁波籍成员同意他的意见，把国民政府迁往南昌，实现他的梦想，然而会场却无一人应和。蒋只好悻悻而去。

宁波会馆，建于1924年，地上3层，地下1层，属于现代风格的古典主义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其建筑特点是纵横三段划分，主入口在正中，通过台阶进入，大门上方三层开有圆形窗，两侧立有一根爱奥尼克柱。二层窗均有窗楣，中部是三角形罗马式，其他为半圆形拱形窗楣，二、三层窗均用窗套连接一起。檐口上部雕有装饰花纹。墙面为斩假石。它与旁边的江苏

会馆在二楼处有一连廊连接在一起。现为江汉区教育局。其前身是宁波商人创办的“宁波旅汉小学”。该小学最早于1912年由宁波会馆主事盛竹书和唐爱陆创办，据1920年《夏口县志》记载，当时该校位于汉口第四区德华里。后来该小学改名私立汉口宁波小学，随宁波会馆搬迁至此，就在隔壁与宁波会馆紧密相连。

1993年7月会馆旧址被评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2011年3月27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 汉口宁波会馆旧址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优秀历史建筑匾牌



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登记处旧址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江汉路贯中里。

### ● 中共早期组织建设的摇篮

1925年8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建议中共中央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依靠革命工人扩大党的队伍上”。10月，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的中央执委会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提出，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担当起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任，“第一便是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知识阶级中革命分子”。会议认为：“共产党假使不能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发展和巩固，那么，中国无产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向前发展，简直无从设想。”中共中央又于12月12日发表《通告第六十八号》，指出，“一是应尽量扩大本党组织，使之群众化；二是尽量扩大本党的政治宣传深入群众，使本党成为事实上公开的党。”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提出：“党员数量上的增加，目前我们更应努力，必须是广大群众的党才能担负起这日愈艰巨的革命工作。”1926年10月，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发出《给各级党部的信》，他在信中提议：“我们党在明年春天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党员应发展到四万以上。”并给各

个地方党组织分配了具体的发展指标。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由于中共中央一改过去认识，把迅速增加党员数量当作党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来抓。群众运动的广泛开展推动了党员队伍的迅速壮大。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不久，湖北武汉的党组织迅速发展。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从1926年9月开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从各地抽调大批干部至武汉工作，任命张国焘为中央驻汉代表，并先后调彭泽湘、项英、林育南、李立三、罗章龙、陆沉、汪泽楷、聂荣臻、蔡畅（聂、蔡随军到汉）、李硕勋等充实湖北区委外，10至12月，刘少奇、毛泽东、吴玉章、恽代英、张太雷等亦奉命相继抵汉，这是中央为加强北伐军占领地区的工运、农运、上层统战、军校工作派来武汉的得力干部。加上原来即在湖北区委工作的董必武、陈潭秋、蔡以忱、许白昊、陈荫林、李求实、吴德峰、周唯真等同志，可以说这一时期党在武汉

的人才荟萃，工作也做得成绩斐然。然而，当时武汉是全国革命的中心，这里发生的问题往往牵动全局，而政治风云瞬息万变，很多问题都不是地方党组织所能解决的。党中央远离武汉，对一些重大问题不能及时、正确地决策，为此，要求中央机关迁武汉的呼声便渐渐高了起来。

陈独秀始终坚持“上海最重要”的观点，所以不愿将中央机关迁离上海。但是，由于革命中心向长江流域的转移。至1927年4月上旬，留在上海的中央执委只剩下陈独秀1人，而党的四届中央执委会委员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从1926年冬，已从各地陆续云集武汉，就地指导工作，事实上中央机关已逐步向武汉转移。

为了便于就近指导工作，从4月4日起到4月20日，在武汉连续召开了共产国际代表、中央执委以及湖北区委的联席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后决定：4月20日召开中央全会，4月25日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决定：由中央执委、湖北区委与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当即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常务委员。会议还决定致电上海



贯中里

催陈独秀速来，并把中央迁到武汉；以中央名义发电报要各地代表来武汉开会。这样，中央执委、湖北区委与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席会议事实上已在武汉行使党的最高职权。尽管陈独秀对党中央机关迁汉持一种消极被动态度，但迫于当时上海日益险恶的政治形势，并面对大多数中央委员们已齐聚武汉这一事实，同时又连续接到

鲍罗廷及在汉的中央委员们催请他速来武汉的电报，他终于不得不离开上海，于4月中旬到达武汉。原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秘书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农委、中央工委、中央妇委、中央军委等部门在此前后也陆续迁到了武汉。

中央机关迁到武汉时，全国党员人数已达 57967 名，武汉的党员达 8000 人，

这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武汉党员数的最高峰。全国党员人数比 1925 年扩大近 6 倍。受中央直接领导的区委有 8 个、地委 6 个，党的组织几乎遍及全国。组织工作的任务量也大了。中央组织部内专门设党员登记处负责党员登记管理工作，党员登记处设在江汉路贯中里。据洪杨生回忆：“我是 1927 年春从东北派到武汉的，担任党中央组织部党团员登记处领导，负责登记工作。中央组织部在汉口贯中里，当时的组织部长是张国焘。当时组织部有一个办事员叫朱孔阳，浙江余姚人，‘七一五’事变后，朱就回余姚去了，以后情况不明。”

1927 年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中央机关迁离武汉。随后中央机关陆续撤离武汉。

### ● 贯中里 南昌起义运筹地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武汉的形势也在向“右”转，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已有与共产党决裂的苗头。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对汪还抱有幻想，总想以某种妥协来谋求缓和与国民党右派的尖锐矛盾。陈独秀于 6 月 28 日在汉口鲍罗廷住宅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最后决定宣布解散工人纠察

▶ 贯中里江汉二路出口



队，消除国民党右派及反动军官暴动的口实。一支已发展到有5000多人，3000多支枪的革命武装被解散，此事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和工作上的手忙脚乱。陈独秀等人以为这样就可以取得汪精卫等人的谅解，延缓或制止他们的叛变。其实，国民党汪精卫集团的反共政策已定，决不是共产党解散一支纠察队，上交几支枪所能制止和避免的。这种妥协和退让并未获得反动派的让步，反而使其更加猖獗。据当时《汉口民国日报》登载，解散工人纠察队的消息“朝时露布，而反动派夕散流言”，甚至唆使流氓地痞捣毁工会，殴辱工会负责人。28日，反动军官李品仙派部队占领武汉总工会，其余行业工会等处均有反动分子捣乱。29日，何健部队移驻汉口，公开发表训令，大肆污蔑工农运动，作好了反共的军事和舆论准备，其势汹汹，已经是剑拔弩张地要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开刀了。7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中共中央指示，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2日，临时中央常委会正式成立。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时候，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及吴玉章、朱德、刘伯承等在中央组织部秘密住地——贯中里召开会议，参加会

议的大多是四川籍的革命志士。会议主要讨论泸顺起义失败后，部队的善后事宜和发展革命军事力量以及应付紧急情况的问题。周恩来分析了当时革命正处于转折关头的形势，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目前革命势力虽有分化，但革命洪流不可阻挡，终会浩荡前进。吴玉章认为，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恐怕为期不远，要做好应变的准备。朱德也认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内部像个烂冬瓜，外面好看，里面已烂得难以救药。汪精卫是以“左”派领袖来迷惑人，其实是假左派，终究靠不住。刘伯承也感到武汉的情况越来越不对头，血雨腥风就要降临武汉城头。周恩来征询与会者的意见，是回四川还是留在武汉？朱德早有“上山打游击”的想法。他以自己在江西担任第三军军官团团长的工作经历，认为江西大有作为，他在军官团撒下了革命火种，发展了不少中共党员，有的连党员达到学员的三分之一。提议同志们“到江西去”，在那里发展革命军事力量。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果断作出举行南昌起义的决策。吴玉章、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先后到江西，筹备南昌起义。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成功。

贯中里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其业主是菲律宾华侨伍爱瑞先生。它是以伍氏



今日貫中里巷內



1927年中共中央军委主任、军事部长周恩来

宗祠“贯忠堂”而得名“贯忠里”。1967年改名为“爱国里”，1972年恢复原名，但将“忠”改为“中”字。该里弄的总建筑面积大约为8000平方米，有36个门栋，成丁字形排列。每个门栋的式样和结构基本相同，全部为二层楼砖木结构，具有古朴的建筑风格。属单开间，一扇大宅门，进门是大天井，中间是堂屋，旁边是房间，堂屋后是个小天井，后面是厨房，小天井旁是楼梯，上楼一处是亭子间，再上楼是二层楼的房间，楼上房间上面有个小平台。解放前贯中里在江汉路和江汉二路的出口

各有一扇大铁门，有专人看守，闹中取静。旧军阀和资本家在这里居住，每个门栋只住一户人家。多数门栋的大天井内停放有黄包车，是户主家的代步工具，一副豪门贵族气派。

解放后，贯中里的业主与政府办理了托管手续，由江汉区房产公司延安房管所代为管理。1997年特别是2004年“883行动计划”对贯中里进行二次大规模的修缮，里弄更显整洁靓丽，多次被市区誉为先进文明里弄。

# 血花世界旧址

血花世界旧址（现新民众乐园）位于武汉市江汉区中山大道。原名为汉口新市场，筹建于1917年，1919年5月29日开业，是当时武汉三镇最大的综合性娱乐场所。



1919年5月29日开业后的民众乐园内景

血花世界（今新民众乐园）外貌





ZAKKA

新民乐园

Cap/taMails  
Asia  
东汇集团

食尚  
更精彩

潮爆  
更精彩  
就爱这  
young

## ● 血花世界 当年的国家剧院

1926年底，北伐军攻克武汉，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在南洋大楼召开会议，并通过决议案，“在汉口设一大规模之人民俱乐部”。新市场作为“逆产”被没收，改为“中央人民俱乐部”。由血花剧社负责人李之龙等人为筹备委员，负责中央人民俱乐部工作，当时成为革命的政治文化活动场所。后又取“烈士之血”浇灌“主义之花”之意，改为“血花世界”。场内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孙中山的巨幅照片。四周张贴许多鼓

舞士气、宣传革命的标语以及革命形势发展图表，营造出浓郁的革命氛围。共产党人刘少奇、周恩来、李立三、瞿秋白、吴玉章、董必武、向忠发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都在这里做过演讲，宣传革命理论。

1926年12月30日，在汉口血花世界的一间房间里，中共工运领袖李立三、刘少奇、林育南等与二三十个工人代表举行会议，会议由林育南主持。此次会议即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预备会议为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



大会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1927年1月4日晚7时，武汉国民政府在大舞台向武汉各界团体代表宣布政府对处理“一·三”惨案对策，武汉人民备受鼓舞，坚定全市人民反英斗争士气。

### ● 世界级的劳动大会在此举行

1927年5月20日，在汉口血花世界大舞台召开了太平洋劳动大会。此次大会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早在1926年2月，澳洲新威尔南士工人代表大会决定由澳洲工联合会于同年7月1日召集太平洋劳动大会。及至开幕时，只有少数代表到会，遂将其改为预备会议。此时，“五卅”反帝斗争及省港大罢工使中国工人运动成为举世瞩目的东方被压迫民族工人运动的中心，会议乃决定将太平洋劳动大会移至中国召开，由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筹备工作。随着中华全国总工会北迁至汉以及广州李济深的叛变，会议也由原定广州移到武汉。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3人，其中日本6人，朝鲜1人，法国1人，苏联5人，中国15人，美国2人，英国1人，爪哇2人。加拿大、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代表因故未能赴会。中国共产党代表瞿秋白、全国总工会代表刘少奇、湖北省总工会代表向忠发、国民党省市党部代表徐全直、詹大悲等各机关团体代表出席了开幕式。

大会主席苏兆征致开幕词。他简要回顾了会议的发起和筹备经过。重点阐述了召开会议的5点意义：一是团结太平洋沿岸各国工人，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二是唤起太平洋沿岸各国工人，一致援助中国国民革命；三是统一太平洋沿岸各国工人经济斗争的要求；四是建立太平洋沿岸各国工人的共同组织；五是加强斗争和宣传，扩大太平洋劳动大会在各国的影响。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在开幕式上致词，并在大会期间作了《中国革命与世界职工运动》的报告。李立三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上海工人代表报告了上海工人运动状况、三次武装起义和蒋介石的大屠杀，法国、英国、朝鲜、爪哇均作了报告。苏联代表作了多次发言。全总代表刘少奇在会上作了讲演。

大会对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中国革命运动，现在虽然还免不了有些幼稚的地方，但其组织的程度和斗争的坚决，比西方各国的革命势力还要进步些。中国的职工工会已经成为东方工人运动主要的骨干，中国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给资本帝国主义一个很大的打击。大会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应更明确、更有组织地“援助中国的革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者以干涉反对中国”。大会通过了20项决

勤之政策，并本全國人民之公意，擁護中央嚴辦叛黨之蔣中正，

## 太平洋勞動代表紛紛來漢

▲昨日又到日本代表二人

▲國內外代表總計千餘人

太平洋第四次勞動代表大會改在漢口舉行，各代表已紛紛來漢，計已到漢有國際代表俄代表二人，英代表一人，奧代表一人，韓代表二人，日本代表六人，瓜哇代表三人，（尚在廣州）法代表數人，（尚在廣州）昨日上午十時又到日本代表水上好天野英史二氏，此次會議，國內外代表總計不下千餘人，其已到漢之代表，均寓漢口長陽旅館，聞一俟各代表到齊後，即定期舉行會議云，

## 各界籌備追悼南北死難烈士

▲昨日在市黨部舉行第一次籌備會

武漢各界追悼南北死難烈士大會，於昨八日上午十時在

议案。李立三于会议结束后，在《向导》第198期上发表《太平洋劳动会议的意义》一文，认为如果太平洋各国工人阶级能本着大会的主要精神和决议去奋斗，“一定要使帝国主义者们在工人阶级面前发抖，结果还要碎灭在工人阶级铁锤之下”。

太平洋劳动大会的召开，密切了太平洋沿岸各地区各国工人运动的联系，它在蒋介石集团屠杀工农，工人运动已在东南地区遭到失败的形势下在武汉召开，是对

从事艰苦卓绝斗争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声援和鼓舞，提高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国际地位，对于武汉地区的人民群众也是一次广泛的国际主义教育。

### ●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此召开

一个月后，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血花世界开幕。会前成立了大会筹备处，组成包括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刘少奇、向忠发等在内的25人主席团和5

个专门委员会。全国总工会为大会的召开发表了宣言和宣传纲要。出席会议的各地工会代表 400 余人，代表着全国有组织的 290 余万工人。参加太平洋劳动大会的各国大会代表和国共两党、国民政府、军队及各界群众团体的来宾应邀出席开幕式。苏兆征宣布大会开幕以后，全体起立，为各地死难烈士默哀 5 分钟。在开幕词中，苏兆征提出，在蒋介石叛变、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形势下，我们要保障革命胜利，“第一便要反对帝国主义武力干涉中国；第二要反对蒋介石屠杀民众；第三要与国民政府同生死；第四要帮助农民打倒

封建势力”。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国民政府代表彭泽民、共产党代表蔡和森、共青团代表徐伟、总政治部代表郭沫若相继演说。大会先后发出了通电、祝捷电、慰劳伤兵电和致英国工人阶级书。

大会由主席团成员轮流主持，苏兆征任总主席。会议期间，李立三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会务报告，罗佐夫斯基作世界工人运动的报告，汪精卫作政治军事报告，陈独秀发表了演讲。此外，苏兆征作了海员总工会报告，罗珠作了香港总工会报告，向忠发作了湖北工人运动报告，广东、四川、江西、湖南、北方、上海、铁路总工

► 1927年6月，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血花世界开幕



会等方面的代表，分别报告了各自的会务。

与会代表在热烈地讨论中，提出许多挽救革命的意见。湖北代表 22 日提出反对国民政府取缔农工运动，请政府急速派遣讨伐军的提案，大会通过了此提案。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的决议案》、《政治报告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对法西斯工会斗争决议案》等 14 项决议。

大会从 6 月 19 日下午 3 时开幕，29 日上午大会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执行委员 35 人，候补执行委员 19 人，并举行闭幕典礼。

6 月 30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向忠发、李立三、王荷波、邓中夏、陈寿昌、罗珠、郑覆他、林育南为常务委员，刘少奇、董锄平、杨人杞、马超凡、黄剑为候补常务委员。苏兆征再次当选为委员长，林育南任秘书长，李立三任组织部长，邓中夏任宣传部长。这次会议是在革命濒临失败的紧急时刻召开的，并通过了一系列革命的决议和宣言，尽管在经济、政治上存在缺憾，由于时代的局限，大会未能指明挽救革命的关键。但总的来说，还是反映了工人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迫切要求，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其

热烈气氛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

血花世界也是刘少奇负责创办的工人纠察队训练、上政治和文化课、宣传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地方。李之龙的血花剧社以此为基地，在大革命时期，起到了配合国民革命，宣传、唤起民众投身革命的作用。“七一五”政变后，血花世界易名汉口民众乐园。此后又数易其名，先后有民众俱乐部、汉口特别市民众俱乐部、兴记新市场。武汉沦陷后改名为明记新市场。抗战胜利后，改名和记民众乐园、民众乐园。新中国建立后，正式定名民众乐园。文革时改名人民文化园，后遭强行关闭，文化活动全部中断。1979 年 4 月 26 日，恢复民众乐园名称，1994 年又冠名新民众乐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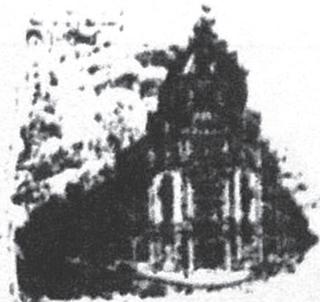
民众乐园是武汉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是老汉口华界优秀建筑的代表。它是与上海大世界齐名的一个武汉开业最早、经营历史最长的娱乐商业兼营的大众性综合游乐场所。1917 年汉口稽查处处长刘有才（又名刘贵苟）发起，在湖北督军王占元、汉口镇守使杜锡均等人支持下，从军、商界募集股金 40 余万元，组成汉口新市场协力股份有限公司和协兴房产公司。

新市场由祝康城先生设计，全部工程由汉合顺营造厂承包，内院园林谐园则由日本技师主持设计督建。刘有才病

日本號開立任  
通濟甲口  
經理人

北軍事善後有獎義券  
通濟甲口  
二月十八日

# 漢新市場有限公司廣告



振興實業開通智識講求衛生三大要素  
市陳動物院  
特別地別  
取資金

## 朱謙益茶莊

本莊開設於... 採辦各省名茶... 批發零售一律歡迎

## 羊城水火保險置業有限公司賠款撤廣告

本保險公司... 賠款迅速... 各界請

中國寶 雙妹



► 现新民众乐园内景



剧场、曲艺场、书场。各楼的普通剧场宽为 11 米，长为 28 米，观众席为连体木椅。梯次增高，视线良好。园内居中的单体建筑是雍和厅，也叫孙总理纪念堂，即杂技厅，厅内观众席呈半月状，有两层，都是由低往高的长条凳。园内后部大舞台，场内穹弧圆顶，有两千座位，全是单人座椅，属于高档剧院。和它并列的是新舞台。这两座剧场不实行通票，须另购票入场观看。这种一园两制的经营模式延续到 1993 年新加坡公司投资经营止。

园内娱乐服务设施有鸳鸯池、中西餐厅、弹子房、小型商场、阅报室、陈列室、室内花园（即所谓小乾坤）、哈哈亭（也叫遗嘱亭）以及旱冰场等。

1993 年被评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会议会场遗迹（黄陂同乡会馆）位于武汉市江汉区自治街41号（今武汉市第七十五中学）。

### ● 中共五大召开

中共五大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紧急时刻召开的。为挽救革命，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指示，制定新的方针和政策，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11个省区党组织及共青团的代表80余人，代表全国57900多名党员。

大会的开幕式是在武昌都府堤20号，武昌第一小学举行的。正式会议于29日移至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同乡会馆举行，直至5月9日闭幕。也许是大多数代表居住在汉口，乘船过江不太方便；也许武昌的开幕式只是释放一种烟幕，因为共产党开大会当时毕竟还是“秘密的”，报纸上都没有进行报道。据说这种“秘密”，一方面是为了免得加重武汉国民政府“赤化”色彩，一方面是

中共五大会议的遗址（20世纪80年代红卫中学校园）



为了防备反动派袭击。陈赓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特务营为大会进行警戒和保卫工作，使大会顺利进行。

在汉口开会期间，具体会议议程：

4月29日，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罗易作关于共产党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报告。

4月30日，罗易作《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大会讨论陈独秀的报告，谭平山等3位代表发言。

5月2日、3日，彭述之、蔡和森、林钧、张国焘、维经斯基、李维汉、张太雷、罗章龙、陈乔年、彭湃等13位代表发言。

5月3日，罗易作《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讲话；维经斯基在大会上讲话。

5月4日，汪精卫讲话，罗易作《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报告，汪精卫第二次讲话，陈独秀发言，罗易发表《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讲话，汪精卫第三次讲话，陈独秀、谭平山等发言。

5月5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等7位代表发言，罗易作《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讲话。

5月7日至8日，大会讨论组织问题、修改党的章程、职工运动、农民土地等问题。

5月9日，大会通过决议案和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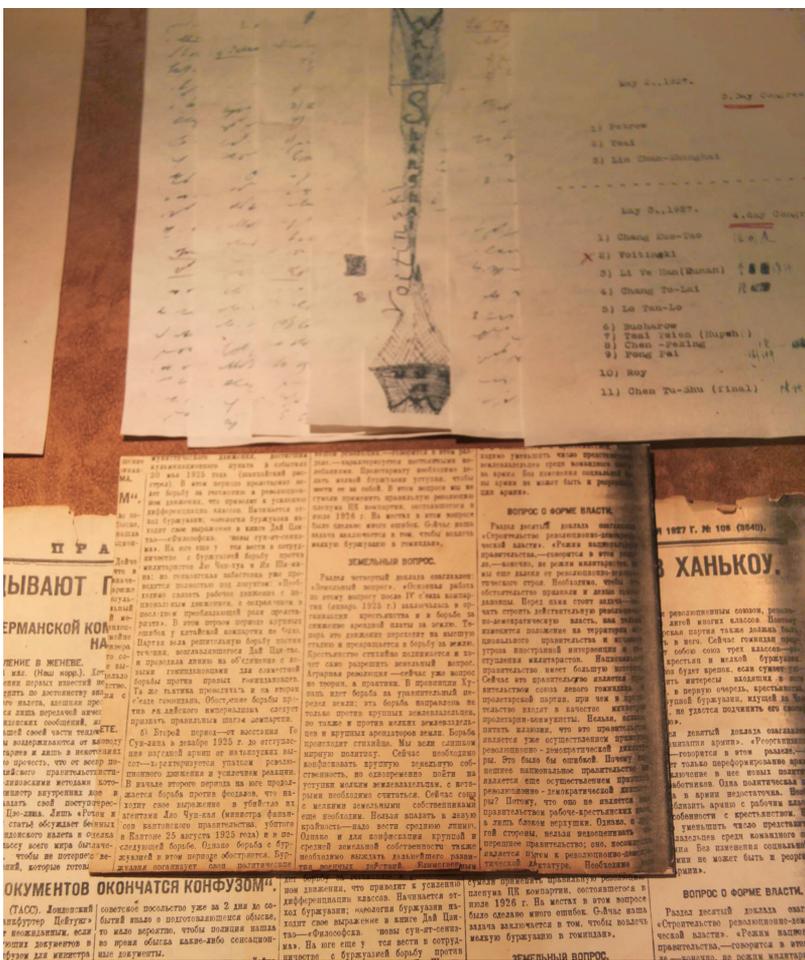
大会选举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罗易在新选出的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上发表题为《布尔什维克的党》的讲话。

罗章龙、瞿秋白、顾顺章、张金保、张国焘、谭平山)大会秘书长(蔡和森)后，会议正式开始。

### ● 会议任务繁重

在汉口黄陂会馆开会，首先选举主席团(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

大会的第一项议程，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共分11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过去两年来的策略”，把党



1927年5月8日、10日、11日、15日的苏联《真理报》，连续报道中共五大的消息。

的四大以来的主要工作，分为四个时期加以概括。报告的第二部分至第十一部分，分别讲述了以下几个问题：“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土地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军事因素和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重新组织军队”、“建立民主权力”、“财政经济状况”。报告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并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主张。

报告为党在“中山舰事件”后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作了辩护。陈独秀认为，“共产党的退让，是由于力量不足和党没有适当的准备而引起的。在广东发生这样的错误应该认为是可以宽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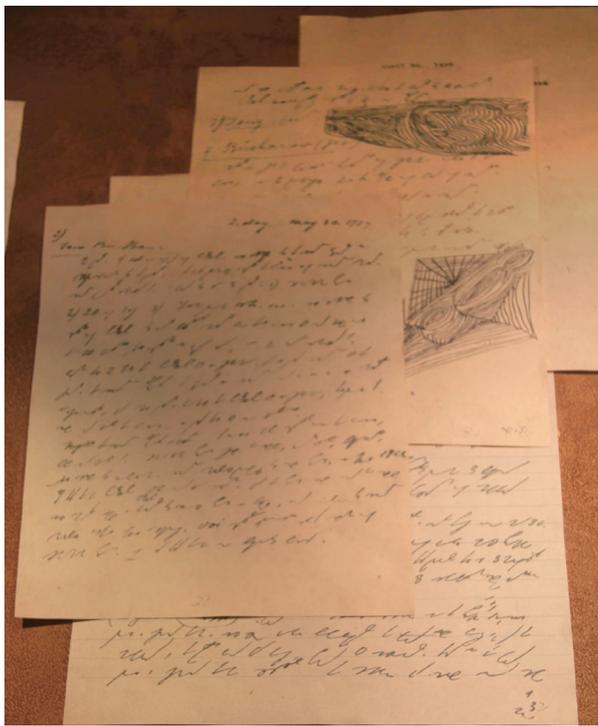
报告认为上海三次工人起义是错误的，工人只能搞经济斗争，不能搞武装斗争。报告反映了对蒋介石叛变，汪精卫动摇，缺乏革命警惕。陈独秀认为，“革命运动中的潜在危险大为减少”。报告对革命领导权问题采取退让的政策，陈独秀说：“我们尚无很大的决心参加政府。”

陈独秀报告后，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毛泽东等以及来自各省的许多代表都发了言。他们不赞成中央委员会的决策，对陈独秀报告中的错误进行了批评。认为

党过去犯的错误，主要是“过高估计资产阶级，错误理解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政策，没有在土地问题上做出决定。”在大会开始时，瞿秋白向与会代表散发了他在2月写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原名为《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小册子，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对党的病症“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

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应采取坚决的领导态度而不应尾随他们的动摇、犹疑，做他们的尾巴。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的动摇与犹疑。如若不然，我们的革命也将如法国及俄国二月革命一样破产。”蔡和森还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虽然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还保留有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分子（孙科、谭延闿），这些分子是随时可举行三月二十及四月十二日的大屠杀对付我们的；富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店主、厂主等）亦时有武装暴动反对我们之可能。

大会的第二项议程，罗易作了关于共



五大代表讨论记录（部分）

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报告。其主要内容：第一，指出中国目前民主革命阶段，它有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和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可能；第二，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没有脱离关系，在革命发展之下它必然不可避免要背叛革命，因此我们一定要反对资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为此，（1）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农民，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来发展土地革命；（2）要坚决领导工人斗争，满足工人的要求，坚决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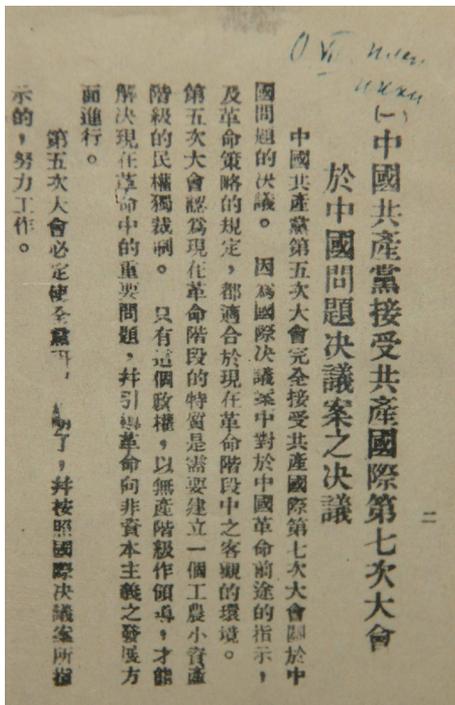
8小时工作制，使工人阶级更加坚固地团结起来；（3）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党要设法与之巩固联合；（4）对于国民党，要实行改组，使广大工农加入，转变国民党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坚决反对右派；（5）共产党要参加国民政府，从上而下地执行革命的政纲，巩固革命的政权。

罗易在大会上先后几次讲话中，着重谈到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和前途。指出：“现在的局势要求我们必须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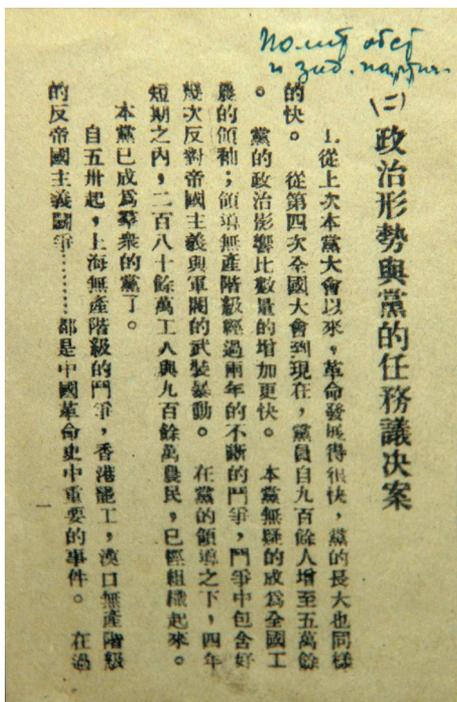
丧失中国无产阶级英勇斗争取得的辉煌成果。”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任务，“最根本的，是进行土地革命”，以努力建立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政权。他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时，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年轻的党。没有足够的经验，自然会犯错误和暴露弱点。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证明，它是国内坚定地进行革命斗争的唯一政治力量。”汪精卫出席了5月4日的大会，并发表了讲话。他

► 五大通过的『决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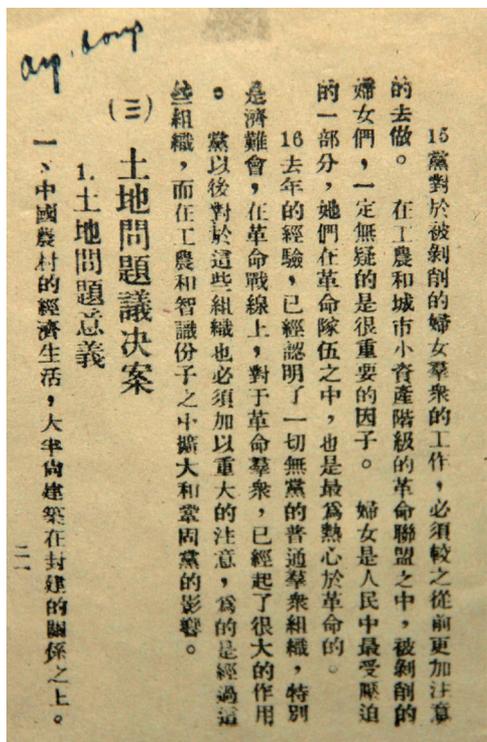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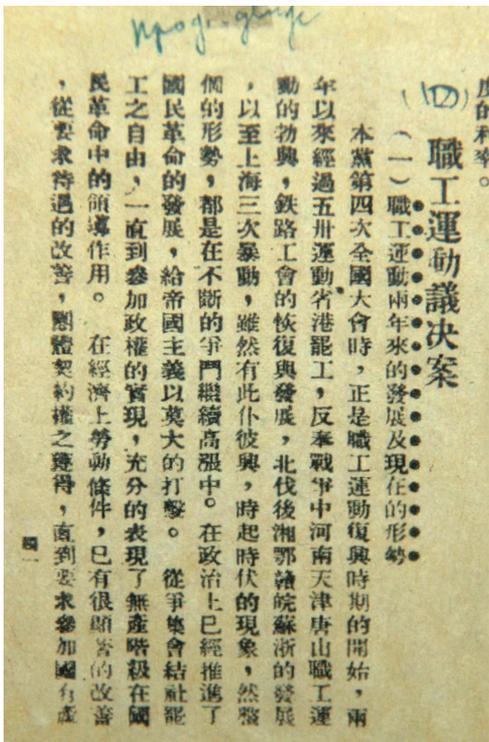


◀ 五大通过的『议决案』



高谈阔论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使中国领袖们沉湎于这种错觉之中。

维经斯基在大会上发言，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革命的前途；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独立。在谈到革命前途问题时，他强调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指出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实行土地改革，不可能解决农民问题。而“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巩固国家政权。”关于土地问题，他说，共产国际代表团明确主张：“没收土地是指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不



是小地主的土地。”在谈到党的独立问题时，指出：“我们党不应受到与它行动的盟友的左右，而应率领它们前进。”他认为，中共五大证明，“我们享有组织上的独立。批评权意味着政治上的独立。”维经斯基还说：我们虽然“有过退出国民党的倾向。不过我们在国民党内，应该享有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我们在国民党内，应该为这种独立而进行斗争。”他进一步指出：“即使现在，国民党已经是执政党，我们

也参加政府工作。我们也应设法通过我们自己的机构在国民党内做工作。”

大会详细讨论了过去的错误和革命的发展前途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重要文件。

組織（如北方），也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應該積極的糾正過來。現在各處工會，無論是上層領袖或下層的幹部人材，都極缺乏，這也是可以阻礙職工運動發展的。要訓練人材，第一要使工人羣衆多參加工會的工作，使在許多鬭爭中，增高他們的經驗，和工作能力。特別要注意工人代表會的建立和訓練。第二，在各地總工會都要設立短期的職工運動訓練班。黨應該選擇很好的工人同志，辦一高等職工運動學校，養成高級的幹部人材。

(五)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宣言**

全中國的無產階級及農民羣衆們！

過去二年之間，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有偉大迅速的發展。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用壓迫，剝削，搶掠，攻襲的手段以獲得并鞏固其勢力，如今這些勢力已經發生搖動了。當此革命

三三

### 對於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決議案

一、共產主義青年團是黨指導下的青年無產階級的革命的組織其任務在過人共產主義的宣傳與共產黨的意識和政策的影響到廣大的革命青年羣衆中去，吸收他們在共產主義旗幟下積極參加共產黨所領導的各種鬥爭。中國青年大多數都深切的感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沒有別人能比他們更激烈的與這壓迫奮鬥。因此，共產主義青年團應當特別注意反帝國主義反其他工具軍閥的鬥爭，擴大反對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反對武力干涉中國革命及擁護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活動，并領導青年無產階級參加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爭取革命領導權及建立工農小資產階級民主獨立裁政權政權的爭鬥。

### 組織問題議決案

本黨最近一年半以來，已變成真正群眾的黨，有五萬人以上的黨員。革命運動的發展，使本黨有更加發達的增大的可能性。革命之深入，在本黨面前提出了迫切的任務，即領導無產階級、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并建立這些階級的民主獨裁制政權。

爲完備這種任務，本黨不僅應當變成群眾的黨，而且應該變成布爾喬維克的黨，在思想上如此。在組織的原則和實際上也是如此。然而，本黨迅速的發展，黨的幹部人才缺乏而幼稚，我們的黨部自然沒有完備的組織和鞏固之可能。在這裏隱藏着很大的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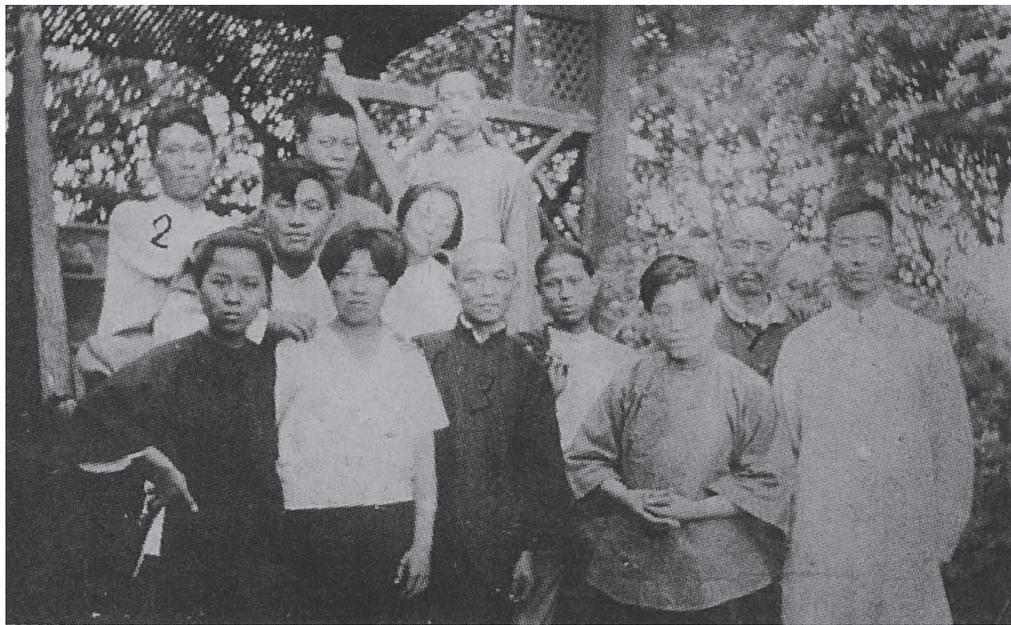
第五次大會認定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關於組織問題之指示

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指出：“我们的党，却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在“中山舰事件”时“党没有正确的政策”，使“资产阶级占了上风”。在争取领导权的斗争中，党中央没有“提出急进的土地改良之要求，以巩固与农民之团结”。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革命区域不断扩大时，党中央“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会基础同时

深入之必要”。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指出：“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决定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土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但“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是：陈独秀、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邓中夏、



部分五大代表的合影照

苏兆征、项英、向忠发、张国焘、罗亦农、陈乔年、赵世炎、张太雷、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彭湃、夏曦、贺昌、易礼容、彭述之、杨之华、罗珠、刘少龙、李涤生、顾顺章、杨其珊等31人。候补中央委员是：毛泽东、郭亮、黄平、吴雨铭、陆沉、刘伯庄、袁达时、毛科文、陈潭秋、薛六、林育南、庄文恭、李震瀛、王亚璋等14人。大会同时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正式委员：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

接着举行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兆征、张太雷。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军事、工人、农民部的部长。

## ● 中共五大的历史贡献及失误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中国革命处于严峻历史时刻情况下召开的。大会虽然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并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作出了新的基本正确的议决案。但没从根本上认识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根源及危害，因而没有对陈独秀作出任何组织结论，继续选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大会虽然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有所认识，但是，对于存在统一战线内部的汪精卫反革命集团没有清醒认识，完全丧失了革命警惕。结果，这次大会没有能担负起在危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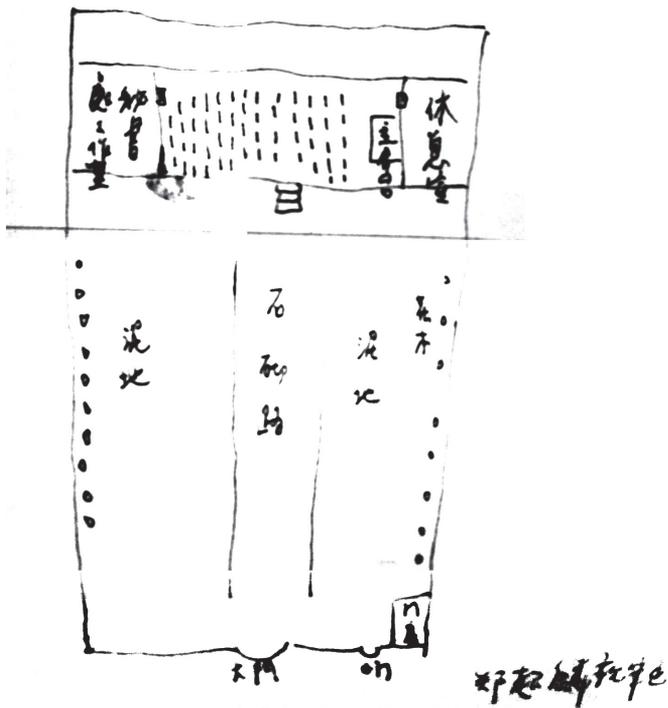
五大的成就贡献，失误缺点都和共产国际密切相关。五大也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五大的历史贡献主要是：

一、中共五大通过的决议及宣言，提出了一些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原则，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有关争夺领导权方面，大会检讨了过去一段时期只注意反帝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中取得领导权。在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民主政权方面，大会明确指出，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是中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根据地，必须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才是革命胜利的唯一保障。“必须执行激进的土地改良纲领和创造乡村的革命民主政权。”

二、中共五大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前进了一大步。大会委托中央政治局随后修

▶ 当年与会者郑超麟（注）绘制的黄陂会馆平面图

# 黄陂会馆平面图



正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作出了比四大党章更详尽、系统的规定。

——明确党的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设政治局，政治局中设常务委员会；规定中央政治局负责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中央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党的日常工作事务。

——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决定设立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党章中专有一章有关监察委员会的责权、与中央及省委的关系等规定。

——决定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第一次明确规定民主集中制为党的组织指导原则，第一次规定了各级党组织的统一设置与划分，初步完善了沿用至今的党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系统。

三、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一大批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上功勋卓著的优秀无产阶级革命家，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特别是后来中共七大选出的5位书记中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任弼时4人都是在中共五大进入中央的。这对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陂会馆建于20世纪初，会馆呈长方形，朝南临街一面为大门，进门后一条石砌路通向尽头的三开间平房，中间是大厅，右边房间是秘书处办公之地。1933年黄陂会馆改为黄陂小学。1958年扩建成双洞门中学。扩建之初，原黄陂小学的两扇铁校门尚在，校门墙上挂有一块木板制作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遗址”的标牌。标牌上还配有一段文字说明，让人一目了然。后来，双洞门中学又扩大校门，那块“遗址”小牌也按原样复制了一

►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遗迹（今市七十五中学校园）





块新的挂在新校门的墙上，白色油漆打底，配红色的字，使这个标牌更加耀眼醒目。

“文革”期间，双洞门中学被改名为红卫中学，上世纪80年代改为75中学。其间，校舍几经改扩建，不仅校内的老房子已荡然无存，就连那块“遗址”标牌也不知何时不见踪影。如今学校是越建越好，校内整齐美观，可校内五大主会场的建筑

已不复存在，未能保护好如此重要的革命遗址建筑，不能不说是我市规划建设中的遗憾。

中共五大正式会议在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同乡会馆举行，1927年后，济生三马路因地处当时的汉口市政府之北，被命名为府北一路。1948年改名自治街。

---

注：郑超麟（1901—1998年），生于福建省漳平市。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参加“少年共产党”。出席中共“四大”“五大”“八七”会议。

第三编

# 红色印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7—1937.7

Tudi Geming  
Zhanzheng Shiqi

第三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 红色印记

1927.7—1937.7

T u d i G e m i n g  
Z h a n z h e n g S h i q i

中共中央机关暂留武汉交通处是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至 1928 年初，中共中央的秘密交通站。其遗迹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前进二路永安里 12 号。

### ● 风云变幻 中共以变应变

“七一五”政变以后，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加强了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昔日大革命中心的武汉变成了反革命的中心，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江城。武汉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全部被迫转入地下。8 月初，改组后的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卫戍司令部等联合成立“镇反”委员会，专门负责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们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开始在武汉地区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革命者的鲜血洒遍武汉三镇、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领导中国人民寻找夺取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1927 年 7 月中下旬，设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果断地作出了与中国革命命运攸关的三项重大决策：一是实行土地革命，发动和领导湘鄂赣粤四省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二是领导党在国民革

命军中掌握和影响的主要部队举行南昌起义；三是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其中最早实现的是南昌起义。7月2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最终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8月1日，党独立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8月3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在汉召开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大纲》指出这次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应“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要“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之分配”。8月7日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秘密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为处于严重危机

中的中国共产党指出了继续斗争的目标，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八七”会议后，中央重新部署了两湖秋收起义，即决定中央机关继续留在武汉以指导两湖暴动。9月9日，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9月8日晚，鄂南起义提前举行。9月10日，鄂南起义军中，由土匪改编的“蒲圻人民自卫军”叛变，鄂南暴动受挫，最后失败。与此同时，鄂中、鄂西、鄂东等地先后举行秋收暴动，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先后都遭到了失败。

### ● 中央机关迁沪 秘密交通站设汉

9月中旬两湖起义失利消息传来，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中央机关迁移问题，原则决定准备迁到上海。9月

1997年前的永安里12号



▲ 1927年的张太雷



下旬中央感到两湖起义已确无胜利的可能，即决定将中央迁到上海。9月28日，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中央机关迁离武汉后，设中央长江局于武汉，罗亦农为书记，负责领导长江流域几省党的工作，将永安里12号原湖北省委的秘密交通站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暂留武汉交通处。

中共中央机关暂留武汉交通处，开始是由时任中共湖北省书记张太雷建立的，作为湖北省的秘密交通站。当时在汉口一个山西人开设的钱庄里办公。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家，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制造“赣州惨案”，杀害工人领袖陈赞贤事件后，

张太雷忍无可忍，找到鲍罗廷痛陈利害：蒋介石叛象明显，再不采取措施，真要遭惨祸了。

中共五大会上，张太雷在小组发言中，激烈批评党的领导人的右倾错误：合作固然必要，但不能右倾退让，比如骂农运“过火”，不准武装工人，一切迁就国民党以图合法存在。请问，这里还有什么共产党？什么无产阶级地位？会上，他提出改选党的总书记，但由于共产国际指示及鲍罗廷的意见，张太雷的建议未能实现。中共五大后，张太雷任湖北省委书记。上任后，他大力发展党组织，扩大基层工会、农会、共青团和妇女协会。他特别关切和领导农



村土地革命，尝试建立农民武装与政权。张太雷清醒的意识到，暴风雨将很快袭来，要随时准备应变。秘密交通站的作用就更重要了。当时许多重要文件、指示、省内情况上传下达都通过秘密交通站负责传递。7月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停止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张太雷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7月15日张太雷向接任的省委书记罗亦农移交湖北省委工作。秘密交通站于8月初迁到永安里12号。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迁往上海，中共中央机关暂留武汉交通处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沟通中央与长江局的联络工作。因中央决定成立长江局时，亦定长江局在中央指导下，代行中央职权，指挥湖南、四川、陕西、河南、湖北、江西、安徽、甘肃8省的革命运动和党务。武汉交通处也负责与8省的联络工作。党中央、长江局的许多文件从这里分送到各地党组织，一些党的领导人也曾在这里暂时隐蔽，或由交通处接待重新安排住处，或转赴新的战斗岗位。1928年初，一位从上海来的交通员不幸被捕，出于安全考虑，交通处随即秘密迁往别处。

中共中央机关暂留武汉交通处用房为民居房，坐落永安里。永安里东起楚宝前街，西抵前进二路，旧址坐北朝南，为砖

木结构的二层普通民房，前后围墙形成院落，有较好的隐蔽性。大门为石库门，进深2米，建筑面积约400平方米，门前巷道两端相通，便于进出或转移。永安里12号原为上海永安公司所有。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有，仍为居民住宅。由于年代久远，房屋年久失修，墙体倾斜严重，成为危房。1997年，旧址拆除重建，现仍为民居房。



改建后的永安里12号

第四编

# 红色印记

抗日战争时期

1937.7—1945.8

Kangri Zhanzheng Shiqi

抗日  
战争  
时期

第四编

# 红色印记

Kangri Zhanzheng Shiqi

1937.7—1945.8

# 董必武故居及早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

董必武



董必武故居旧址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民主一街安仁里1号。

早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民主一街安仁里2号。

## ● 受命赴汉 不畏艰险 忘我革命

1937年抗战爆发，为了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在西安、太原、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于8月23日决定以派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周恩来、



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领导中共在长江一带和西安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于9月离开延安，经西安到武汉，推动武汉和华中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恢复和开创党在长江一带及武汉地区的工作。出发前几天，一直下着大雨，从延安到西安的路上经过一片沼地。在经过沼地时，恰巧遇到也由延安前往西安的韦尔斯·斯诺。年轻的韦尔斯·斯诺在别人帮助下过沼地后，已累

得不能动弹，看到年老的董必武独自走过沼地仍精神焕发，很受感动。事后在记述此事时写道：“他曾经是西北苏维埃的临时主席，现在则是到西安办事处做事。在五十一岁的高龄，仍过着红军的艰苦生活，一点也不对这沼地屈服。”董必武不畏艰难险阻，以一往无前的忘我革命精神来到武汉，协助周恩来谋划于武汉、南京、长沙之间。一面公开开展统战工作，筹建第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一面秘密筹建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和改

组中共鄂豫皖、湘鄂赣两省委，恢复和发展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

董必武到汉后，住在汉口府南一路（今民主一街）安仁里1号，并在东方旅馆楼上租了一间房，专门接待各方面来访的客人。一些过去的朋友石瑛、严重（立三）、张难先、李书城、李范一、周苍柏、孔庚、蔡寄鸥、曹振武、陈楚伯等，都来看望董必武。在叙旧时，董必武说：“读顾亭林的诗，记不记得这两句：‘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吊哭深’。我在山西到潼关的途中，忆及这两句时，觉得非常的可感。”由此引导谈及蒋介石发动十年内战，使苍

生涂炭，哀鸿遍野，进而讨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之必要，使在座的国民党进步人士受到教育，深为感动。后又一一回访，进行个别联络。董必武的统战工作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地方政府中的一些开明官员和湖北地区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他利用一切机会和各种场合，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积极开展统战活动，宣传党的抗战路线、方针和政策，争取他们对共产党的了解、同情和支持。即使是对国民党右派人士、曾经想加害自己的夙敌（如陶钧等人），也是以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不计前嫌，广为交往，力争团结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这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惊恐忌恨。国民党湖

► 俯视安仁里1号巷的董必武故居



北省政府代主席兼民政厅长严重系董必武的辛亥革命老友，因登门拜访董必武，请教抗日救国之道，马上就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警告。尽管如此，董必武处来往之人仍川流不息。通过细致、耐心的说服、交流，争取了武汉各界爱国人士对党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对董必武中共中央代表的品德和工作精神也十分敬佩。一贯反对董必武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同乡友人蔡寄鸥也说：“（董必武）地位较高，但是每月俸禄不过三四十元的光景。新华报上，每天有他的论文。他虽然是五十多岁的人，每天奔走忙，写作忙，没有一刻休息的时候。……他的做事精神，的确是够人佩服。”

### ● 筹办武汉“八办”壮大革命武装

10月，董必武在老友熊子明等的帮助下，在安仁里2号顺利地筹建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经同秦邦宪、叶剑英等商定，任李涛（湘龄）为处长。“八办”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在国统区有了合法的联络中枢，为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活动场所。初建时的武汉“八办”，人员少、机构简单。就在安仁里办公，但在董必武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武汉“八办”对外主要是当时中共军队在国统区的物资转运和调度中心。“八办”负责将在

国民政府领取的军饷及物资分送各地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还将从各地募集到的各种物资运往延安。董必武同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为高敬亭、傅秋涛两部红军游击队，从军饷、物资上向国民党当局争取了相当的补充。并先后从中央党校和抗大抽调熊作芳、张体学、程启文、聂鹤亭等一批干部，由郑位三、肖望东带领分批前往高敬亭部工作。到这时高敬亭部“已集合二千余人”，但党组织不健全。董必武和叶剑英商定，将鄂豫皖省委改为特委，派郑位三任书记，高敬亭为委员并负责军事工作；派李涛到傅秋涛部传达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湘鄂赣省委也改为特委，傅秋涛任书记，党的组织由公开转为秘密。董必武还亲赴黄冈、麻城、黄安等县，为这两支人民抗日队伍募捐，募得棉背心一千件，毛线衣、袜子、毛巾不计其数，进一步改善了部队的给养。1938年2月高、傅两部分别奔赴抗日前线，成为新四军的优秀部队之一。

武汉“八办”也为中共中央长江局提供了办公处所。长江各省区党组织负责人来此汇报、联系工作，听取指示，由此推动了南方各省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延安派往南方各地重要干部也多在武汉停留、办理手续，再前往目的地。“八办”还向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输送了许多优秀人

才和革命青年。不少支持中国抗日的国际友人，也都是经过“八办”转送到延安。

1937年12月，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部分工作人员来到武汉。12月上旬，在董必武和叶剑英的领导下，南京“八办”与武汉“八办”合并，钱之光任处长。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国民党联系和谈判；由周恩来、秦邦宪、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党在南部的的工作。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在汉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将两个组织合二为一，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董必武兼长江局民运部长，主管包括文教、青运、妇运、党派等在内的民运工作，兼管中共湖北省委的工作。在人员集中的情况下，住房也成了问题，武汉较好的房子都被国民党占完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长江局的工作人员来汉很难找到房子。当时，董必武派人找到他的学生徐会之（中共秘密党员、革命烈士）。徐利用自己的职权和社会关系，帮助武汉“八办”解决了房子问题。办事处于年底迁到汉口原日租界128街89号（今长春街57号）大石洋行大楼内办公。一直到1938年10月撤离武汉。

武汉“八办”在安仁里虽然只存在两个月，但在武汉抗战时期是极为重要的两个月，董必武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八办”在这里完成了组建和起步。这里是周恩来、董必武等秘密会见党内重要隐蔽同志和有关人士的地方，长春街“八办”是公开的，这里比较隐蔽，便于某些工作的开展；这里还是党的一处秘密交通站。何耀榜同志在革命回忆录《大别山上红旗飘》一书说他就是从大别山来到武汉，找到安仁里2号“八办”的招待所。而且，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都曾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间。

## ● 艰辛努力 恢复和开创党在湖北工作

董必武到汉后，领导了中共湖北省委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期，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除鄂豫皖、湘鄂赣根据地内少数地区保持有党组织外，湖北其余地区尤其是武汉地区，党组织损失殆尽。他当时对工作人员说：“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变时，事出仓促，组织遭到破坏，在白色恐怖下，不少同志因失去组织联系，被迫隐蔽起来，是不得已的。应当把他们动员起来，让他们继续参加革命，这对他们本人和对革命都是有利的。”很快就将那些失掉组织关系后表

董必武（右前二）率中共湖北省委参加抗日集会游行



现较好的同志联系起来。董必武还亲自出面做工作，营救出一大批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党员和进步人士，为在武汉地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输送了骨干力量。当时武汉仅仅只有一个党的地方工委，以几个支部组织为基础，有党员 30 余人。中共北方局派到武汉的何伟，曾领导建立了中共武汉临时工委。何伟被捕后，党员杨学诚到武汉负责建立正式的武汉地方工作委员会。

在一个党支部里有个自首分子甘友光叛变出狱后，曾在汉联络一批进步青年自行发展党员。董必武查知后，通过组织进行认真整顿，对成员进行审查，将其中的不纯分子或不符合条件的人予以洗刷，保留 20 余名党员，从而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

在董必武的指导、关怀下，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改建为省委。郭述申任省委书记，陶铸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钱瑛任组织部长。1938 年 5 月，全省党员

已有 1000 余人。6 月，在汉口安仁里董必武住处召开中共湖北省委第二次扩大会，决定扩大和加强全省党的各级组织。到 10 月，武汉的党员达到 850 名左右，湖北各县的党员已发展到 3000 名。党的组织也得到显著发展，建立了鄂东、鄂中、鄂南 3 个特委，鄂北、鄂西两个中心县委，武昌、硚口、汉口、汉阳 4 个区委，以及黄陂特支。这对全省抗日群众运动的发展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 开办汤池训练班 培养抗日骨干

1937 年 11 月，董必武和原辛亥革命老友、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建设厅长兼农村合作委员会主任石瑛，在汉口安仁里 1 号进行了坦诚交谈，宣传党的抗日政策，要求他做一些有益抗战工作。在石瑛的运作下，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汤池农村合作实验区负责人李范一出面，由共产党派人负责领导，开办湖北省应城汤池训练班。训练班招收东北、华北、华东、华南、武汉地区的大专院校 60 余名青年学生，于 12 月 20 日正式开学。董必武还通过中共湖北省委先后派党员去训练班担任教员。训练班每期 1 个月，开设课程有政治、军事、合作业务等，理论与实践结合。每期在学员中发展一批党团员。至 1938



▲ 武汉「八办」工作人员佩戴的徽章

年5月，共办四期，培养了359名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以农村合作指导员名义，分配在湖北各县。第三期结束后，董必武指示陶铸办了汤池临时学校，招收贫苦知识青年、学生和其他有志抗战爱国青年入学。从4月到10月，共培养300余名干部。从汤池训练班和汤池临时学校出来的这一大批干部，成为鄂中地区以至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也是后来新四军第五师的干部来源之一。

与汤池训练班开办的同时，董必武指导中共湖北省委在黄安七里坪游击队干部训练班结业后，举办干部训练班（亦称抗日青年训练班），培养训练抗日军政干部。七里坪的这两个训练班共坚持八个月，先后毕业的600余名学员，成为后来新四军第二师和第五师的重要干部来源。

董必武还指导湖北省委开办5期党员训练班，培训300余名党员，并请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训练班讲课。1938年5月至9月，这个训练班不仅使大批从敌人监狱里营救出来的党员干部和失掉组织关系的同志重新走上战斗岗位，还培训了一批优秀游击骨干，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 1938年春，汤池训练班部分教员和学员的合影



## ● 筹办《新华日报》为抗日呐喊

董必武在汉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党组织的力量，帮助潘梓年、许涤新等在武汉筹办《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准备房屋机器等，于1937年12月11日便出版了《群众》周刊（许涤新负责），次年1月11日创刊发行《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说：“创刊一个报纸能够那样的迅速，恐怕要算打破了创刊日报的先例”。董必武为《新华日报》创刊题词：“拥护抗战到底，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明确地提出了《新华日报》的战斗任务。

董必武为《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撰写许多篇社论和文章。《新华日报》创刊后，一个寒冷的清晨，有位同志遵嘱来取董必武写好的社论，当工作人员起来开门并到董必武住房叫醒他时，见床前只有一只棉鞋，另一只不知在哪？工作人员找不到，帮助整理床铺时，在被子里才找到。原来董必武写好社论，因过度疲劳，只脱了一只鞋，另一只未脱就上床睡着了。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董必武率《新华日报》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离汉赴重庆，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迁至重庆进行准备。至此，董必武离开安仁里后再也没有回此故地了。

安仁里1号是董必武旧居，2号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早期旧址。房屋是1931年由黄安人阮观仁所建，取名安仁里，门牌仅有1—7号。据说董必武到汉首先想到他的老乡阮观仁。而阮的房子建造只几年时间，一来它处于闹市区，二来离当时汉口市政府近，便于工作，是建立“八办”的理想地点。阮观仁思想进步、倾向抗日，与董必武素有交情。顺理成章地满足了董必武的要求，安仁里1号成了董必武的住宅，2号便成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安仁里1号坐东朝西南，典型的石库门楼房，二层楼的普通民房，现仍为居民住宅，房屋外观基本保持原貌，内部结构改动很大，但木质楼梯仍在。这里是一处重要的抗战时期的革命旧址。

新華日報創刊紀念

擁護抗戰到底為實

現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

生幸福的新中國而

所爭

董必武

► 董必武为《新华日报》创刊纪念题词

孩子剧团遗址，位于武汉市江汉区花楼街 182 号武汉市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校（原洪益巷培心小学）。

### ● 孩子剧团齐抗战 中华民族不可撼

1932 年，上海沪东区临青路临青坊里有一所临青学校。学校设小学和初中两部，每学期保持学生二百余人，大部分是工人子弟和交不起学费的穷孩子，学校让他们免缴杂费。该校的几任校长和主要教员，大部分都是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不少还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他们经常给学生讲国难形势，凡重要纪念活动和抗日宣传活动，老师都要带学生参加。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监视他们的活动，1935 年“一二九”纪念和 1936 年“九一八”纪念活动后，遭受了两次大搜捕，校方被迫停止办学两个月。1936 年，该校

▶ 培心小学旧址（今市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校）





在里弄和棚户区，开办了10个“小先生”分校，吸收了四五百名穷孩子上学。学校还成立了孩子歌咏队，排演了许多抗日歌曲和话剧，多次在沪东区和市内演出。

日寇侵占上海后，许多同学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一部分同学在老师的帮助下，来到法租界的难民收容所。可他们心中仇敌怒火燃烧，岂甘心呆在难民所里当难民！学生会主席许立明、孩子歌咏队长张莺、“小先生”总校校长奚里德、学生会秘书傅承谟（陈模），以及“小先生”张宗元、曹大庆、郭宝祥等10多人，聚

集在恩派亚难民所里办起了《大家看》壁报，教难童识字、唱歌，在难民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男同学每天早上去卖报，赚点钱买纸、笔、本子，大家都干得非常起劲。

不久，中共党员吴新稼老师来看望孩子们，他把情况向国难教育社（1936年由教联改组而成）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等汇报，他听后高兴地说：“这些孩子很可爱，要好好培养，可以把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

以后，吴新稼每天到难民所给孩子讲抗战形势，帮他们练歌。又找来一批难童，

排练了《火线上》、《捉汉奸》、《打回老家去》三部街头小话剧。吴雪给他们导演了《放下你的鞭子》。难民所不肯借演出灯光用的大灯泡，他们只好找抗敌演剧队去借。全部剧目的演出，受到了难民同胞的连声称赞，大家的斗志也深受鼓舞，他们提出到所外去演出。吴老师说：“到外面演出，剧团应该有个名字呀！”这时有个同学说：“我们都是小孩子，就叫孩子剧团吧！”，大家都热烈鼓掌表示赞同。于是，孩子剧团就这样诞生了，还选举许立明、张莺、傅承谟、张宗元为干事，吴

新稼为干事长。

没过多久，难民所以“不守规矩”为由，把他们撵了出去。后在国难教育社和上海市文协的支持下，搬进了沪西的余日章小学里。他们制定了剧团公约、作息时间表，每天应邀到市里去演出几场。不论在哪里演出，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好。9月中旬，经地下党组织安排他们搬进了上海国际难民收容所，除日常对外演出，还承担难民所难童的学习教育。此时，陶行知先生领导的大场山海工学团，派来了许翰如、徐治平、徐祥山三位“小先生”和徐晴，加

▶ 孩子剧团宣传抗战



入这个孩子剧团。许翰如被吸收为干事会干事。同时，余日章、浦阳小学也有学生加入，孩子剧团的队伍扩大了。

就在这个月，周恩来代表中共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达成统一战线协议。当他听到地下党上海市委汇报，上海人民行动起来，连小孩子也知道抗日，组织了孩子剧团的情况后，他异常兴奋地说：“好哇，这些孩子的抗日精神，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他叮嘱上海市委的同志要好好关心、帮助孩子剧团。

### ● 周恩来专会欢迎 邓颖超亲赴指导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地下党组织考虑他们在上海影响较大，抗日的热情高昂，但年纪较小（22名团员：大者18岁、小者8岁），为了他们的安全，决定将孩子剧团转移。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他们的转移作出了精心的安排和组织，指派了16岁的中共党员许翰如和团长吴新稼一起把这批孩子带出去。原来打算22人坐英商轮到南通，再取道镇江、南京去武汉。由于停泊吴淞口日舰对进出上海的船只搜查很严，孩子剧团分成五批，有的团员扮成小商贩、小伙计，有的团员装扮成走亲

▶ 1938年，邓颖超在武汉



串友的姐妹，有的团员在海员的掩护下躲藏在轮机舱里，有的交给别人当“儿子”。从11月18日起，乘英轮离开上海，到天生港区集合。应唐家闸、南通的群众和东北军要求，为他们演出。人们看了他们的演出后都为之感动不已。就在演出过程中，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从南京到南通的江轮停航。他们只好改坐木船，由南通溯运盐河北上，取道泰州到达扬州。此时，日寇攻占南京，他们只好徒步行军向北绕行。时值隆冬，苏北一带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大家却毫不畏惧，顶风冒雪顽强前进。经高邮、宝应、淮阴，到达邳县，再坐闷罐子火车到徐州，又转

郑州。在郑州公演、治病、休整三天，于1938年1月10日到达汉口。地下党同志早在大智门车站迎候他们，并送他们入驻花楼街洪益巷培心小学。他们历时50多天，跋涉千里，总算又找到了党组织。

由于长途跋涉的艰险和辛劳，不少年幼的团员都病困交加。他们中有的躺在床上打“摆子”，有的卧床发高烧，有的身上长满疥疮。正当他们身心交困的时候，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吴志坚，到洪益巷培心小学看望孩子剧团的团员们。这群天真的孩子，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紧紧握着邓颖超的双手，热泪盈眶。邓颖超亲切地说：“孩子们，

你们好！周恩来派我和吴志坚同志，代表八路军办事处的全体同志，向大家表示慰问！”此刻，教室里响起孩子们的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喜悦的欢呼声，“感谢党的关心，感谢邓颖超的问候”。邓颖超慈母般地抚摸着几个最小的孩子，一会儿理理他们的头发，一会儿摸摸他们的衣服和被褥，当她发现一个8岁的团员在大冬天没有穿袜子，便立即把自己的袜子脱下来给他穿上……她一一走到每个生病孩子的面前，亲切地问他们得的什么病？去医院看过没？并特别告诉他们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从自己的零用钱里凑了几十元钱，送给你

▶ 1938年2月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驻地，邓颖超和孩子剧团演员们在一起





孩子剧团部分成员

们买药治病。孩子们接过这几十元钱的时候，个个热泪滚滚，说道：“感谢周副主席对我们的关怀！”“感谢八路军办事处同志们对我们的关怀！”邓颖超说：“不要谢，你们一路辛苦了”，赞扬他们“年纪小，志气大”，勉励他们做好抗日宣传，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为中华民族的救亡事业作出贡献。

在汉口，党派地下党员蔡馥生、陈乃昌（解放后曾任贸促会顾问）当指导员，曹荻秋（解放后曾任上海市长）教英文，文化名人常任侠教语文，著名导演郑君里任艺术指导，冼星海常来教唱歌，为孩子剧团教唱许多抗战歌曲，如《游击军》、《在太行山上》等歌曲，演唱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1938年2月9日，周恩来派吴志坚乘一辆大卡车到培心小学，接孩子剧团全体成员到八路军办事处做客。周恩来特地为他们举办欢迎会，他在会上说：“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战争的一支生力军。眼前的事实，你们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你们要一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创建新中国。我希望你们用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武装头脑。”此时中共在武汉创办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曾用三天的时间，整版副刊发表了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的五篇通讯。同时，还刊登了孩子剧团的《宣言》，他们在《宣言》中发誓：“不逃、不躲，要同日本鬼子拼。”“以我们所有的力量，团结起来，以过去所爱

好的工作为国家服务，为民族尽力”。

## ● 抗战舞台显身手 党旗指引去战斗

《新华日报》发表了孩子剧团的通讯和《宣言》后，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人民群众普遍赞扬这群贫苦的孩子，千里迢迢，千辛万苦，投身抗日，实属不易。除邓颖超等经常来看望、指导他们以外，茅盾、史良、张劲夫、楼适夷等社会名流也常来帮助。更多的救亡团体、中小学校代表及广大社会民众都来慰问孩子剧团。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对孩子剧团却处处刁难，妄图遣散这个革命剧团。一天，国民党抗敌后援会宣传大队长廖应钟来到孩子剧团，盘问他们是怎样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恐吓以后“八办”来了什么人要向他们报告，今后的一切演出和活动要报告他们批准。没过几天，孩子们正在驻地培心小学进晚餐时，国民党武汉市党部第六处办事员“大金牙”来培心小学，通知明天上午派车子接全体成员到市党部去。他们要扼杀孩子剧团，怎么办？大家议论纷纷、束手无策时，吴蒲生、许翰如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周恩来的话：“今后你们遇到什么困难，就来找我，找八路军办事处”。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周伯伯去！于是，吴蒲生、许翰如和几个被推选的代表，连夜摸

▶ 汉口洪益巷培心学校界碑



黑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亲切地说：

“你们的主张是对的，一定不能搬进市党部去。搬进去了，就与工农群众隔绝了，是不容易出来的。不过，我们正处在国共合作时期，这就要求我们要注意有灵活的斗争策略。我看，这样吧：你们先躲开他们，避避风头。明天一早，你们演一场空城计，给国民党顽固派看看……”周恩来笑着，继续说：“你们明早以下乡演出为名，暂时搬到大冶县石灰窑去，到黄石港一带去躲一躲。那里有源发煤矿，有汉冶萍钢铁公司。把那里的抗日烈火烧起来，好不好？”吴蒲生、许翰如等人得到周恩来明确具体的指示，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我们马上回去收拾行李！”送走了孩子剧团的客人，周恩来立即着手借船只。吴蒲生等回团后，把情况告诉大家，并立即动手整理行装，待命出发。夜已深了，吴等都不敢入睡，等着周恩来派来联系人。

次日凌晨两点多钟，八路军办事处的白副官终于给孩子剧团带来喜讯：船已借到了，是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女士家的轮船，地点江岸码头，起锚时间是五点钟。孩子们立即背上早已整理好的行装，冒着严寒，跟随白副官迅速奔向江岸码头。江汉关的钟声刚敲过六点，孩子剧团乘着轮船顺着江水向石灰窑驶去。

就在同一时间里，“大金牙”乘一辆

大卡车来到培心小学，他跳下车便大声吆喝：“快起床，你们这群小懒鬼！”学校大门被踢开，可里面却没有一点动静。“大金牙”命令司机把车灯打开，这一照，只见里面空荡荡的，门上还张贴着一张“抗日有理，救国无罪！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标语。“大金牙”气急败坏，把门上的标语也撕碎了。

为了保护这批革命的幼苗，周恩来通过郭沫若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交涉。不久，政治部第三厅成立，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田汉任六处处长，洪深任六处戏剧科科长，并确定将孩子剧团归属戏剧科领导。这样，孩子剧团从石灰窑回到武汉，又活跃在宣传抗日的政治舞台上。

后来在周恩来关怀下，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去了八路军、新四军，有些考进戏剧、音乐学校。小指挥严良堃进了音乐学院，成为著名指挥家，曾任中央乐团团长。第二任团长许翰如去了延安，解放后在总政文工团、文化部担任领导工作。孩子剧团培养出一批人才。

培心小学后经改扩建为武汉市三十六中学，又改为武汉市第六职业中学，现为武汉市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校，校门改在花楼街。

# 《新华日报》社旧址

《新华日报》社旧址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民意一路大陆里4-9号。

## ● 冲破当局阻挠 中共创办《新华日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领导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数次谈判。1937年8月上旬，应国民党之邀，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同时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双方经艰苦谈判，终于达成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并承认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由共产党人创办一种公开发行的报纸，即后来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题写报头的《新华日报》。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于是中国共产党在南京成立办事处，



并筹备《新华日报》的出版工作。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拖延，在南京没能出版发行。

1938年1月9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建馆举行招待会，向各界宣布《新华日报》即将正式出版发行。10日，为庆祝即将创立的《新华日报》，报社举行全体人员大会，董必武出席并代表长江局致辞：

“《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嘴巴，希望大家做好工作。”《新华日报》于1938年1

月11日在武汉正式创刊发行。报社选址汉口府西一路149号（今民意一路大陆里），发行部设在大陆里临街的平房内（原建筑已改建）。

《新华日报》社的骨干都是党的优秀干部。根据国共谈判中达成的释放政治犯的条款，一些被捕的党的干部获得自由。从国民党苏州反省院获得自由的潘梓年、华岗、章汉夫等就成了《新华日报》的基本骨干。经过周恩来推荐，并经毛泽东同



▲  
里4-9号)  
《新华日报》社旧址(今大陆

志批准，潘梓年（哲学家、逻辑学家。1927年入党，曾任江苏省委机关报《实话报》总编辑）出任《新华日报》社社长，负责报社全面工作。华岗（华西元，历史学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编辑。章汉夫（谢雅泰，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被任命为编辑部主任，后又任命为副总编辑和总编辑。熊瑾玎（原湖南新民学会会员，1927年经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郭亮介绍入党，后来又在

上海做掩护地下党机关工作)被任命为《新华日报》社总经理。还有不少充满爱国热情的编辑、记者和擅长发行工作的同志都加入了报社行列。国内版编辑石西民,国际版编辑何云,第四版副刊楼适夷,主管专栏文章的是吴敏(杨放之),采访部主任陆诒。报社设立编辑部、营业部、经理部、印刷部。下面还设立采访课、发行课、广告课、服务课、图书课等等。1938年4月,报社内成立了党支部。8月成立了职工会。

在汉期间《新华日报》社就健全了一切组织机构,成为团结一致,纪律严明的战斗集体。《新华日报》在汉时,直属中央长江局领导,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何凯丰、邓颖超等组成了《新华日报》董事会,王明为董事长。

### ● 高举团结救国持久抗日的旗帜

《新华日报》的出版旨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全国公开的党报及其发

1938年1月2日《新华日报》创刊



1938年5月新华日报社战地记者合影留念



行网”的指示，宣传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它在发刊词中说“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做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之原则下……本报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抗日个人、集团、团体、党派之共同喉舌，本报力求成为全国民众的共同呼声……愿与全国一切英勇的抗日战士与同道，互相勉励，手携手地共同为驱除日寇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因此，《新华日报》的创刊得到各党派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拥护与支持。许多党政要人和社会名流先后为《新华日报》的创刊题词致贺。

《新华日报》高举团结救国、持久抗

战的旗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它登载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人及八路军、新四军高级指挥员的文章与讲话。及时刊登党的声明、决定、启事。通过社论，向全国人民阐明中国共产党对重大事件的立场和态度。它以大量篇幅报道、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介绍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和经验，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真实情况的封锁，回击了他们的污蔑。它还热情报道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和徐州会战。在武汉外围渐趋紧张时，报社派出战地记者陆诒、石西民等去前线采访，忠实报道了抗日将士的浴血奋战。

作为“一切抗日的个人、集团、团体、党派共同喉舌”，《新华日报》把广大的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沈钧儒、史良、梁漱溟等，都把《新华日报》作为他们发表政见的园地，广大知识分子更是把《新华日报》当作良师益友，在《新华日报》上反映他们的困难。《新华日报》还非常关注群众呼声，善于联系群众，经常组织读者会，接受读者批评与监督，并通过创办《青年生活》、《妇女之路》、《团结》、《文艺之页》、《友声》等副刊来做各方面群众的工作，把广大群众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正因为如此，《新华日报》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欢迎。它在全国很多城市设立了分馆或分销处。创刊之初，每天的销量为2万多份，到了4月份以后，达到5万多份，成为伟大民族战争中催人奋进的号角，照耀前进道路的灯塔。

《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在汉创刊，到1938年10月24日在武汉出版最后一期，共出版了287期，5月2日曾休刊1天。报纸的基本版式是：第一版社论、广告；第二版国内新闻；第三版国际新闻；第四版副刊；报眼处大都是形象生动，战斗性强的漫画。报纸开始采用综合编辑的方法，到6月份，便过渡到分类编辑。在国内新闻版上，分出“前线战报”、

“政治要闻”、“敌寇暴行”、“救亡消息”、“最后消息”等专栏；在有关战况的消息中，又分出“沿江战况”、“华北战况”、“晋鲁冀战况”等。国际新闻版上，分出“世界一日”、“国际要闻”、“世界援华运动”等栏，并分别标出苏联、美国、英国等国名。这些摸索的经验为报纸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新华日报》的诞生，成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宣传阵地，是插在国民党反动派心脏的一把尖刀。它出版的第二天，国民党的《扫荡报》就在头版发表了专论《如何建立战时宣传政策》一文来攻击《新华日报》的问世。1月17日下午6时半，20名反共分子手持斧头闯进《新华日报》营业部，继而到排字房、机器房狂施捣毁。报社的同志连夜将毁坏的东西进行清理修复，第二天照常出版。

### ● 抵制王明右倾错误 周恩来、董必武接管报社工作

《新华日报》在汉创刊初期也受到王明的干扰和影响。1937年12月才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以共产国际负责人自居，以当上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身份，兼任《新华日报》董事长。他极力推行右倾思想路线。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对抗中央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独

立自主原则”；他对必然失守的武汉提出“把武汉变成牢不可破的马德里”而对抗中央“不应顾惜”武汉的思想；他以“欧洲办报思想”来取消党对报纸的领导，不经过中央批准和违反组织纪律，擅自发表宣言和讲话。另外，就个人品质修养来说，王明爱出风头，写文章还要登上他的标准像。不仅如此，连他的老婆孟庆树跟在宋美龄后面，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他都要求报纸以显著版面加以宣传。王明对报馆领导稍不满意，便加以指责、训斥。对于抵制他错误的同志还伺机报复，动辄就进行组织处理。如潘梓年被他内定为调去延安，华岗、章汉夫以派出采访为由而调离工作岗位。

对于王明的错误思想和不良工作作风，报社的主要领导都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潘梓年同志总结这一段工作时说：“……就以报馆工作来说，1937年在南京，1938年在汉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王明领导下进行的……经常在电话中受到琐细的指责，弄得同志们不知如何是好，整天苦恼不堪。”华岗曾明确表示：“王明那一套不行，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革命的领袖是毛泽东。”章汉夫同志明确主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新华日报》上登载，而王明加以否定，报社以单行本出版发行了《论持久战》，并随《新华日报》送阅，

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新华日报》在介绍这部著作时鲜明地指出：“本文可说是第三期抗战后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实为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指南”，“凡属军政人员与救亡工作者，均宜精研细读，以求理论和实践之合一”。白崇禧发给桂系军队排级以上军官人手一册。许多国民党高级军官初步受到了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的影响。这是王明所始料不及的。王明从国外回来，一下子成了《新华日报》的最高领导人，并以“太上皇”自居，这自然引起报社上下的不满。幸好这样的情形并未延续多久。8月共产国际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中共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共产国际这一指示，为纠正王明右倾错误，最终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并撤销了他的中共长江局书记职务，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9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了在汉主持长江局工作的凯丰、董必武、叶剑英。周恩来为南方局书记，兼任《新华日报》董事会的董事长，董必武为副书记，从此，《新华日报》便一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周恩来负责报社工作后，恢复了章汉夫的工作，以后又任命他为副总编、总编辑。



随着工作的展开，又增加了从法国回国的吴克坚为《新华日报》的总编辑。领导班子的稳定和加强扩大了报社的工作范围，并形成了一支坚强的编辑出版发行队伍。《新华日报》社不仅出版发行报纸、周刊，而且还出版了上百种马、恩、列、斯、毛的专著和其他进步书籍，扩大了革命思想理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影响。

1938年10月24日晚，周恩来前往刚迁到汉口界限路（今合作路）44号的《新

华日报》编辑部，为《新华日报》汉口版口述、朱世纶执笔，完成在武汉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社论郑重宣告：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手中。社论校样出来后，周恩来亲自看了一遍，然后对报社的工作人员说：“国民党已经撤退武汉，蒋介石也走了，但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冲锋在前，要坚持到最后的时刻再撤退。”在武汉沦陷的当天——25日凌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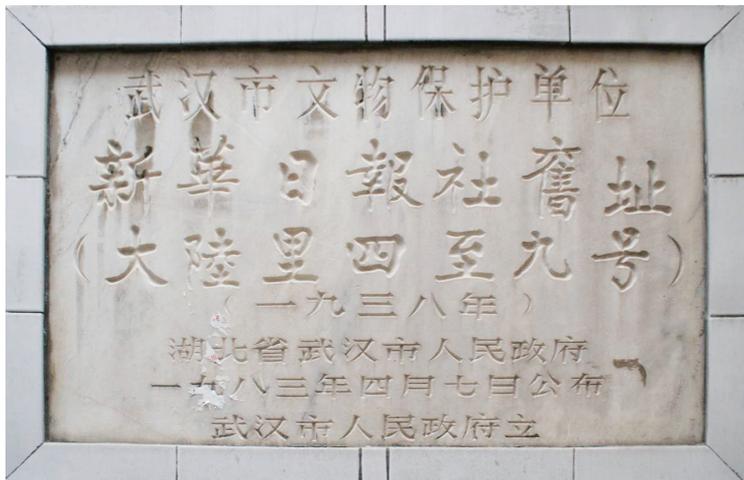
他还亲临检查最后一期报纸的付印和出版，并送走了最后一批撤退人员，才离开武汉。

《新华日报》的部分工作人员在董必武的率领下，先期到达重庆，《新华日报》馆设在重庆苍坪街69号。武汉停刊，重庆出版，《新华日报》一天也未中断。至此，《新华日报》在汉坚持了近10个月的时间，走过它光辉的初期阶段。《新华日报》迁到重庆后，直到1947年2月28日被迫停刊，胜利撤返延安。

《新华日报》社旧址。房屋均为二层石库门房屋。分别作为编辑部、印刷厂和工作人员宿舍。社址原房屋仍在，现作居民住宅。

1983年4月7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3年4月7日《新华日报》社旧址被  
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匾牌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成立大会会场旧址（汉口总商会旧址）位于武汉市江汉区中山大道489号（今武汉市总商会）。

### ● 抗战文化之都

1938年的武汉，不仅是实际上的战时首都，而且是当时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中心，也是一座抗战文化之都。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直是中国文人引为基本的做人底线。在此日寇强侵国土、肆掠河山，何以报国，只有用自己手中笔，用自己歌喉和艺术才能，去怒吼，去激励前方将士，唤起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到武汉去”，成为当时爱国人士，尤其是文艺界人士中最富感召力的一句流行语。精英荟萃，为抗战初期武汉文化运动的深入、广泛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东北作家群，从陷落后的平津逃出的作家，从上海转赴武汉的文艺界人士、随南京国民政府西迁的文化人、全国各地奔赴抗战中心的作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家齐聚武汉，形成实力雄厚、阵容壮观的抗战文化大军。

汇集武汉的文艺界人士组成各种文化抗日救亡团体。于1937年8月4日，在江汉路冠生园成立了以程仲子为首的武汉文化界抗敌工作团；1937年12月19日在国民党武汉市党部礼堂成立的，以段公爽为首的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共产党人在推动各抗日团体成立过程中起到了组织领导作用。1937年12月31日共产党员阳翰笙在汉口大光明戏院组织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1938年1月26日，阳翰笙、冼星海等组织成立的全国歌咏协会；1938年1月29日阳翰笙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这些协会成立后开展了有各自特点的抗日救亡活动。

### ● 周恩来指导组建“文协”

周恩来针对武汉当时文艺界抗日的热情，提出建立一支全国性的文艺界统一战线队伍。他指示阳翰笙去着手组织力量。文协的筹备最初是由14位热心人士成立了一个临时的筹备会，周恩来等人也同国

民党文化界负责人和各方文化人士多次磋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1938年2月24日正式成立了包括老舍、阳翰笙、冯乃超等20余人在内的筹备委员会。周恩来对阳翰笙提议，由老舍出任“掌门人”。

“文协”不设理事长，采用集体领导的方式，而一切会务由“总务主任”主持，共产党员在协会中任理事或候补理事。老舍曾说：“文人，在平日似乎有点吊儿郎当，赶到遇到要事正事，他们会干得很起劲，很紧张。文艺协会的筹备期间并没有一个钱，可是大家肯掏腰包，肯跑路，肯车马自备。就凭着这一点齐心努力的精神，大家把会开成，而且开的很体面。”经过筹备委员会与文艺界共同努力，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召开成立大会。与会有500余人。会场上巨幅标语写着：“拿笔杆代枪杆，争取民族之独立；寓文略于战略，发扬人道的光辉”。蔡元培、周恩来、罗曼·罗兰、史沫特莱等12人组成大会名誉主席

团，主席团有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老舍、胡风等 10 余人。与会全体代表为追悼抗日阵亡将士俯首静默 3 分钟。周恩来、郭沫若、冯玉祥分别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周恩来说：“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诸位先知先觉，是

民族的先驱者，有了先驱者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的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郭沫若也在会上作了充满激情的讲话：“我们要牺牲一己自由求民族之自由，牺牲一己生命求民族之生命，不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要鞠躬尽瘁，死而不已！”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和由茅盾起草的《告世界文艺家书》。大会确定“文协”的宗旨为：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图为与会文艺界人士合影



“联合全国文艺作家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建设中国民族革命的文艺，并保障作家权益。”大会选举选出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陈铭枢、老向、郁达夫、成仿吾、巴金、张天翼、胡风、姚蓬子、沈从文、郑振铎、朱自清、朱光潜、许地山、夏衍、张恨水等45人为理事，周扬、吴奚如等15人为候补理事，蔡元培、宋庆龄、柳亚子、白崇禧、陈立夫、陈诚、何香凝、周恩来、张闻天等国共两党要人被聘为名誉理事。

### ● 全国文艺家齐心协力服务抗日

“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终于有了自己统一的组织，标志着全国各派的作家，开始以集体的力量为抗日战争服务，也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告成。“文协”理事会推选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理事会商借设在汉口总商会旁，永康里42号的中国文艺社，不久，永康里20号的房子空出，即与中国文艺社一同迁入。老舍对“文协”的成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分散开来，他们也许只能放出飞蚊的微音；联合起来，他们定能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大家能凑在一起呐喊，就是伟大！”“文协”的成立，使全国的文艺家们捐弃了前嫌，实

现了不分党派、不分流派的前所未有的大团结。正如“文协”在《告世界文艺家书》中所说：“这个集团的命名就指明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文艺集团，而是一切文艺家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团结；集合在这抗日建国旗帜下的我们，虽然在文艺的流派上说起来是可以区分为多种多类的，但是我们在政治上只有一个目标、一个信念：中华民族必须求得自由独立，而要求得自由独立，必须全民族精诚团结！”“文协”成立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继“左联”之后的文艺界人士第一次空前广泛的大联合。随后，“文协”在各地建立了数十个分会及通讯处。先后成立了分会的地方有：广州、成都、昆明、桂林、香港、襄樊、延安、晋东南、贵阳、曲江、上海等地。总会和分会落实“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大会口号，团结、鼓励文艺界人士深入现实斗争，宣传抗日，繁荣抗战文艺创作。“文协”曾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多次访问慰劳各地战场，推动文艺界下乡和入伍，掀起了抗战文艺创作的繁荣和高潮，宣传和鼓舞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抗击日寇。“文协”成为文艺界团结抗战的一面旗帜。当时抗战中的武汉，是抗战文艺的开拓基地，也是许多作家创作生涯中重要或辉煌的时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漢口商會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  
大会旧址（汉口总商会）



“文协”成立后，文艺各部门的统一战线团体也相继出现，地区性或全国性的联合组织，同人组织、演出组织等文艺社团数以百计，作家、艺术家空前广泛地团结对敌。在武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张善子等发起，1938年6月6日在武昌青年会成立）、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以叶浅予为首，1938年6月12日成立）、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马达等发起，1938年6月12日在汉口培心小学成立）、中华全国摄影协会、中华世界语协会；七月社（以胡风为首）、自由中国社（以臧云远为首）、战地社（以丁玲为首）、时调社（以穆木天为首）、文艺战线社（以胡绍轩为首）、抗到底社（冯玉祥倡议发起并资助）、弹花社、文艺月刊社、哨岗社、新演剧社、中国新兴乐剧社（桂公创等人发起）、新南剧社（史东山等发起）、铁马剧社（胡绍轩等发起）、青年铁血剧社（彭文凯等发起）、量才剧团、民族剧社、雪社、前锋歌咏团等，使抗战初期的文艺活动呈现出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在武汉的广场、大街上时常可以看见宣传活动和各种演出，抗战文艺如火如荼。

“文协”于1938年5月4日创办了会刊《抗战文艺》，也是“文协”重要宣传阵地。会刊编委会严格按照：“三三制”

组成。具体负责者，则定为楼适夷、姚蓬子和蒋锡金3人。名单是老舍所提出的，经过“文协”中的中共党小组的讨论，并最终请示周恩来。这样的安排保证了党对会刊的领导权。蒋锡金曾说：“在具体执行编务遇到问题有争执时，我和适夷对姚蓬子是二比一，老舍有时也来参与编务，那就变成三比一，姚蓬子总是少数。”《抗战文艺》于筚路蓝缕之中坚持。它不仅是抗战期间寿命最长的一份刊物。而且也成为抗战之中的一面鲜艳的旗帜。老舍曾称赞道：“它实在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文献。它不单刊录了战时的文艺创作，也发表了战时文艺的一切意见与讨论，并且报告了许多文艺者的活动。它是文，也是史。它将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资料。同时它也表现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读者看到作家们是怎样的在抗战中团结到一起，始终不懈的打着他们的大旗，向暴敌进攻。”《抗战文艺》自1938年5月4日创办，至1946年5月终刊，先后出版71期，对于开展抗日文艺活动，繁荣创作，培养青年作家等，都发挥了作用。

当时汉口总商会还曾是各阶层人士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重要场所。主要有：1938年2月20日，在汉口总商会举行武汉空战为国殉职空军大队长、烈士李桂丹、队长烈士吕基淳追悼大会；2月24日，举

行钱亦石先生追悼会；3月20日，追悼东北抗敌阵亡将士；5月8日至15日，武汉人民在汉口总商会哀悼徐州会战，奋守孤城而壮烈殉国的王铭章师长。国民党以蒋介石为首的党、政、军要员到灵堂祭奠，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人也参加了追悼活动并送花圈、挽联。毛泽东、吴玉章、秦邦宪、董必武等人联名送的挽联写道：“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汉口总商会大楼于1919年始建，汉协盛营造厂设计施工，1921年元旦庆祝落成。汉口总商会由湖北路杨子街口迁入大楼办公，当时汉口总商会会长是万泽生。1931年按照南京政府颁布的《商会法》及《工商同业公会法》，改组成立“汉口市商会”。汉口总商会大楼是武汉商业发展的标志性建筑。新中国成立后，是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的办公大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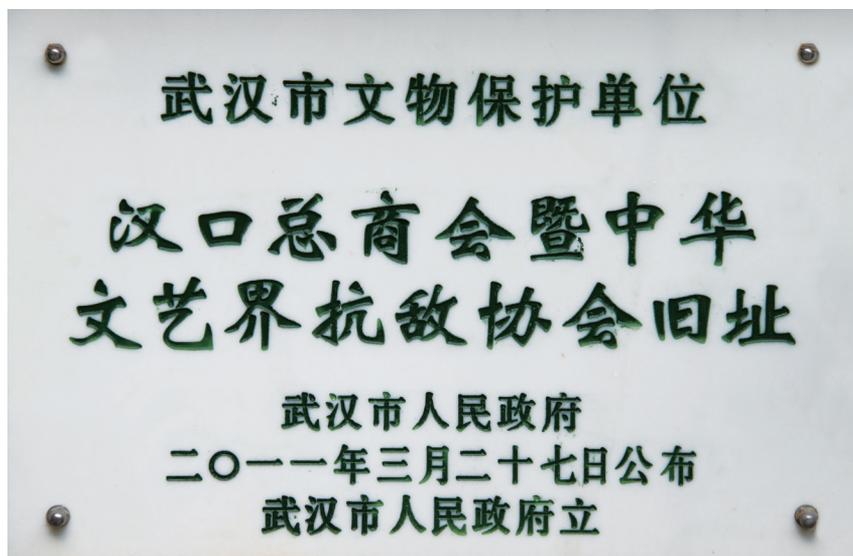
▶  
汉口总商会匾牌



1993年公布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2011年3月27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3年汉口总商会被评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匾牌



第五编

# 红色印迹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1945.8—1949.5

Quanguo Jiefang  
Zhanzheng Shiqi

第五编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 红色印迹

Quanguo Jiefang  
Zhanzheng Shiqi

1945.8—1949.5

江汉关大楼是武汉市第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公开升起的地方。它坐落在汉口江汉区沿江大道与江汉路交会处，江汉路一号。

## ● 党旗见证武汉解放

1949年5月16日清晨，江汉关钟楼上飘扬着一面巨幅红色镰刀铁锤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党旗迎着江风高高飘扬，预示着武汉崭新的一天开始了。原来这面党旗是中共党员刘虹等几位女同志根据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曾惇的指示赶制的。刘虹是中共地下党员，其家庭成员都是支持革命的，其兄弟姐妹多人都参加革命工作。她家住同兴里21号，是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点和活动场所。

▶ 1949年5月16日凌晨，一面巨幅中共党旗在江汉关钟楼飘扬



1949年2月刘虹将这份材料放在卷烟里面送给党组织

代葉子... 1949年2月

...的方针和指示... 党的新情... 各项工作... 群众反借... 工作... 成功与失... 工作... 成功与失... 工作... 成功与失...

▶ 刘虹与侄女的合影



党组织指派刘虹与另一党员汤佩佑开展妇女工作。刘虹遂通过民主人士李冬青联络部分上层妇女和其他人士在汉口同兴里家中成立民主妇女联谊会，会员有 30 余人。

地下市委书记曾惇、委员陈克东、教委负责人杜子才、学委负责人王一平等经常到同兴里 21 号秘密联络点研究工作。武汉解放前夕，按照地下市委的指示，刘虹的大哥刘连庆自己动手组装了一台小型

的短波收音机，每天收听新华社的广播，然后将记录稿转交组织。这些文稿里面有毛泽东的重要文章《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工商业政策》等以及中共中央制定的重要文件《土地法大纲》、《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当他们收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消息后，情不自禁，欢欣鼓舞并把这一特大喜讯迅速报告给市



▲刘虹秘密收录新华社电台广播的小阁楼

委，曾惇等领导也高兴异常。

不久，中共武汉地下市委指示刘虹等人，制作一面大的党旗和几面大的红旗，迎接武汉解放。刘虹等人为了防止敌特发现，要刘的大哥去买红布。刘连庆遂装扮成富贵人家子弟，以准备婚嫁去绸缎店买回红布和黄色布匹，用其制作红旗。然而红旗上的镰刀铁锤怎么画呢？刘虹想了一个点子，她到文具店买回一套万国国旗图，将其中苏联的国旗图案作为样本，把镰刀铁锤的样子放大来画，在红旗上画图样。刘虹等人在刘母的指导下，量尺寸、剪裁、缝纫，并精心细致的绣上镰刀铁锤，通宵达旦赶制了一面特大党旗和几面大红旗。5月15日清晨，曾惇的夫人王一南抱着婴儿来到同兴里21号刘虹家中，她将红旗裹在婴儿的襁褓里带走，交给了党组织。当天夜晚，国民党白崇禧的部队撤离汉口，地下党组织指派当时武汉老字号汉口珠宝店学徒余志平负责，和进步青年吴德峰（与武汉市首任市长同名）、周奇一起，于5月16日凌晨爬上江汉关钟楼，将特大党旗挂了上去，其他几面大红旗也分别挂在江汉关大楼旁边的几个大建筑的楼顶上。清晨武汉市民就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在晨风中飘扬。这是武汉在解放军进城之前第一面公开升起在高大建筑上的党旗。只可惜这面党旗后来不知落于何处。下午3

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在师长邓岳，政委李伯秋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汉口市區，汉口万人空巷夹道欢迎。一支身着海关服在写有“江汉关”三个大字的横幅引领下的江汉关关员队伍也在欢迎的人群中。紧随其后还有一支由海关关员组织的秧歌队，尽情欢歌喜舞，迎接武汉的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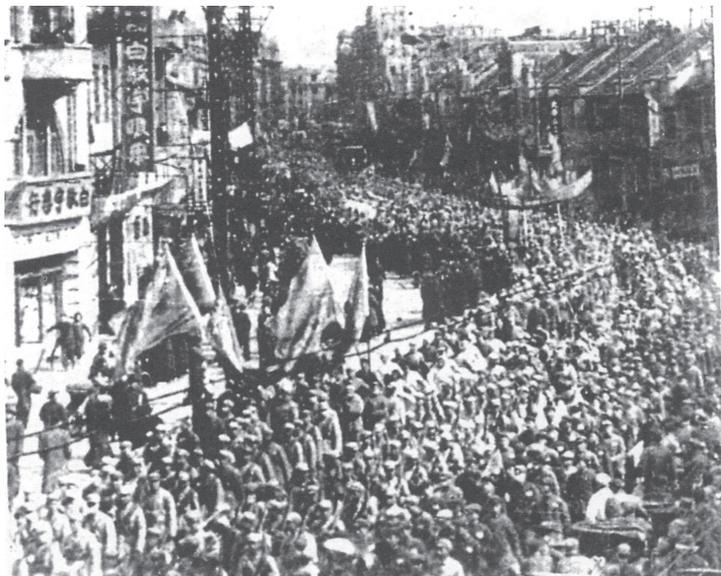
在江汉路一家银行门口，邓岳的手与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曾惇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汉口人民热烈欢迎解放军像过盛大节

► 中共武汉（地下）市委书记 曾惇



► 1949年5月16日江汉关职工上街游行欢迎解放军





▶ 1949年5月16日，解放军行进在汉口闹市中心

日一样。队伍走到哪里，哪里便是口号声声，鞭炮齐鸣，掌声不绝，整个江城一片欢腾。

巍巍江汉关钟楼，目睹了武汉屈辱巨变的历史。在江汉关钟楼的顶端，中国共产党党旗高高飘扬，武汉天亮了。

那一片鲜红，浸透了鲜血；那镰刀铁锤，充满了力量和希望。

1949年5月16日，深深地融进武汉的历史与武汉人民的记忆。

1949年5月16日，一个古老重镇的新生，一个现代都市的崛起。

### ● 革命精神的传承

在此之前，发生在江汉关大楼的革命历史事件还有很多。

1938年7月7日，“七七”抗战周年，中国共产党

发起和领导的献金运动在江汉关设有献金台。7日下午2时半，一辆大卡车载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组成的“中共献金团”来到江汉关献金台前。首先由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王明代表中共中央郑重献金1000元。接着，周恩来将他在军委会政治部所得一月薪金240元献出，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等7位国民参政员献出7月份的薪金共2450元，叶剑英、李克农、钱之光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20多位同志都

捐献了一个月的薪金。坚持在战火中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全体将士也委托“中共献金团”捐出节约下来的伙食费1000元。“中共献金团”的举动赢得台上台下的一片掌声。上千群众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1947年秋末，江汉关巡江事务处刘怡冰（女）、李葆初经徐中玉（女）介绍，参加“湖北民主青年先锋队”。该组织是1947年秋由吴垠等新四军五师的同志为主，在武汉建立的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在

▶ 1938年7月7日《新华日报》社献金团到江汉关献金



中共武汉地下市委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1948年4月，吴垠被捕，民主青年先锋队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建立了鄂豫军区。由一纵十九旅为基础，组成第三军分区，包括今黄陂、红安、孝感、大悟四县。并成立地委，地委书记兼三军分区政委。简称中共鄂豫三地委和鄂豫三军分区。1948年秋，鄂豫三地委城工部秘书古正华来汉，和江汉关内的民主青年先锋队取得联系，不久民主青年先锋队的组

织活动恢复，队伍也不断扩大。到1948年底，根据城工部的指示，将民主青年先锋队的工作由江汉关扩大到社会上去，建立“武汉人民解放先锋队”。在江汉关巡江事务处绘图室举行建立武汉人民解放先锋队的会议，总队部就设在江汉关内。总部委员会由古正华、徐中玉、郭志达、丁亚航和刘怡冰组成。古正华回到城工部后，城工部又派刘杰（刘超群，中共党员）来担任总队书记。

1948年10月，根据城工部指示，在

▶ 1949年武汉解放前地下党组织油印的宣传材料



现在的江汉关大楼



江汉关建立了地下收听站。刘怡冰负责听录，徐中玉刻写，郭志达油印，地下收听站及时传播党中央的各项政策，新华社的广播、社论、战况，这些宣传品通过电信局、公路局和省高中等地下组织，在武汉三镇散发、张贴，让三镇人民及时了解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和党的方针政策。地下收听站坚持长达7个月之久，直至武汉解放。

1948年底，在城工部的支持下，民主青年先锋队组织“叮当合唱团”，团结广大青年，唱进步歌曲，谈革命理想，歌唱团后来发展到60多人，歌声引导不少人走上革命道路，武汉临近解放，为迎接解放军进城，城工部布置成立秧歌队。古正华带领合唱团，高举红旗，敲起锣鼓，扭着秧歌，走上街头，这是汉口解放当天最早上街的一支秧歌队伍（这支欢迎解放军进城的群众队伍照片，陈列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江汉关大楼于1921年兴建，1924年竣工，英国建筑师辛浦生设计，魏清记营造厂承建。大楼由主楼和楼顶钟楼组成。总高46.3米，占地1499平方米，建筑面积4109平方米。大楼为英式建筑风格，主楼为4层，主面采用三段构图手法，以钟楼为中心呈对称状。墙面，窗楣和入口为半圆形拱门，并排而立的8根1.5米直

径的廊柱与通向大门的23级台阶皆能感受到大楼的威严与庄重。解放后江汉关改名为武汉关。1980年，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中国海关”四个大字竖立在大楼顶层，一个体现国威庄严，体现对外开放巨大亲和力的江汉关重新对外开放，再现了它的活力，为武汉在中部崛起，走向世界，追逐中国梦，发挥出更大作用。

江汉关大楼于1987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12月16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筹建江汉关博物馆，这座近百年历史的江汉关大楼，雄关依旧风光，它将为武汉的博物馆之城，江汉区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再作历史鉴证。



附录

# 红色印记

武汉市江汉区其它遗址遗迹

---

Wuhanshi Jianghanqu Qita Yizhi Yiji

武汉市江汉区其它遗址遗迹

附录

# 红色印记

Wuhanshi Jianghanqu  
Qita Yizhi Yiji

# 汉口孙中山先生纪念铜像

▶ 孙中山先生铜像



汉口孙中山先生纪念铜像立于武汉市江汉区民族路、民权路和三民路交会处的广场中央。

## ● 立像致崇敬 众望所归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在南洋大楼召开二届三中全会。会议期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日，会议决定休会一天，会议代表分别参加武汉三镇的纪念活动。由此，与会代表想到孙中山对国民革命的贡献，中华民国的国父，加上汉口乃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应该建一座孙中

山先生的塑像，以示纪念。因而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孙科、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恽代英、林祖涵、宋子文、谭延闿、徐谦、陈公博等 12 人提交了提案，提出在汉口铸建孙中山先生铜像。这是第一次提议在汉口建筑孙中山铜像。随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汉分裂，汪精卫“七一五”“分共”，遂宁、汉合流，社会动荡不已，塑造铜像之事即被搁置下来。

1929 年 7 月 8 日，汉口特别市市长刘文岛重提建设铜像之事，并将“筹办总理铜像事宜”交由政府八局、秘书处采办委员会办理。当时曾有人主张请外国人设计，后决定由上海的雕塑艺术家江小鹣设计。时任财政局局长的吴国桢因市库收入颇多存蓄，遂拨出专款筹建。留学回国的工务局工程师吴国炳（吴国桢之兄长）赴上海与江小鹣接洽设计，由江完成孙中山铜像设计工程。

江小鹣是当时著名的雕塑艺术家，曾为徐志摩诗集设计绘制封面，武汉龟山公园的黄兴铜像也出自他手。

铜像的安置地点，市工务局于 1930 年 10 月拟定江汉关前面的空地上。后来市政道路改造，三民路已修好，民权路正在施工，即将完工，民族路也准备修建，而这三条马路的交会处空出一个直径 60

余米的大圆圈，俗称“六渡桥磨盘”。于是在 1931 年 2 月召开的第八十八次市政会议讨论决定，将孙中山铜像竖立在此。以后武汉人俗称此处为“铜人像”。

### ● 塑像尽周折 耗时五年

铜像的基座工程由市工务局包给营造商李万和承建。石座高是十三尺六寸，下建磨石台阶五级，所有磨石均采自湖南。基座下面的地脚打桩等工程，则由市工务局负责完成。铜像在上海铸就后，随即运到汉口。寄存在招商局货栈内。其时汉口特别市政府改为省辖市，刘文岛调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何葆华于 1931 年 7 月接任汉口市市长。当年大水，何兼任两湖防汛主任。何从中以次充好，大肆贪污，致使堤防建设不达标，最后溃口，大水冲入汉口市区，街可行舟，市民财产遭受空前巨大损失。张难先向蒋介石面诉。经查实，除将何撤职外，并没收股金 1 万元（银元）和汉口胜利街房屋 1 栋（何于 1951 年在黄冈三里畈河坪处决）。其后万声扬接任市长。万到任后，见财政困难。市政建设难以开展；官场请托频繁，穷于应付。长于教学的“书生”万声扬在当了 3 个月市长后，遂辞职而去。1932 年 7 月，吴国桢调任汉口市市长。时在汉口大水之后、百废待兴、物资匮乏、物价上涨、人民生

▲ 1933年6月1日孙中山铜像揭幕照



活痛苦。吴上任后，积极发展生产，改善经济，稳定人民生活，继续进行堤防建设等市政工程。“追维前事，弥增感怀”，“决意踵而成之，已慰舆望”。12月吴国桢遂令承包铜像石座的李万和继续开工，吴国炳负责督办。致使已停工1年有余的工程得以继续进行。1933年4月下旬工程完工。

1933年6月1日上午9时，市长吴国桢柬请武汉三镇各界人士在三民路口举办揭幕典礼。当吴国桢用绳索拉下覆盖孙中山铜像的青天白日旗时，孙中山铜像展现在市民面前。铜像坐南朝北，通高7.1米，铜像高2.15米，孙中山免冠着中山服装，右手执杖，左手微垂，右腿直立，左腿前

跨，昂首挺胸，两眼炯炯有神，注视前方，象征着孙中山为三民主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整个造型庄严传神，栩栩如生。

铜像基座呈四方形，5级磨石台阶成圆形围绕基座，周围环以护栏与花坛，整个铜像占地面积约80平方米。

### ● 碑文颂功德 抚今追昔

像座正面刻“孙中山先生之像”，两侧及背面镶刻有时任市长吴国桢撰写的二百七十六字的《像赞》和“序”，说明铜像修建缘起，歌颂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现据碑文照片抄录如下。铭文文白相间，读来颇费思量。

东面：自来立大德建大功行可则言可法者国人想望仪容往往立像以致崇敬而其像或雕木刻石或铸金绣丝或隆以祠宇或陈之广园通衢为式虽有不同然其表彰先德昭示来兹无古今中外一也

总理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四十余年肇造党国勋德之隆亘古无俦而汉口华洋荟萃轮轨辐辏与武昌同为首义之地称华中重镇先生昔尝莅临今即世久而立像之典未具守

南面：斯土者滋用渐焉

民国二十年前市长刘公文岛拟于市内三民路口为先生建立铜像时国祯掌管度支筹资熔铸行将告成会市制变更刘公他调继以水患工遂中辍越明年十月国祯承乏汉市

自来立大德建大功行可则言可法者国人想望仪容往往立像以致崇敬而其像或雕木刻石或铸金绣丝或隆以祠宇或陈之广园通衢为式虽有不同然其表彰先德昭示来兹无古今中外一也

总理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四十余年肇造党国勋德之隆亘古无俦而汉口华洋荟萃轮轨辐辏与武昌同为首义之地称华中重镇先生昔尝莅临今即世久而立像之典未具守

斯土者滋用漸焉  
民國二十年前市長劉公文島擬于市內三民路口為先生建立銅像時國楨掌管度支籌資鑄行將告成會市制變更劉公他調繼以水患工遂中輟越明年十月國楨承乏漢市百端待理追維前事彌增感懷倘不踵而成之不惟無以對劉公抑且無以慰輿望爰鳩工鑿石築場建立規則一如昔議乃為贊曰

于穆總理 維岳降神 卅年革命 救世淑人 經天緯地  
五權三民 忠孝仁愛 信義和平 折中今古 架獲寰贏  
始時號召 社結同盟 千艱萬危 持以忠貞 卒建共和  
功莫與京 南北綰轂 江漢之濱 義旗首舉 車駕頻經  
邦人懷慕 倘恍□□ 是用作像 銅骨金身 具感百世  
以感以興

漢口市市長吳國楨敬撰

百端待理追维前事弥增感怀倘不踵而成之不惟无以对刘公抑且无以慰輿望爰鳩工鑿石筑场建立规则一如昔议乃为赞曰

西面：于穆总理 维岳降神 卅年革命 救世淑人 经天纬地 五权三民 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 折中古今 矩矱寰赢 始时号召 社结同盟 千艰万危 持以忠贞 卒建共和 功莫与京 南北缩毂 江汉之滨 义旗首举 车驾频经 邦人怀慕 倘恍□□ 是用作像 铜骨金身 具感百世 以感以輿。

原碑文在文革初期被水泥覆盖，字迹已毁。在维修铜像时欲恢复碑文，遍寻武汉三镇而不得。后得知地方文史专家徐明庭老人的祖父在抗战初期曾笔录全文。该碑文终于得以再现。

### ● 三镇绘蓝图 当今实现

孙中山先生不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也是中国近代化的伟大设计师。他对武汉的建设尤为关注。1912年4月9日至13日，武汉三镇留下了孙中山的足迹。在他潜心撰著的《建国方略》中，为武汉建设绘制了蓝图：“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此点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尽管当时武汉三镇还未在建制上统一，而孙中山却

将其连成一体加以规划。他考虑到三镇人口百万，工业已有基础，商务发达，为川、贵、湘、豫、陕、甘等省与“世界交通的港口”，而铁路之修建，其地位更显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孙中山先生计划修建铁路，要使汉口成为“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京汉铁路之延长八百有余里，由北京直达中国商业聚中之腹地”。中央铁路系统线路其中有南京汉口线、西安汉口线、北方大港汉口线、黄河港汉口线、芝罘汉口线、海州汉口线、福州武昌线。

整个长江和汉江，包括筑堤和疏通航道，使汉口成为常年巨轮通航大港。他说：“扬子江筑堤竣水路，赴汉口，迄于海，以便航洋船直达该港，无间秋、夏”。设计在汉口附近水域，有的地方要进行挖填及截直工作。整个长江中下游整治，上海成为东方大港，而航洋巨轮可以直接驶进连结2亿内地居民的大陆中心——汉口。与此同时，长江上游亦进行整治，使汉口既成为远洋巨轮之“终点”，又有中小轮船直通宜昌、重庆等地，成为内河航运之起点。与此相联系，还需治理汉水。并设计在沙市开一运河，沟通汉江，使由汉口赴沙市以上各地得一捷径。

汉口孙中山先生纪念铜像



孫中山先生之像



还在实业计划、内河商埠计划中都勾画出武汉的设想。在城建工程中，孙中山提出整治汉口堤岸，截直汉水入江处河道，在长江上开隧道，在江上、汉水上架桥等等，都有卓越的见解，较晚清张之洞的眼光更宽广远大。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缔造了中国国民党，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国民党背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有关武汉的建设蓝图，终止于纸上。而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新中国，走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道，才将孙先生建设武汉的梦想变为现实。武汉在交通方面是全国的航空、铁路、公路、航运枢纽；

工业占据全国重要地位，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商贸发达，物尽其流，城建方面成绩显著，江上桥梁众多，长江上已建成大桥7座，在建2座，到2014年底武汉长江段将有8座大桥通行。汉江上有桥梁6座，长江隧道也有数条。至2049年建国100周年，武汉将更壮丽。到那时，孙先生“略如纽约、伦敦之大”，“为世界最大都市之一”，必将实现。到那时，我们来汉口孙中山先生纪念铜像，缅怀这位革命先行者。告慰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梦已成现实。

孙中山先生铜像于1983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12月16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孙中山铜像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匾牌

汉口机场遗迹位于武汉市江汉区西部王家墩，故又称王家墩机场。

## ● 1938年：武汉空战 保卫武汉

武汉是中国心脏腹地和水陆交通的咽喉，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国民党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和一些机关仍留在武汉。作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抗战物资集散地的武汉三镇，这时已成为日本侵略军攻击的主要目标。日军认为“只要国民政府还盘踞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党）军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结合点，和两党合作的楔子”，“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并狂言：“只要攻占汉口……就能支配中国。”因此，日军在调集主力向徐州进攻的同时，日本海军航空本部就秘密策划了从空中进袭武汉三镇的作战计划。企图通过对武汉的空袭，摧毁中国军队作战指挥体系、军事生产基地和空军机场等，达到瘫痪中国军队指挥、交通运输的目的，为下



原汉口机场鸟瞰

一步从地面大举进攻武汉创造条件。从1937年8月21日日机首次空袭武汉开始，到1938年10月，日军出动飞机共900余架次，主要对武汉城区狂轰滥炸。当年遭受轰炸最激烈，受害最深的地区，有武昌的徐家棚、大朝街、水陆街、中正路、平阅路等地，汉阳的铁厂及河泊所、新堤洲等地，汉口的江岸一带及武圣庙、药帮巷等地。轰炸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期间日军共空袭64次，投弹总数达3080枚，死伤人数4798人，炸毙牲畜76头，炸毁房屋共计2628栋。日军的暴行更激起中国军民的反抗、斗争。武汉上空发生了中国空军反击日军的空中大战。

1938年2月，武汉地区晴空少云，宽阔的长江上空空气清冷，江面上风平浪静，舟楫稀疏。地处中原地区的武汉，虽然离当时的抗日前线还有几百公里，但这年的春节，当地老百姓根本没有心思过。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时地靠近武汉进行侦察骚扰，空袭警报声不绝于耳，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武汉三镇。武汉军民也在加紧进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准备。就在2月18日这一天，日军又开始了武汉的大规模空中袭击。中午12时许，日军的26架战斗机和12架轰炸机，在安徽和江西的交界处会合后，摆着长蛇阵直扑武汉。日军用于这次空袭的轰炸机和战斗机，都是



▲ 1938年『一二八』武汉空战参战的部分空军将士

刚刚装备部队不久的新式飞机，其中九六式战斗机 1936 年才正式投产。该机长 7.71 米，翼展 11 米，乘员 1 人，最大时速 409 公里，最大航程 1311 公里，机上装有两挺口径为 7.7 毫米的机枪，并可携带两枚小型炸弹。敌机来袭的消息迅速传到设在汉口机场的中国空军第 4 大队指挥所，大队长李桂丹急令第 4 大队所属的第 21、22 和 23 三个中队，立即全部起飞，迎战日机。第 4 大队是以前任大队长高志航名字命名的优秀“志航大队”。

12 时 45 分，第 21 中队的 10 架伊—16 驱逐机首先从汉口机场起飞。李桂丹率领第 22 中队 11 架伊—15 驱逐机紧随其后。第 23 中队 8 架伊—15 驱逐机也从孝感机场起飞。第 22、23 中队担任主攻，第 21 中队负责掩护。一场激烈的空战即刻打响了。第 4 大队的空中勇士们驾驶战机，以对国家和民族安危的责任感，勇敢地冲向敌阵。第 21 中队的队长董明德、飞行员杨弧帆、柳哲生、刘宗武协同作战。柳哲生协同战友首开纪录后，咬住一架敌机猛射，把这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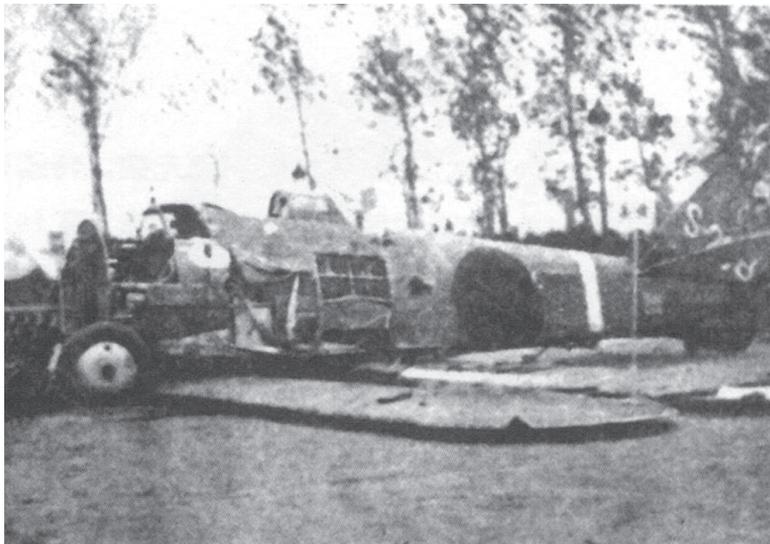
日机打得凌空爆炸。他的3名战友又各有收获，一人击落一架日机。第22中队的机群也与日机相遇。大队长李桂丹指挥第22中队与日机展开空中格斗，形成单机混战态势。中队长刘志汉首先击落一架日机。其他飞行员也英勇作战，相继击落日机4架。第23中队进行攻击，中队长吕基淳当即率机群向日机猛扑过去，击落敌机2架。这是一场机群对机群的大规模空战，双方数十架飞机混战在武汉上空，从空中5000米到几百米，相互追逐缠斗。飞机的

轰鸣声、枪炮声、爆炸声交织在一起，空中硝烟弥漫。一架架日机拖着浓烟坠入田野、江中，一顶顶降落伞摇晃着从空中飘落。整个空战历时12分钟，击落敌机正好是12架。胜利来之不易，第4大队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大队长李桂丹、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等人血洒长空、献出了宝贵生命。击落12架日机的胜利喜讯迅速传遍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百万军民无不欢呼雀跃。



1938年2月19日《大公報》报道的我军空战大捷消息

1938年2月18日，被中国空军击落的日军战  
机残骸在中山公园展览



2月21日，武汉各界民众万余人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空捷，追悼国殇”。中共中央和驻武汉的第18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董必武、叶剑英等出席集会并敬送挽联，上书：“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苦奋斗，胜利可期。”这情真意切的挽联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为民族献身的空军烈士的崇敬和悼念之情。

4月29日，日本天皇的生日，是日本的天长节。侵华日军妄想在这天狂轰滥炸武汉，为天皇祝寿。中国空军几天前就获得情报，加强了防范，还将驻南昌的苏联志愿航空战斗机大队调到武汉共同作战。4月29日下午2时30分，日本海军“左世保”第2航空队按计划出动36架重型轰炸机，在12架战斗机的掩护下，杀气腾腾直奔武汉。早有准备的中国空军的19架伊—15驱逐机和苏联志愿航空队的45架战斗机已占据有利高度等待日机。日机群刚一进入武汉上空，中苏机群与日机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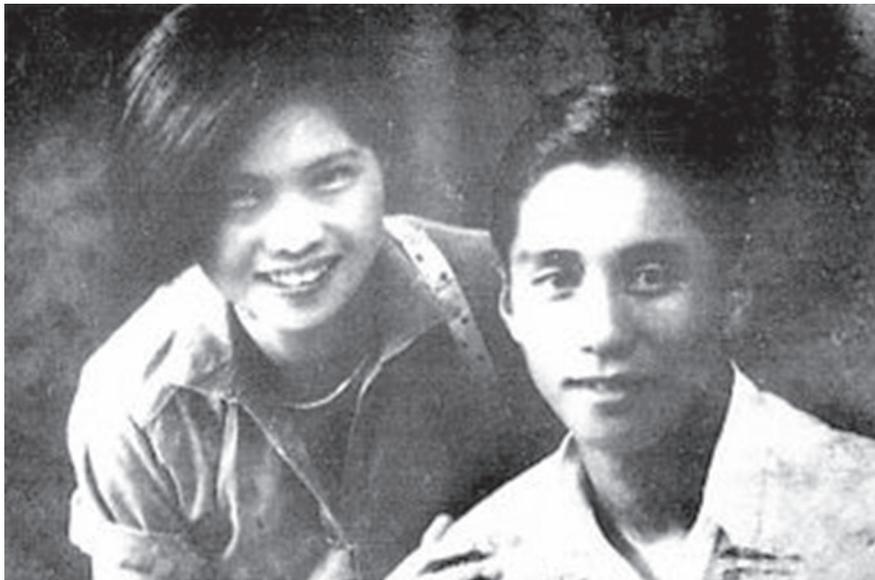
开搏斗。飞行员陈怀民抓住战机，击落一架敌机，首先告捷。他便成了日机众矢之的，5架日机发疯似地扑上来，猛烈地向陈怀民飞机射击。陈怀民的战机多处中弹，操纵不灵。他本可跳伞求生，但他看到敌机逞凶，不禁怒火中烧，毅然放弃求生的机会，向一架日机撞去，与敌同归于尽。

陈怀民烈士的英雄壮举，使日军飞行员为之丧胆，让地面观战的武汉军民为之动容，使在空中激战的战友为之骄傲！

中苏空军勇士越战越勇，经过30分钟激战，一举击落日机21架，日寇领队得猪、小圆安各和棚町三名少佐被当场击毙，取得抗战以来空战最辉煌的胜利。日



◀ 「二二八」大捷，武汉市民集会游行庆贺胜利



军向天皇祝寿的企图变成了报丧的现实。此战只有一位苏联同志和中国飞行员吴鼎臣受伤。空战结束后，武汉三镇沉浸在一片祝捷的热浪之中，人们纷纷涌向王家墩机场，热情慰问凯旋的飞将军。4月30日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为陈怀民的壮举感动，赋诗缅怀英烈，诗中写道：“舍身成仁 同归尽，壮烈牺牲鬼神泣。”

日军遭重创后，到5月31日，又恢复了对武汉的空袭。上午日本海军第12航空联队出动战斗机36架、轰炸机18架袭击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出动31架飞机作为主力迎战。中国空军出动18架战斗机与苏联志愿航空队构成立体纵深的空战态势。12时许日机窜入武汉上空，见中苏空军已排好迎战队形，忙调头东窜。中苏空军抓住时机，近50架飞机如猛虎一般扑向日机。当即击落数架日机。经过30分钟激战，共击落敌机14架，中国空军损失2架，一架被日机击落，另一架飞机因故障失速坠地。取得了又一次空战胜利。

8月3日，武汉天空飘散着一些浮云。按照经验判断，日寇飞机

▶ 武汉市民在街头观看空战



▶ 1938年苏联空军志愿队在汉口机场



很可能来袭击。汉口机场空军做好了应战准备。早晨9时，日军派遣战斗机50余架，轰炸机18架，再次向武汉进犯。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战斗机适时起飞拦截，于武昌南部上空发生激烈空战。战斗持续了30分钟，中苏空军共击落日机14架。与此同时，中国战斗机主动出击，飞抵安庆机场进行空袭，在轰炸多架地面停放的日机后，又转向停泊在长江之上的日军舰艇进攻。此次空战，中苏空军无

一损失，仅一架战斗机中弹受损，飞行员仍顽强驾机安全返航。

### ● 汉口机场起飞 中国空军远征

汉口机场在1938年与日寇飞机在武汉空战中，作为中国空军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当年5月20日也作出了轰动世界的一件大事。5月19日，汉口机场上空浓云密布。下午3时23分，中国空军第14大队大队长徐焕升率领第19队副

▶ 中国空军第十四大队大队长徐焕生胜利返航降落汉口机场



队长佟彦博和队员苏光华、刘荣光、雷天春、吴积冲、陈光斗等，驾驶两架马丁B—10轰炸机从汉口机场起飞，经宁波机场降落加油，补充燃油后，于23时48分由宁波起飞，直向日本九州飞去。20日凌晨飞临长崎上空，飞机开始降低飞行，当徐焕生他们看到地面闪烁的灯光时，投放传单。炸弹舱内的“纸弹”天女散花似的飘落地面。在长崎撒完传单后，又折回福冈，3时45分在福冈上空再次撒下传单。徐焕生与他的战友在日本本土撒下总数120万张传单，它使日本人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对自身安全和战争前途产生疑虑。它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不可侮！中国的抗战一定要胜利的！徐焕生及其战友完成任务后，胜利返航。8时45分佟彦博在玉山机场降落，9时24分徐焕生在南昌着陆。两机加油后继续飞行，11时13分，两机在武汉上空会合，凯旋的雄鹰降落在汉口机场。各界代表数百人上前欢迎，军乐齐奏，场面极为热烈。武汉各界人士也纷纷前往汉口机场慰问远征胜利归来的英雄。武汉三镇欢庆胜利的鞭炮响彻全市，并延续了3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在1938年保卫武汉的空战及以后与日本法西斯的搏杀中，一批来自异国他乡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

创立了不朽的战绩。先后有100余位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志愿队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等15名勇士壮烈捐躯，长眠在汉口解放公园内。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武汉人民永远怀念这些年轻的雄鹰。

### ●中共策反 汉口机场空军起义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二分区京应县委城工部胡安涛对其亲戚、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军士长程德骥进行策反动员。是年底，程借口探亲，由胡秘密带进江汉解放区参观考察。中共京应县委书记王家吉、城工部长王有学热情接待。程目睹解放区现实，颇有感触，流连忘返，想留在解放区工作。后经劝说，程重返机场，在军士长、机械长、军械班长、射击士等人员中秘密串联，策动起义，先后利用乡亲关系发展20多人。程还向国民党空军机组人员分别投寄劝告信，要他们把炸弹投到水面或空旷无人地，机枪不向解放军扫射。后勤人员找借口不随国民党逃跑，妥善收藏保管物资器材，防止破坏，迎接解放军进城接管。

武汉临近解放，机场未去台湾的人员都集中在空军仓库居住，已秘密串连的起义核心骨干人员也随迁入居，以掌握机场动静，并每天巡视机场，保护飞机及器材。期间，中共鄂豫三地委城工部也派员联络



▲ 1945年5月，人民空军在汉口机场接管的美式飞机

地下工作者、机场第一轰炸大队长童治洲，布置反破坏、护机场任务。童在机场组织 130 多人，并与机场工兵加强连少校连长李树伯磋商，制定“埋雷不炸”、“早撤”方案，使机场指挥台、修理厂、气象台等所有设施都全部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

1949年5月15日，留下来的人员抗命拒不撤退。5月16日下午，人民解放军进入汉口。次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航空接管组指导员王瑛赴机场，起义核心骨干人员配合工作。计接收轰炸机 1 架、B-25 重型轰炸机 1 架、A-6 型中级教练机 2 架、P-17 型教练机 2 架，美式大中型吉普车数十辆，还有大量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器材等。汉口机场挂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航空处的牌子，正式成为空军的军用机场。起义人员也分别随解放大军南下湖南、广东、江西、四川等地，担任接管机场的有关工作。

2007年广州军区空军向武汉市政府移交汉口机场核心区 266.67 公顷土地。2008年大规模开发正式启动，王家墩地区将建成以金融、保险、贸易、信息、咨询等为主导产业的武汉中央商务区。规划面积 7.14 平方千米，分为全生活城服务区、综合商业区、中心商务区和生活服务区四大功能区。地上项目总建设规模约 1428 万平方米，地下空间建设总规模达 202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1500 亿元。不久的将来，一个崭新的新城在汉口机场建成。



在原汉口机场上升起的武汉中央商务区



# 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受降堂旧址

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受降堂旧址，位于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中山公园西侧。旧址建筑为一座平顶厅堂式房屋，长34米，宽12米。正门上方挂有“受降堂”三字横匾。

## ● 《波茨坦公告》迫令日寇投降

1945年7月28日，中、美、英3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迫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向解放区部队发布7道命令。当时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早已众所周知。四万万同胞，五师向日寇发出通牒，要求立即停止侵略，撤退军队，赔偿损失，并保证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否则，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与全国人民一道，坚决抗战到底。

# 對日本駐軍通牒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早已众所周知。四万万同胞，五师向日寇发出通牒，要求立即停止侵略，撤退军队，赔偿损失，并保证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否则，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与全国人民一道，坚决抗战到底。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早已众所周知。四万万同胞，五师向日寇发出通牒，要求立即停止侵略，撤退军队，赔偿损失，并保证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否则，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与全国人民一道，坚决抗战到底。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早已众所周知。四万万同胞，五师向日寇发出通牒，要求立即停止侵略，撤退军队，赔偿损失，并保证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否则，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与全国人民一道，坚决抗战到底。

李先念  
任贇斌  
张树才  
政治部主任  
副主任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各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大举反攻和迫令日伪投降。在武汉外围坚持抗战的新四军第五师，也于8月11日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

然而蒋介石在美国全力支持下，疯狂抢夺抗日战争果实。8月12日，蒋介石给朱德总司令下了一道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这种命令理所当然的遭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拒绝。8月14日武汉外围的新四军攻克孝感魏家店车站，歼灭该站日伪军。在夏口、河口、长轩岭、姚家集公路沿线，向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发动总攻击，活捉伪军大队长薛子振、伪公安局局长魏振发、伪县长韩子创等。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日本大本营在下达“停止战斗行为”命令的同时，又命令日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自卫可以采取战斗行为”。由于日军宣布投降后不放下武器，新四军第五师及武汉郊区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地方武装积极向武汉推进，向负隅顽抗、拒不投降的日、伪军作战，收复了部分国土。仅在8月下旬，共歼灭日伪军3500余人，攻克大小城镇12处。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党委、鄂豫边军区专门成立武汉工作委员会，以及

武汉解放委员会和武汉解放军司令部，并组成武汉先遣军司令部进驻汉口，负责接洽日、伪军的投降。组织先遣队进入武汉市区，进行宣传调查工作，准备接管武汉，还组织人员随新四军第五师在武汉周边小市镇进行日、伪军的受降工作。

### ● 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

但是，就在此时，国民党、蒋介石一面明令全国所有日、伪军“坚守原地”，等待国民党部队受降，不准其向在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多年的八路军、新四军投降。要长期坚持在武汉外围作战的新四军第五师“原地驻守待命”；一面将其避战于大后方的部队用海、陆、空等各种运输工具昼夜不停地运往敌占城镇，抢夺胜利果实。8月10日，蒋电令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即以一个军监视宜昌、沙市方面之敌，以四个军向武汉挺进，分别解除其（日军）武装。”为了阻扰新四军第五师接收武汉，蒋竟于8月11日委任伪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兼伪湖北保安司令、伪湖北省主席大汉奸叶蓬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七路军上将总司令，不久又任命伪军第十四军军长邹平凡为武汉守备军总指挥兼新编第二十一军军长，负责维持武汉地区治安。蒋介石还严令第六战区“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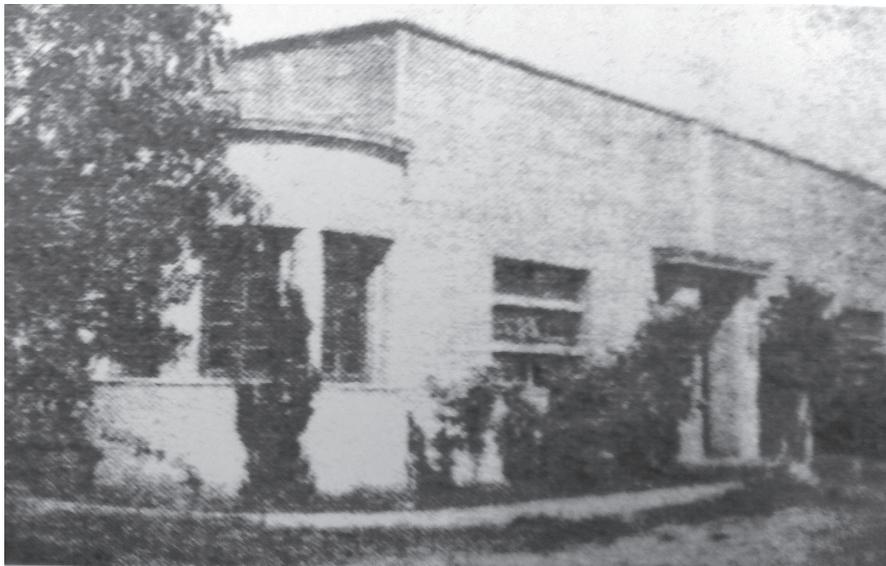
事长官以外任何人缴械投降”。由于国内形势急剧变化，8月15日，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第五师：“内战迫切，你们所处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准备应对内战。”新四军第五师各部集中力量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受降工作受到影响。新四军第五师及各级党组织派到武汉工作的人员奉命撤离了武汉。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的喜悦传来，仍处在日军铁蹄之下的武汉三镇人民，虽然没有像大后方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一样公开举行庆祝活动，但广大市民还是奔走相告，庆幸更生，以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庆祝这一历史性的

胜利。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经过8年浴血奋战，终于夺得了伟大胜利，一洗百年耻辱。

1945年8月30日，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派出少将副参谋长谢士炎一行40余人从恩施乘运输机抵达汉口，设立第六战区汉口前进指挥所，代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行使职权。与此同时，国民党第十、第二十六、第三十三集团军所部的第六十六军、第九十二军、第七十五军、第五十九军、第七十七军各部20多个师及9个游击纵队。分别由鄂西、湘北出发，从西、南、北三面急速向武汉开进。9月13日，国民党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地区日军总受降官王敬玖到达武汉，开始办理武汉日军受降事宜。16日，国民党第十集团军

► 1945年坐落在中山公园的受降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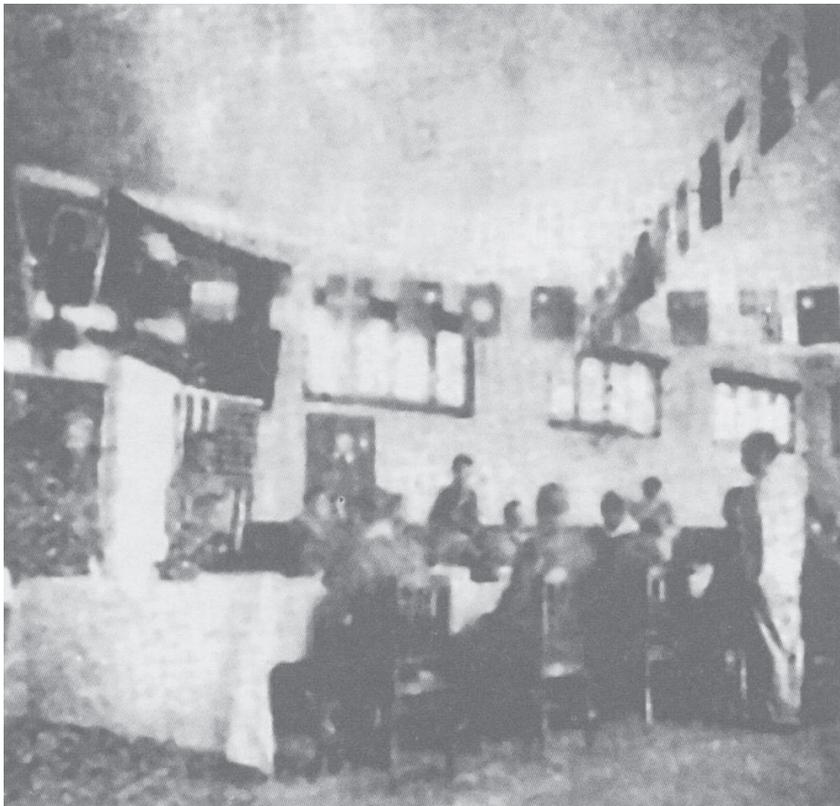
1945年9月18日日军投降军事代表走进受降堂，接受投降

进入武汉市区。17日，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副司令长官兼武汉警备司令郭忏、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邵华等党政军要员200余人乘船从巴东抵达汉口，并设立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

### ● 受降堂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14周年，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日子，第六战区在汉口中山公园内的“受降堂”举行了隆重的受降签字仪式。下午3时，日军投降代表、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参谋长中山贞

▶ 武汉地区总受降官一行接收日军投降代表呈递的投降书



武少将及来福栖静岛大佐、冈田方政大佐、清水勋之大佐等 4 人，由中国士兵押送乘汽车至受降堂门前，下车后摘下佩刀，以示解除武装，低头进入受降堂，立正排列在受降席前。

这时，武汉地区总受降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上将步入堂内正面就座，副司令长官郭忏、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邵华、汉口市市长徐会之，以及党政军各界代表 88 人分座两旁。随即冈部直三郎脱帽敬礼，呈上投降证书。接着孙蔚



如将第六战区命令交冈部直三郎签字受领，命令规定其所辖部队限期开往指定受降地点，集中解除武装和移交军事装备物资等。冈部接过命令后，连称“遵照实施”，后低头退出，由两乘军用摩托将他及随员押走。受降仪式就此结束。日军投降签字代表离开中山公园后，武汉市民自发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市区主要街道人山人海，许多店铺门前都张贴着庆祝胜利的标语。欢庆胜利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

武汉受降共接受华中地区日俘官兵202335人，日侨12988人，骡马9967匹，手枪4474支，步枪159654支，轻机枪4585挺，重机枪566挺，还有大量火炮、子弹等以及一批军事物资。至9月25日，武汉地区的日军53995人分别被国民党第十集团军第六十六军（汉口地区）、第九十二军（武昌地区）全部解除武装。日本侵略者自1938年10月25日侵占武汉，

到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7年之久，沦陷时的武汉人民，在日军的法西斯统治下，饱受奴役之苦，那是不可回首，不可忘记的历史。

### ● 爱国主义教育课堂

受降堂原系日伪武汉特别市市长、大汉奸张仁蠡主持兴建的张公祠。张仁蠡是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第十三个儿子，特兴建这座祠堂，以表彰其祖先。祠内供有张之洞的牌位和张姓家谱，供人凭吊。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军队进驻武汉后，将张公祠内张之洞牌位撤除，所有物品清空，铲掉张公祠匾额，换上了受降堂3个金色大字的匾牌。据离休干部胡法彰回忆：1945年9月底，到中山公园看到受降堂上挂的是胜利厅3字，像是孙蔚如的笔迹，直至武汉解放初期。武汉解放后，中山公园受降堂修建成餐厅，为来中



山公园的游客提供饮食，聚餐服务。

1998年6月，中山公园在筹备七十周年园庆清理有关史料时，在园内张公亭底层发现一块汉白玉石碑，碑厚5公分，长130公分，整碑呈上窄下宽形状，刮去涂在碑面的水泥，孙蔚如将军亲笔写的碑文清晰可见，这块碑的发现，立刻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1999年3月18日，中山公园邀请武汉部分著名学者专家就“修复受降堂，筹

备抗战史实陈列及相关活动”进行了专题座谈。与会学者专家一致认为：受降堂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历史见证，是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是武汉地区的重要历史建筑，修复工作很有必要，意义重大。

受降堂整个修复工作在市文物办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按照“尊重历史、整旧如旧”的原则，外观修复工作于2000年元月完工。受降堂内设有陈列室，有图片资料253幅，

实物及复制品共 46 件，整个展出内容以纪实历史场景为主，以湖北、武汉地区抗战历史为主，强调地方特色。图片资料分四部分：抗日烽火、江汉怒潮、血染楚天和受降纪实。

受降堂是珍贵的历史建筑，故环境布置庄严肃穆，受降堂后栽常绿大乔木和落叶大乔木作绿色背景，受降堂右侧作规划小游园布置，以常绿整齐花木为主；受降堂左侧新立民族传统式样受降堂纪念碑。

2002 年 11 月 7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受降堂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7 年 7 月被确定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受降堂左侧的受降纪念碑



## 主要参阅文献

- 《中国共产党武汉史（1919—1949年）》 欧阳植梁 陈芳国 主编
- 《武汉史稿》 皮明麻 欧阳植梁 主编
- 《中国共产党党史全鉴》 刘海藩 主编
- 《品读武汉》 夏武全 戚新平 主编
- 《武汉人物选录》 李兴煜 主编
- 《百姓摄影》 董玉梅 主编
- 《百姓回忆》 董玉梅 主编
- 《武汉老地名》 董玉梅 著
- 《品读武汉名人故居》 解家麟 夏武全 主编
- 《名人与武汉》 陆永初 陈芳国 王汗吾 主编
- 《武汉革命遗迹》 李文林 龚章有 统稿
- 《武汉文史资料》 熊家麟 主编
- 《江汉文史资料（一）》 黄汉生 主编
- 《董必武传记》 胡传章 哈经雄 著
- 《汉口五百年》 皮明麻 吴 勇 主编
- 《品读武汉工商名人》 彭小华 主编
- 《抗日战争时期武汉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 易福才 陈芳国 程 鹏 主编
-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资料汇编》 文天行
- 《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图志》 陈芳国 涂文学 郝纲以 程鹏 主编
- 《大武汉旧影》 林阳春 主编
- 《月上花楼》 陈红山 主编
- 《图说江汉》 严国运 主编
- 《江汉史话》 王登福 主编
- 《长江日报》《武汉晚报》及网络有关资料

## 鸣 谢

(排名不分先后)

---

郭 海 刘怡冰 童治洲 吴鼎臣 涂德深 周启明  
刘谦定 李肇君 周慧芳 朱彦平 晓 舟 余坦坦  
李 栋 田子渝 王志远 叶翠华 黄启疆 徐莉君  
刘 迪 胡昌民 吕书臣 罗时汉 蒋太旭 王 彬  
丁运时 陈 模 周红兵 马尚瑞 刘润生 肖志华  
欧阳汝丽



《红色印记——武汉市江汉区革命遗址遗迹》一书，是在中共武汉市江汉区委、江汉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中共武汉市江汉区委党史办公室、武汉市江汉区地方志办公室和武汉市江汉区档案局联合编撰的一部党史地情书。全书遴选了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坐落在江汉区境的革命遗址遗迹，记述了发生在这里的革命历史事件，讴歌了革命英烈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以启迪我们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敢为人先、追求卓越。

本书的编撰于2014年3月启动。编撰人员满怀着对革命先辈的无限崇敬，广泛细致地查阅文献资料，全面深入地采集整理文稿，千方百计地搜寻历史图照，力求准确地再现历史原貌。是年10月，初稿形成。次月，送审稿报请市党史、地方

志部门和市区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审示。同年12月，集中各方意见并对书稿作全面修改，经区委、区政府审定后出版。

本书的编撰，得到了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精心指导和大力帮助，市史志专家程鹏、李崧提出了宝贵意见。同时，得到了区委、区政府领导的有力支持和热情鼓励。区委书记李强、区长张俊勇亲笔审阅修正、补遗订误。区老领导、老同志傅永昌、张士海、曾舟记等，都为本书的编撰付出了辛劳，谨向所有为本书提供过支持帮助的单位 and 同志深表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本书难免疏漏不足，敬请领导、专家和读者指正。

编者  
2014年12月